

告全国士兵弟兄书*

(1929年)

全中国的士兵弟兄们：

我们有七件事情，要告诉你们，你们看了，请细细地想一想。

第一，士兵是穷苦工农出身。我们士兵谁个不是由工人、农民出身的？哪里找得出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子弟来当士兵呢？我们家中，因为耕田没有田可耕，做工没有工可做，或者耕出的田，还不够还地主的租和官厅的捐税，借了些债，又是利上加利，迫得无力偿还，家里住不下去，只得出来当兵。有些做工的，被厂主、店东开除失业了，再无法度日，无路可走，只得把性命出卖，每月换得几块钱。

第二，替白军当士兵，是非常受痛苦、受压迫的。初时我们不知道军队里的生活是怎样，我们只是跟着有钱有势的人，只想到军队去当兵，拿起枪来可以杀个痛快，报仇雪恨，哪知道我们走错了路，走在什么号称国民革命军的营盘里。他们首先就是革我们士兵的命，他们对我们施行苛待、恶骂、毒打，甚至于枪毙，不是吗？我们稍为不检点，就要得到军棍、藤条的“恩赐”，或两个耳光、一脚皮鞋，这是见惯的。至于军饷，他们只说没有钱，一欠就七八个月，有时开恩发一点，还要搭些公债券。而他们那些团长、师长们呢？你们试查查看，起码总几千几万十几万洋钱，放在银行里。

至于新军阀蒋介石呢？那就多了，只是汇到美国去的，就有几千万元，他的洋房子建在租界上，他的老婆宋美龄做一件外衣，在上海大公司定的，报载用了三万元。然而我们住的、穿的怎样呢？就是那些师长、军长们，他们哪个没有洋房子住？你们不是住草棚就是住破屋。官长们穿的衣服，又比你们的烂军衣如何？他们吃西餐、大餐，吃馆子，你们的伙食呢？不是只有六块钱一月吗？不是只有一盘菜吗？打了好几年仗，他们做官的，个个升了官，个个发了财。你们呢？许多士兵弟兄，都打死在离家几千里的异乡，可怜有的老母、妻子还不知道，有的连老婆还没有讨呢！

第三，我们士兵要明白，谁是朋友、兄弟，谁是仇人、敌人？不要帮助仇人、敌人来杀自己的朋友、兄弟。让我们大家看看，到底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呢？绝对不是的，他们是我们的死仇大敌。替我们做器具、盖房子的工人和供给我们吃的、穿的农民呢？他们是我们的仇敌吗？绝对不是的。他们是我们朋友、兄弟，工农里面还有许多就是我们士兵的父亲叔伯兄弟亲戚呢。我们可以替我们的仇敌去杀自己的亲人、朋友吗？不可以的，不应该的。可是许多士兵兄弟，还没有觉悟，受了新军阀国民党的欺骗，到处去替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来杀自己的朋友、兄弟，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呀！你们不信吗？蒋介石自称顶“革命”的，第一次北伐时，他到了江西，就杀死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到了上海，他又把替他打开上海、杀退孙传芳的工人纠察队缴了枪，还枪杀了许多工人；许克祥在湖南，何健在湖北，李济深在广东都杀了工农，计算起来，总共有几十万人。他们不是都说“革命”吗？他们革谁的命呢？是革工农的命，但是受他们欺骗利用去杀工人农民的，不都是我们士兵自己吗？两次东征，两次北伐，蒋

桂战争死了好多士兵！结果换得蒋介石做新皇帝，我们士兵的血，不知流了多少，只养肥了这些吃人的野兽；我们士兵的尸骨不知抛弃了多少，只垒成新军阀的宝座！够了啊！我们已受他们骗够了！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弟兄们！快觉悟过来吧！要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不要再受他们欺骗了。他们骗你们“不怕死，不要钱”，他们可是躲在后方，大扒特扒地扒钱，死的都是你们。他们就“爱国家，爱人民”，却把济南惨案出卖给日本，航空权出卖给美国；几十万被杀死的工农，已经这样蒙他们的“爱”了；国家一切权利，已经蒙他们的爱出卖完了，谁说不是呢？士兵弟兄们，快醒来啊！

第四，我们试问一问自己，打了几年仗，得了些什么？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都是军阀争地盘、争权利，互相打起来的，他们无论谁胜谁败，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们只有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送到战场上死去；一些些的抚恤费也都进了官长的腰包；没有死的也成了残废，不能为军阀跑腿了，就一批一批地裁掉去修马路，修不了马路的就只好讨米，千山万水，没有盘缠，哪有一个回得到家中！另一方面，又因为军阀战争不息、加捐加税，更有土豪加紧加租加息，家中的父母、妻子、兄弟都快要饿死冻死哩。总之，士兵们替军阀打仗，军阀升官发财，士兵们不被打死的也只落得个被裁！

第五，红军士兵打仗，是替自己谋解放。士兵弟兄们，你们大家要找出路，要谋生活，要不受痛苦，要不做奴隶，要家中得着利益，只有觉悟起来，联合起来，杀死反革命的军阀长官，自己举出士兵弟兄当官长，成立士兵委员会，来参加管理军队，与工农联合起来，打倒压迫我们的土豪劣绅，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来分给农民，我们才有好日子过。要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我们自己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然后才能得着真正永久的幸福。我们的红军，才

是我们士兵自己的军队，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受官长压迫与剥削，官兵薪饷一律平等，穿吃一样，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队管理，可以枪毙反革命的官长，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消灭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

第六，红军第四军与反革命奋斗了几年，消灭了许多豪绅军阀。我们红军第四军在两年前的八月一号，因蒋介石反水投降了帝国主义，保护土豪劣绅、资本家，屠杀工农的时候，要我们来保护仇人，来杀我们自己的弟兄工人农民，那时我们还没有忘记革命，不愿意受他的欺骗杀自己的兄弟、朋友，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南昌暴动起来，与反革命军阀作战。两年来，我们转战湘赣闽粤各省，打倒许多土豪劣绅，消灭了许多新军阀，建立许多工农兵政府。

第七，红军士兵欢迎白军士兵到红军里来参加革命，士兵弟兄们，让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向我们的阶级敌人进攻吧！你们觉悟起来吧！我们欢迎你们。弟兄们！起来吧，让我们共同高举起鲜红的旗帜，高唱：“同志们，快来努力建设我们的劳动共和国，劳动阶级要做世界主人翁，人类才能进入大同，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先锋队，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先锋队。”最后我们高呼：

1. 全国士兵弟兄们，倒过枪来，杀死压迫你们的反革命官长！
2. 全国士兵暴动起来，消灭新老军阀！
3. 全国士兵起来，组织自己的红军！
4. 工农兵联合起来！
5. 打土豪分田地！
6. 推翻国民党政府！
7. 打倒帝国主义！

8. 建立工农兵政府！
9.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10.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红军第四军士兵委员会

告绿林弟兄书*

(1929年)

绿林弟兄们！山上的弟兄们！土豪劣绅为你们取一个名字叫土匪，土匪成了极恶劣最下贱而凶恶的东西，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们可以每年抢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当土匪的少许弄一点东西来饱肚子就犯了大罪，见着就抓，抓着就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何等不平，何等可恶！真是岂有此理！

共产党与红军并不以为你们可恶，土匪这个名字不过是土豪劣绅给你们起的罪名，但这有什么要紧，因为你们与我们都是无田耕、无工做、无衣穿、无饭吃、无居住的穷朋友，我们痛苦的来源就是受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的压迫，我们打土豪劣绅、反抗军阀实在是名正言顺，用不着客气，不要管什么土匪不土匪！大家务要硬干下去！不过你们的生活不是怎样快乐，我们深知你们的痛苦。

第一是你们的力量太小了，枪少又不好，人少又不懂得军事随时受军阀民团的压迫，使你们白日不敢露面，躲在深山中，夜晚要忙着打土豪不得片刻休息，风吹雨打，吸霜吹露，是你们日常的生活，虽说吃喝要比在家好一点，但是走路就不敢随便了，说话也不敢随便了。这是非常痛苦的呀！

第二是你们不敢回家，因为你们上了山，得了土匪的大名，家

里面不敢住，你们打土豪分的东西没有法送回家，送回家土豪知道就要祸事临头，因此你们上山，除你受苦而外你家里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也得不着幸福。

第三你们在山上因为力量小受军阀的压迫、受民团联合的压迫，以前土豪没有枪，军阀住在城里不下乡，你们还可以随意活动，可以多打土豪多分东西。现在可不同了，民团有枪，修起了巩固高大的围子，军阀随时下去向你们进攻，使你们三天四天要搬一次，恐慌不了，土豪渐渐打完东西分不着，你们力量小又不敢到远处去打，一旦不幸被土豪军阀捉着，他们毫不讲理，不给你家送一封信就把你一命呜呼！呀！这又是何等悲痛而令人愤恨的事呀！

第四纵令你们力量大一点，使你们在山上多快活几日，但是你们的将来，这一生一世的出路结果，实在渺渺茫茫，一个人做一件做得久了会要厌，所谓（糖吃多了都不甜）何况弟兄们在山上受苦呢！

绿林弟兄们！在你们这个痛苦环境中你们的出路是什么呢？我们替你们想，不外以下几种：

第一是你们打土豪得了钱就跑到远方去。这个办法不对，你们跑到远方去，沿途有民团军警巡查，你们插翅也难过，何况你带的有金银，这一条路是条死路。

第二是你们打土豪得了金银，积财回家。你们以为在远方当土匪没有得罪本地人可以回家，其实你依靠枪杆子回得家来，土豪劣绅为敲诈你的钱，哪里容得下，假口你的案发了就把你送去县里坐牢杀头。

第三是你们力量大一点弄得土豪们没办法，他硬打你不过，想一个软法，就是编你们为民团欢迎你们下山，这个方法非常巧妙，

真所谓软索能够套猛虎！土豪不欢迎你们下山，你们就会把他们消灭，所以想一条妙计来欢迎你们当民团，外表说得好听免你们的罪，实际上每月用几块钱买你们为看家狗！你们是一个活活泼泼的草泽英雄，千万不要上当，受他们狗套的拘束。

第四你们力量大了被军队改编。国民党政府和军阀可以用一个官来软化你们，这个当你们千万不要上，因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他们与我们工农贫苦人们是不两立的，他们改编你们不是为你们好，实在是一个软办法，先笼络你们，使你们入了他们的圈套，然后才来解决你们，试看有几个绿林出身的人被改编得到发达？还有一层，你们今日被改编，明日土豪就要你们去打土匪唉！土豪改编你们就是用的以土匪打土匪（就是弟兄打弟兄）的毒计呀，你们千万不要上当。

弟兄们！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与红军齐心合作受共产党指挥。第一红军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但是为一国的穷人努力谋幸福，有力量为全世界人谋幸福。共产党与红军每到一处要想尽方法来与你们见面，你们与红军联合接成一气又能长进学得政治、军事的本领，又能够有帮助不致单独孤立受压迫，又能与全国的革命势力工友与农友们团结一致不会永远都躲藏山上，共产党与红军既是穷人的好朋友，有钱的死对头，是绝对不害你们的！

第二共产党与红军是为工农及贫苦人努力奋斗的，现在农友没有田耕，因为田地被土豪霸占了，工友没有饭吃，因为工钱太少或被老板赚去了，士兵没有饷，因为被军阀克扣去了，我们中国人受苦受寒，是因为受了国民党与外国洋人（帝国主义）的压迫。共产党红军就是要把土豪的田地夺来交给农民，使得田地公有，要工人的工资增加，不准老板一个独赚，要帮助士兵发军饷，要把克扣军

饷的军官打倒，要联合全国人民起来打倒国民党，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实现全世界的自由平等，弟兄们！你们是有力量的，是极勇敢的，不要老住在山上辜负你们的勇敢善战的本领，应与红军联合一致，参加当前的大革命，弟兄们！你们能这样做，不但你们本身的痛苦样样的可以解决，你们家里也可以分得田地，所有的穷人都会得到幸福，这样的为穷人做事，立下了革命功业就是死也值得啊！弟兄们快来啊，我们红军欢迎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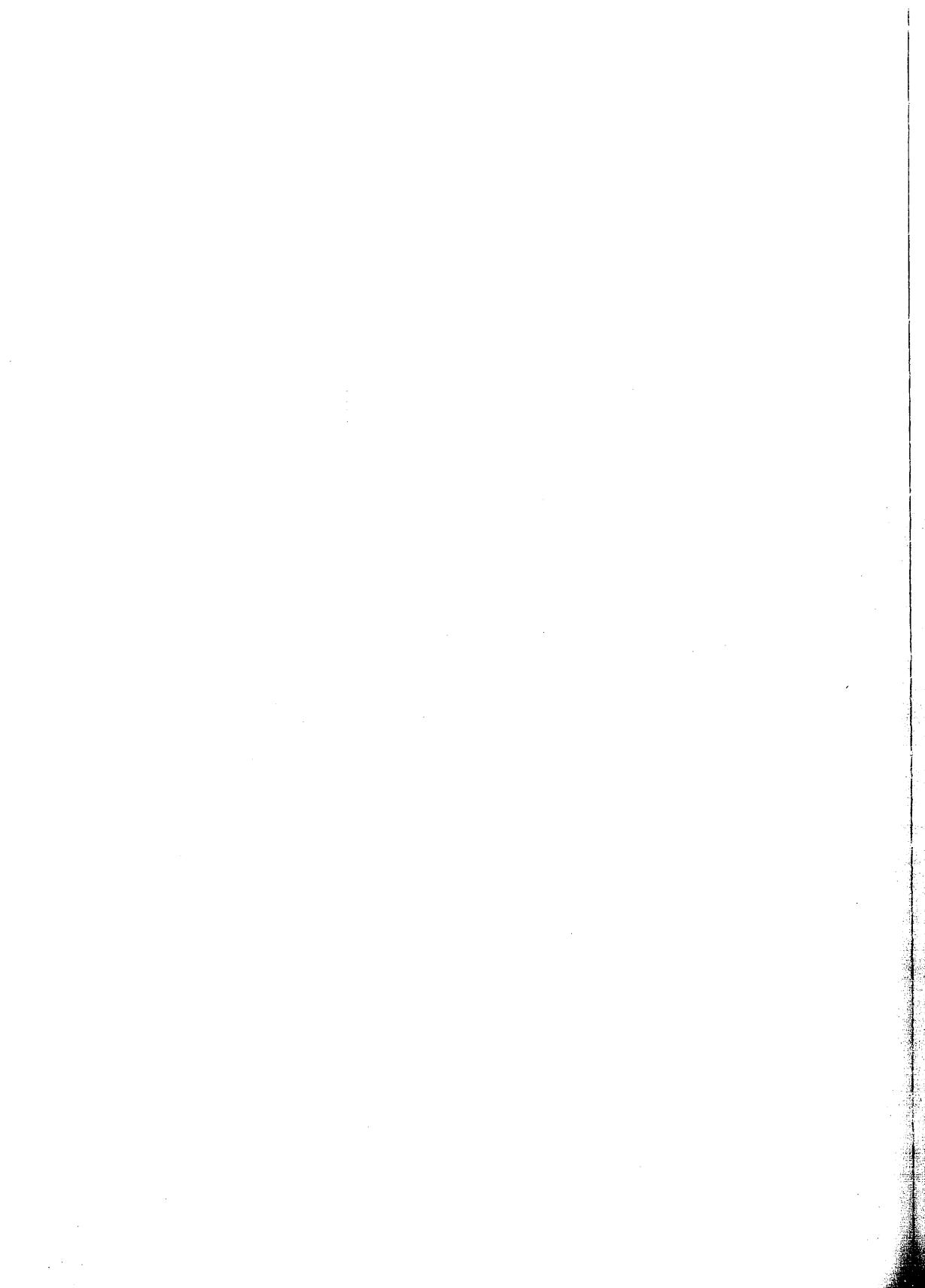
- (一) 欢迎绿林弟兄加入红军
- (二) 欢迎绿林弟兄加入土地革命
- (三) 绿林弟兄不要扰害工农及贫苦人民
- (四) 绿林弟兄不帮助土豪，红军不打绿林弟兄
- (五) 绿林弟兄不帮助军阀，红军不打绿林弟兄
- (六) 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
- (七) 绿林弟兄加入土地革命万岁

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

1930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中国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

(1930年1月5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

[1]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1]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

[1] 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1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1928年至1933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1934年11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1935年1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8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1]，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 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

[1] 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 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1]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2]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3]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

[1] 鲁涤平（1887—1935），湖南宁乡人。1928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2] 指1929年3、4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3] 1928年7月至11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1929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6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1]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 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

[1] 指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1929年4月5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1]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2]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速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

[1] 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2]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1]，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

[1] 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1929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毛澤東賜
給林彪的信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中共山東分局

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提出了中国革命和武装道路的基本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1]，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1] “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1]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2]旅已被击破；陈卢^[3]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4]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5]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

[1] 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2] 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3] 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1926年被国民政府收编。

[4]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5] 朱培德（1889—1937），云南盐井（今禄丰县）人。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

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油印件）。

1.

毛澤東全志給林彪的信 (1930. 1. 5.)

林彪同志：已經

新年到齊幾天了，你的信我還沒有回答一東西，有些事情忙着，二則也因為我到底寫點什麼給你呢？有說什麼好點的事頭可以告訴給你呢？被我的回憶，沒有一點正確的東西來，因此也就忘著，現在我認為一說事，雖然不知道到底你的情况如何不切合，但我這點材料是現在鬥爭中一個重要問題，而且你的個別情況不切合，這是一般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就把他提出來。

我要提出的是什麼問題呢？就是對地局的估量。在你舊即來的行動的問題，我從前兩次感覺到今已有上進之勢，對於時局的估量比較悲观的，去年五月十八晚上瑞金，談話上，你這個觀點最明顯，你說你相當華南東北可能變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將起遲到來的時候，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軍團的計劃，而你贊成軍委會三區域的計劃，同時在三區域，你沒有立身已所為，你深刻不公，因此也沒有由這本已政治地點的根據地，你對此問題的深刻觀念，由你相信XXX式的流動游击，以及一點標準，似乎你當時在該革命高潮尚未的時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為徒勞；而有用比較堅硬的統治階級方式去擴大政治

毛泽东致林彪信的油印件（部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写作地旧址——协成店。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油画)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油画)



《燎原之火》(中国画)

中国红军第四军告国民党军队士兵书*

(1930年1月)

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弟兄们！

一、现在军阀又在开火了！

现在军阀又在打仗了，一面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俄国），中国军阀蒋介石便为其忠实走狗；一面是蒋介石独霸中央政权，引起了全国大小军阀的反抗。前一种进攻苏联的战争是全世界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后一种是中国军阀代表帝国主义利益抢夺中央政府平分地盘的互斗。两种战争的开火都是加重工农兵的痛苦，尤其是当兵的弟兄们更要直接为军阀帝国主义受惨痛的牺牲。局势有这样的严重，弟兄们千万想一想什么是我们当兵的出路！

二、你们听一听红军的意见：

我们是中国的红军。我们中一部分同志在两年前曾为国民革命打过死仗，卖过苦力，眼见老弟兄们新弟兄们一批一批为国民党的总司令军长师长们当了炮灰。国民党对于工农兵提出的口号一点也不实行，而且保护土豪劣绅加重对人民的压迫，尤其可恨的是惨杀工农会的领袖及共产党员。等到假革命的黑幕揭穿，我们才根本明白国民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东西，我们才联合同志带枪投到农村中与工人农民联合一起实行干起土地革命来。反革命的国民政府两年来以三省的兵力几次进攻我们，终不能损伤红军的丝毫，倒多谢他们

的输送补充，红军转而强大起来。如今全国各地都有红军出现，完全证明工农群众的力量一天一天在发展。我们是受国民党欺骗的人，当此战争来到的时候，念及弟兄们的痛苦，特别很诚恳地为弟兄们贡献一个意见！

三、我们为什么要拥护苏联？

弟兄们！第一，我们要知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对于我们当兵的危险。现在全世界分成两个战线，一面是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战线，如英美日法等国，他们是专门压迫无产阶级弱小民族的。蒋介石坐了南京，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因为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兼军阀，所以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一面是无产阶级的战线，如苏联及各国工人农民兵士等穷苦的人。苏联在十余年前打倒了俄皇，成立了工农兵政府，把资本家地主等扫除干净。工农兵自己管理自己国家，求得了真正的自由平等。全世界无产阶级看见苏联为此办得好，都起来革命，联合苏联。比如中国从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曾有一次大革命，就是得了苏联的帮助。如果国民党不反叛革命，如果革命不失败，工农兵早得了政权，早成立了苏联第二。国民党反叛以后到现在两年光景，革命并未消灭，而且又渐渐抬起头来，中国是如此，其他各国也是如此。苏联成了我们工农兵的大哥，领导千百万穷苦人民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这样引起了帝国主义的绝大恐慌，不得不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以压迫一切革命势力。蒋介石便是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忠实奋勇去进攻苏联，造成几个月以来的中东路风潮，这明明白白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开始。战争如一旦开火，眼看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要运几万几十万兵士去打仗，就是要用我们工农劳苦群众去打工农劳苦群众，这是何等狠毒！弟兄们！千万不要上当，要拥护苏联，拥护无产阶级的国家，掉转枪头对着中国军

阀打去！

四、我们要起来打倒军阀

弟兄们！第二，你们要知道中国军阀混战是加重我们当兵的及工农的痛苦。中国军阀蒋介石、朱培德、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张学良等这股东西，时而和气，时而反面，打起仗来，今天南京打武汉，明天又武汉打南京；时而广东打广西，时而广西打广东，一年要干几次，弄得我们当兵的打得莫明其妙。每一次打仗，我们当兵的要死几十万，军阀们无论胜败都要刮地皮，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至于人民老百姓呢，起码几省或者全国遭殃！唉！这样打仗究竟为什么呢？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不同是国民党吗？不同是三民主义的忠实同志吗？不同是口头在讲革命吗？原来完全是假的。国民党是军阀的刮民党，民族主义投降英法美日，民权主义不准人民开会，民生主义加租加捐加税。国民党军阀只知道争地盘、刮地皮、发洋财，投降帝国主义以他为靠山而保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接济军阀的金钱和枪弹，所以军阀们打仗是永远不能停止的，也永远不会打倒帝国主义的。弟兄们！现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张发奎等为了打倒桂系以后地盘分配不均，又在打仗了！这个战争必然加重当兵的痛苦，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士兵同志应该起来反对，大家不要替军阀打仗。两方面的兵士一齐反转来打倒军阀，谋自己的出路！

五、什么是我们士兵的痛苦？

弟兄们！第三，要知道自己的痛苦来源以及自己的出路。弟兄们！我们不是生来当兵的，也不是命苦应该来当兵的，我们只是在家里没衣穿、没饭吃不得已才跑来当兵的。为什么我们会没衣穿、没饭吃呢？第一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用洋货赚了中国的钱。洋货销

场宽广，土货逼得不能出卖，只有停止不造。因此几千万几百万的工人农民便不得不失业了。加以军阀连年打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苛捐杂税的剥削，弄得我们老百姓求生无路、入地无门，大家没法不当土匪只有当兵。在我们当兵以后，初步进军营，每日三操两讲，七打八骂，从打手心、打屁股、关禁闭、开除以至于打靶，这些就是军阀们对我们的家常便饭！主要的意思就是养成我们的奴隶性格不敢反抗。至于士兵的衣服呢？每年顶多只有两套，穿来长长短短毫不合身，出外就惹人家发笑。被服呢？只有一两床坏毯子，夏天太厚了，冬天太薄了，破几个大洞简直是臭蚤的大本营。住房呢？军官们要揩油，不肯花钱修补，风吹日晒，把士兵当着牢狱囚犯还不如。军饷几月几年不发，上了他们的腰包。伙食尾钱照例不分，军阀们为了揩油，把伙食弄得非常坏，每日糙米青菜，无油无盐，这就是士兵的衣食住。一旦在战场带花，送入伤兵医院，那更是千百怪状，眼瞎的、足跛的、断背的，睡在床上不能动弹，那一面在哭，这一面在嚎，没有零用钱，没有医药，伤口流黄水臭得难闻，当兵带了花只有痛死。所以大家都希望痛快补一枪，不愿活受罪。唉！这些景况比比军阀们住洋房、摸麻牌、吃西餐、睡几房姨太太、存几百千万在银行里，究竟谁值得呢？还有军阀故意克扣军饷，使当兵的受尽穷苦，他们还向弟兄们说：大家不要愁，快打仗了。打仗到了大地方，弟兄们多少可得东西。唉！这就是军阀的毒计！他们克扣了军饷，指使我们到战场去抢劫，实在是要我们为他们拼命。许多弟兄听说打仗，就很高兴，以为发洋财机会到了，每次都拼命上前乱抢一阵，这正中了军阀们的毒计。大家想想，每次打仗到一个城市，大的商店、银行早有军阀们告示保护，谁敢去动一动？发洋财只有光顾小商人及痛苦的老百姓，他们

与我们是一样的苦人！大家再想一想，当兵的为军阀打了几百仗了，从广东打到北京，结果得了一个裁兵，强壮的留下，残废的滚蛋，请问哪个当兵的曾带了钱回家？军阀说打仗发财，完全是利用我们为他们拼命的一条毒计！弟兄们千万不要上当！唉！弟兄们！我们在家里受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压迫，不得已跑出来当兵。当兵以后，又仍然受帝国主义压迫，并且成了保护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压迫人民的器具。帝国主义军阀豪绅没有我们当兵的，他们不会那样凶恶；工人农民穷苦老百姓没有我们当兵的，他们不会那样受痛苦、受压迫。我们当兵的自己受压迫，又替别人做走狗去压迫自己的穷苦同胞，而自己一点好处没有，只有帮助军阀享福，唉！这是怎么样的蠢笨！这是怎么样的不值得啊！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吗？

六、什么是我们的出路？

弟兄们！我们红军弟兄中有一部分以前也与你们一样是很服从军阀长官的，不懂得军阀的可恶，后来从事实上看穿军阀压迫兵士的黑幕，才彻底懂得工农兵是亲骨肉，应该联合起来，所以才坚决脱离军阀到红军里面来。弟兄们！要知道红军的好处是什么？

七、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军队

第一，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军队。红军弟兄与工农是不能分开的，工农同志背着枪编成队伍就是红军，红军同志放下枪到田里工厂里就是工人农民。因此我们红军到一处，工农群众起来欢迎，煮饭烧茶、杀猪宰羊来欢迎我们。土豪劣绅跑的跑了，捉着的就罚款或者由工农兵开会来审判他，一切田地财物由工农兵大会决定处罚。因此红军与工农团结一气，分了田地，自己管自己政府，造成了真正自由平等的世界。如今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各地都有红军。就是由工人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呀！

八、红军是士兵自己的军队

第二，红军是士兵自己的军队。国民党挂着国民革命军的名称，骨子里是军阀的军队。军官有权，兵士无权。红军官兵好像师生的关系，弟兄般的亲爱。衣食住都由士兵选举代表共同管理，由工农兵政府供给。所以红军中官兵伙穿吃薪饷都是一样，红军中只有做工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打士兵，士兵敬爱官长，财政公开，兵士代表有权过问，全军有多少用多少，明明白白，绝没有扣军饷吃伙食尾子上腰包的怪事，一有不平等即可开会提出来问，马上就有公平的处置。所以红军才是真正的军队，是以士兵的利益为主，完全没有压迫。

九、红军是拥护共产党联合世界革命势力的

第三，红军是拥护共产党联合世界革命势力的。帝国主义军阀的势力非常之大，而且他们是有全世界的联合，我们工农兵的革命也一定要有全世界的联合才能打倒他。共产党是全世界革命的指导机关，各国都有很好的组织。红军必然要拥护共产党才能与世界革命取得联络。共产党的政治意见与军事计划都非常正确高明，红军及工农群众在共产党指导之下，一定能步步成功。同时共产党并不是一个特别的组织，他只是在工农兵中一部分最勇敢明白的同志所组织成功，纪律特别严，工作特别苦。凡是工农兵，只要努力革命，有工作表现，都有入共产党的资格。所以共产党是工农兵自己的党，绝不像国民党只是几个军阀资本家豪绅的机关，把工农兵压在脚底。

弟兄们！朱毛红军就是因为有了上面三个原因，所以能转战四省，反革命派把他奈何不得。这可以证明，我们当兵的要到红军去才能得着工农的拥护欢迎，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不会走错路，才

不会为军阀做牛马。弟兄们！现在战争已经爆发了，一面是我们工农兵又更加受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一面当着帝国主义军阀打架的时候，确是我们工农兵团结的好机会。世界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都在最近有到来的希望，只看我们工农兵的团结和努力。

十、你们到红军方面来吧！弟兄们！起来吧！不再替军阀做牛马奴隶，快带枪投到红军去。广大的工农群众及全国红军正热烈地欢迎你们。认清你们的出身是工农无产阶级。认清压迫你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军阀。认清工人农民是你们的好朋友。认清红军是你们解放自己的一条生路。离地狱，登天堂。快来呀！

十一、我们大家革命的口号！

- (一) 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 (二) 反对中国军阀战争！
- (三) 全国兵士群众联合起来！
- (四) 不上前线去，不替军阀打仗！不替军阀当炮灰！
- (五) 向军阀算欠饷，要二十元一月兵饷！
- (六) 工农弟兄不打工农弟兄，士兵不打士兵！
- (七) 拥护红军，带枪到红军中去！
- (八) 实行土地革命，分配士兵土地工作！
- (九) 工农兵联合起来！
- (十) 拥护工农兵政府，打倒国民党政府！
- (十一) 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
- (十二)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 (十三)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如梦令·元旦^[1]

(1930年1月)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1] 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在福建省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以后，12月底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对红军发展史有重大意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同时，蒋介石组织了江西、福建、广东的反动武装实行“三省会剿”，向闽西革命根据地逐步进逼。当福建敌军先头部队进抵离古田村仅30里的小池时，红四军在1930年1月上旬向敌后转移。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先出发，挺进江西。毛泽东率领第二纵队掩护主力转移后，向北经福建连城、清流、归化（今明溪）、宁化等县，西越武夷山，去江西和红四军主力会合，使敌人的“三省会剿”宣告破产。元旦，这里指农历正月初一（1930年1月30日）。



《直指武夷山下》(诗意图)



《风展红旗如画》(中国画)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

(1930年2月)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2]。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3]。

此行何去？
赣江^[4]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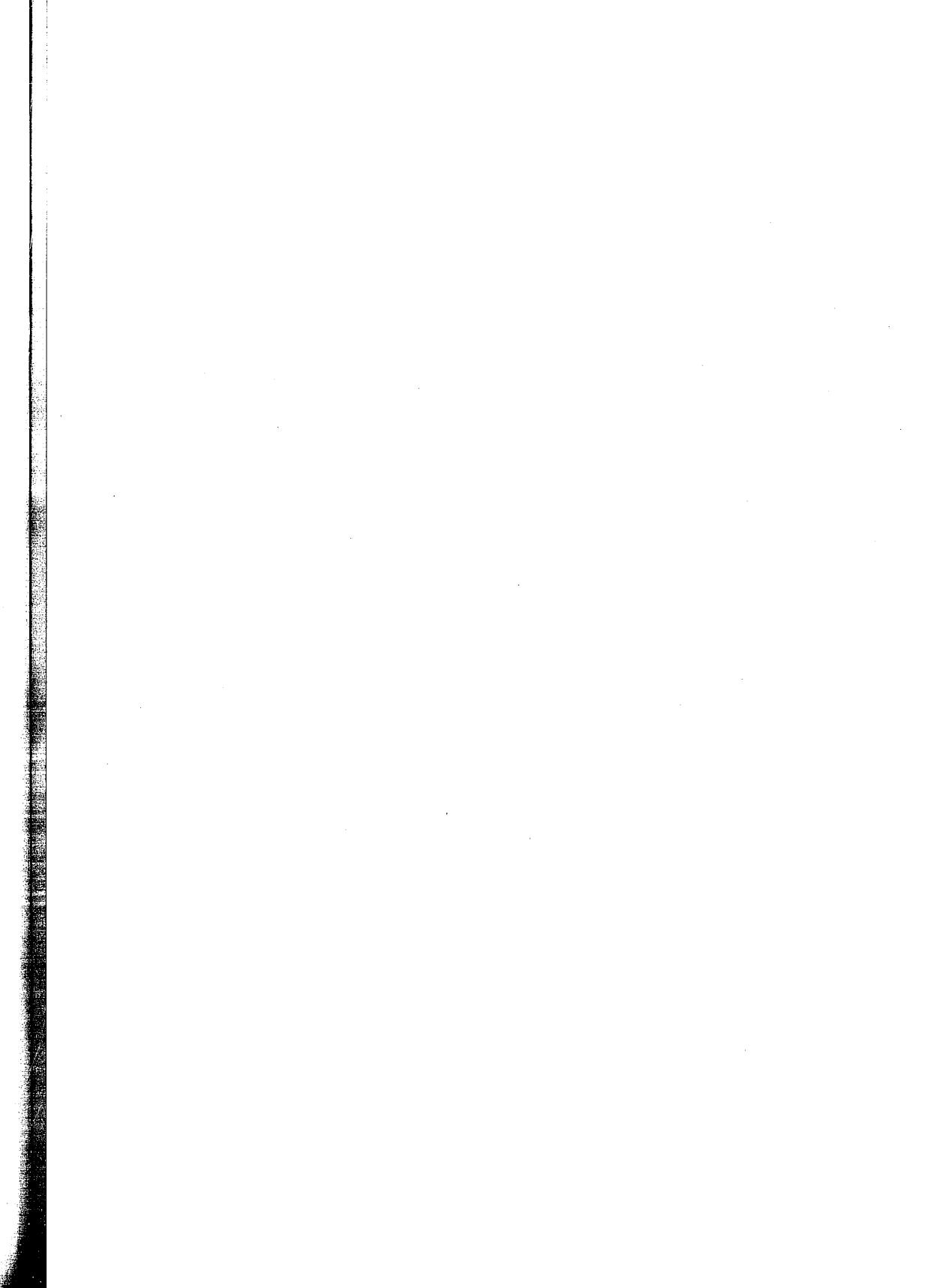
[1] 广昌路上，广昌，县名，在江西省东部。1930年2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军准备攻打赣江西岸江西省中部重镇吉安时经过这里。因当时国民党军调集7个旅12个团，开始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会剿”，毛泽东、朱德等遂决定不攻吉安，改在吉水县水南、吉安县值夏一带，打孤军进犯的国民党军唐云山旅。

[2] 情更迫，首次发表时原作“无翠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毛主席诗词》改为“情更迫”。

[3] 大关，指险要关隘。

[4] 赣江，江西省主要河流，由章水、贡水流到赣州市汇合而成，北流经吉安、南昌注入鄱阳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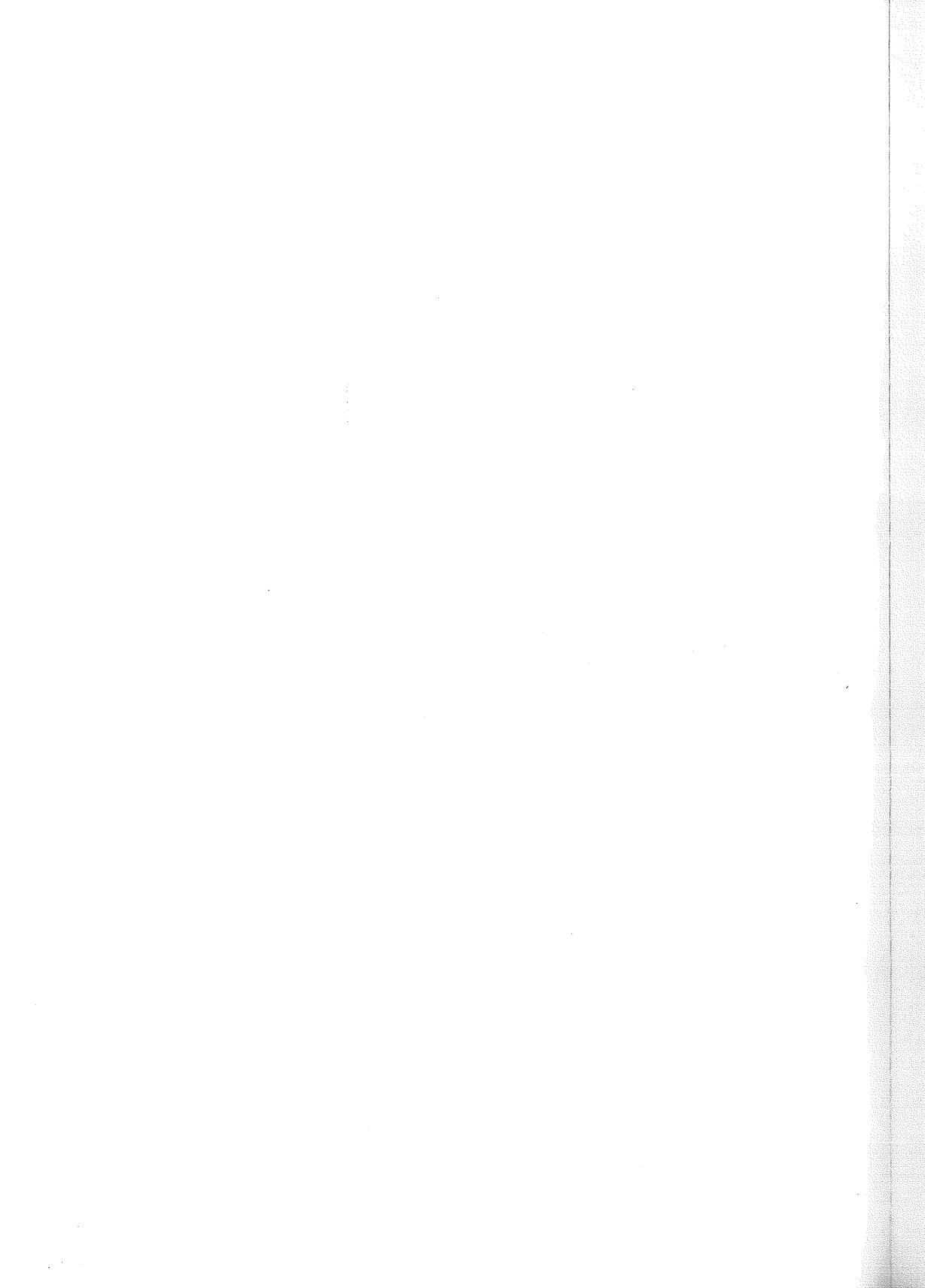
[5] 吉安，现为市，在江西中部，赣江西岸。



不到广昌路上，
怎称好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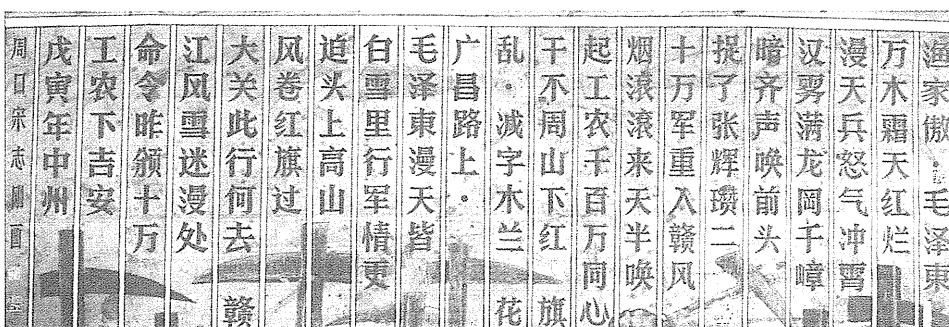
毛泽东手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4. 1. 1980. P.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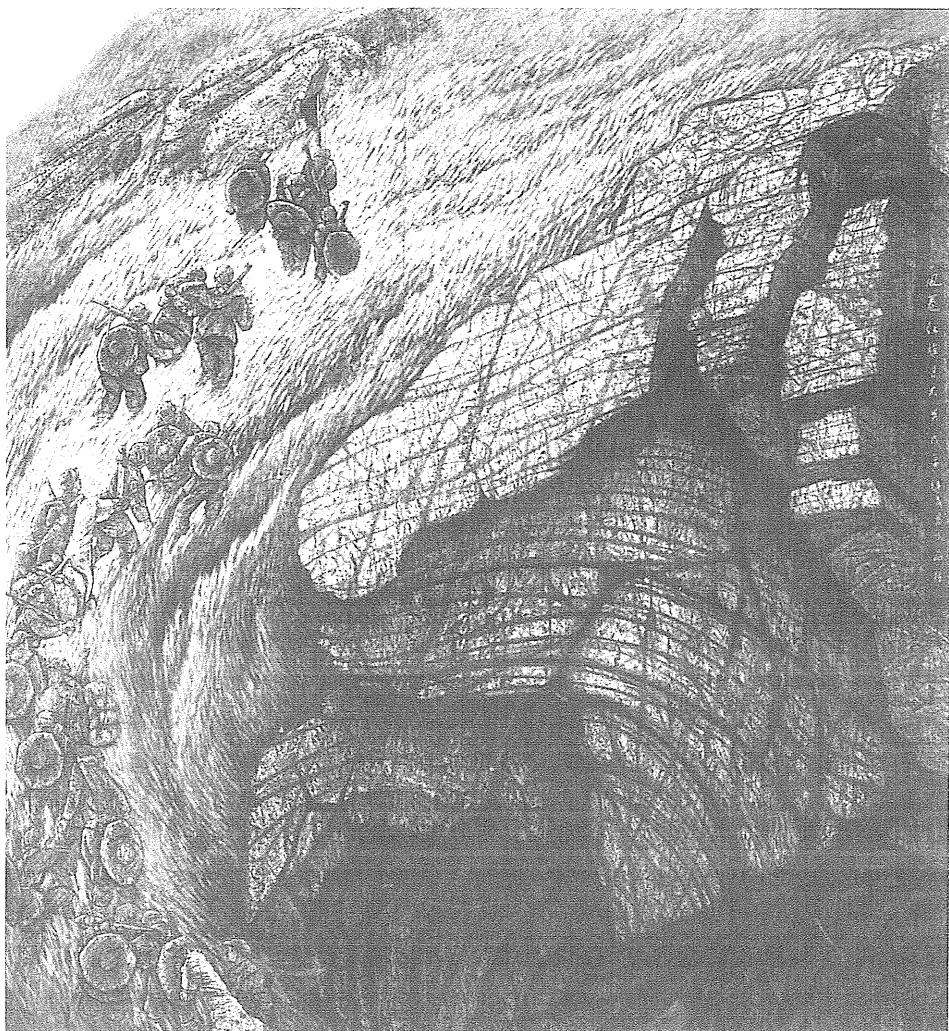




《雪里行军》(诗意图)



《岁月》(诗意图)



《风卷红旗过大关》(诗意图)



《远征图》(诗意图)

土地法*

(1930年2月7日)

第一章 土地之没收及分配

第一条 暴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政权后，须立刻没收一切豪绅地主阶级及祠堂庙宇社会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所有，由苏维埃分配与贫苦农民及其他需要土地等项的人民。只有农民协会，尚未成立苏维埃时，农民协会亦得执行没收及分配。

第二条 自耕农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除自食自用外，尚有多余，经当地多数农民要求没收的，苏维埃应批准农民的要求，没收其多余的部分并分配之。

第三条 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准其在乡居住，又无他种方法维持生活的，得酌量分与田地。

第四条 现役红军官兵及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照例分田，并由苏维埃派人帮助其家属耕种。

第五条 乡村中工商学各业能够生活的不分田。生活不够的，得酌量分与田地，以补足其生活为限。

第六条 雇农及无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

第七条 旅外不在家乡的，不分田。

第八条 分田的区域标准有二：

(1) 以乡为单位，由某乡农民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所耕田地总合起来，共同分配。

(2) 以数乡为单位，如有三四乡互相毗连的，内中几乡田多几乡田少，若以一乡为单位分配，那田少之乡不能维持生活，又无他种生产可以维持生活的，则以三四乡合为一个单位去分配。以上两种办法，第一种是普遍适用的，如有特别情形经乡苏维埃要求，得区苏维埃批准的，可用第二种办法。

第九条 分田的数量标准：

(1) 为满足多数人的要求，并使农人迅速得到田地起见，应依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2) 有特别情形的地方，经乡苏维埃请求得区苏维埃批准的，得以劳动的标准分配。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十四岁以上至六十岁能耕种的为一劳动单位)。

第十条 为求迅速破坏封建势力起见，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得采取绝对平均主义，重新瓜分。分田后，由苏维埃制定木牌插于田中，载明此田生产数量，现归某人耕种。

第十一条 所有豪绅地主及祠庙公田的契据，限期缴交乡苏维埃，或乡区农民协会，当众焚毁。自耕的田契，如有多数农民要求焚毁的，亦得焚毁。

第十二条 田地分配后，由县苏维埃或区苏维埃发给耕种证。

第十三条 凡乡中死亡、改业和外出的，将他所分得的田地收归苏维埃再行分配。或来或新生的，苏维埃应设法分与田地，但须在收获之后。

第十四条 暴动分田时，如农民已下种，则本季生产归原耕种

农民收获，他人不得刈取。

第十五条 河坝及大规模池塘，不便分配的归苏维埃管理，供给人民公共使用并督促人民修浚整理。

第十六条 大规模山林不便分配的，归苏维埃管理。人民需要采用竹木时，按照下列数目，得苏维埃批准，二十根以下的由乡苏维埃批准。二十根以上五十根以下的，由区苏维埃批准。五十根以上的由县苏维埃批准。

第十七条 大规模山林的出产，除供给人民需要外，其余归苏维埃出卖，所得之价，作苏维埃用费。各级苏维埃应得之成数，由高级苏维埃规定。

第十八条 木樟山杉山竹之不便个别分配的，得由人民数家合为一组，向苏维埃领取栽耕，以其生产分配组员使用。

第十九条 为满足贫苦农民要求起见，应将所有没收田地，尽数分与他们，苏维埃不必保留。但得保留没收房屋之一部分为公共事业之用。

第二章 废除债券

第二十条 工农穷人欠豪绅地主之债，一律不还，债券借约限期缴交苏维埃或农会焚毁。

第二十一条 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农贫民或小资产阶级之债，不论新旧，都要清还。

第二十二条 工农贫民欠商家交易之账，而非商业高利贷的，仍旧要还。但非本身之账不还，年限太久之账也不还。

第二十三条 工农穷人自己来往之账，革命以前借的，应全

还、减还或免还，由乡区苏维埃按照情形，适当规定。革命以后借的，全然要还。

第二十四条 工农穷人典当物件及房屋与豪绅地主及典业奸商的，无条件收回抵押品。

第二十五条 工农穷人典当物件及房屋与小资产阶级的，其抵押品，应收回若干或不收回，由乡区苏维埃照双方经济情形决定之。

第二十六条 钱会、谷会、豪绅地主奸商接取工农穷人在先的，接会人应将钱谷交还于纳会人，会取消。工农穷人接取豪绅地主奸商在先的，接会人无须交还钱谷于纳会人，会也取消。

第二十七条 苏维埃政权之下，禁止高利借贷。由县苏维埃按照当地金融情形规定适当利率。但不得超过普通资本在当地一般经济情况中所得利率之数。

第三章 土地税

第二十八条 为打倒反革命的需要（如维持并扩大红军及赤卫队，维持政权机关等）及增加群众利益的需要（如设立学校、看病所，救济残废老幼，修理道路河坝等），苏维埃得向农民征收土地税。

第二十九条 土地税须在苏维埃建立之后，而且群众已经得到实际利益，并经高级苏维埃批准时亦可征收。

第三十条 土地税按照农民分田数量分等征收：

1. 每人分田收谷五担以下的，免收土地税。
2. 每人分田收谷六担的，收税百分之一。
3. 每人分田收谷七担的，收税百分之一点五。

4. 每人分田收谷八担的，收税百分之二点五。
5. 每人分田收谷九担的，收税百分之四。
6. 每人分田收谷十担的，收税百分之五点五。
7. 每人分田收谷十一担的，收税百分之七。
8. 每人分田收谷十二担的，收税百分之八点五。

以后每加收谷一担，加收土地税百分之一点五。

第三十一条 土地税按照以下比例分配于各级苏维埃：

百分之五十归乡苏维埃，百分之二十归区苏维埃，百分之二十归县苏维埃，百分之十归省苏维埃。

第三十二条 山林出产，只供人民自己食用，没有多余的，不收税。自己食用之外尚有多余的，其多余部分，由苏维埃按照出卖价值，用适当比例收税。

第四章 工资

第三十三条 农村手工业工人及雇农，以前工资过低的要适当提高。以后工资数目，由苏维埃依照生活物价涨跌及农民收入丰歉两个标准决定之。乡区苏维埃规定工资，须得县或省苏维埃批准。



1930年2月，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图为“二七”会议旧址。



“二七”会议期间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1]

(1930年2月14日)

江西斗争第一步行动计划联席会议决议：

(一) 根据联席会议对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作根本计划。

(二) 目前行动的总目标及中心口号，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动的总目标，下列六个口号则是目前的中心口号。

1. 打到吉安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2. 打到吉安去建立赣西苏维埃政府；
3. 打到吉安去彻底分配土地；
4. 打到吉安去扩大工农武装；
5. 打到吉安消灭军阀混战；
6. 打到吉安武装拥护苏联。

以上六个口号各部队各政权机关各群众组织都要立即对工农士兵及其他被压迫群众（中小商人及学生）公开提出做广大宣传（对工农及城市贫民要在一切墙壁上写满，对士兵要作为早晚点名呼唤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广大群众达到政治任务，反对隐蔽政治目标及对宣传怠工。

(三) 敌方形势估量及攻取吉安的意义：

[1] 这是“二七”会议主席团毛泽东、曾山、刘士奇署名发布的通告。

1. 敌方形势：两广战争相持未决，福建政变爆发，湖南有对周烂吴尚的军事行动，湖北有鄂系（夏斗寅徐源泉）与蒋系的斗争，老桂系（李石樵李宣煊）与蒋系的相持，蒋阎正积极酝酿南北大战，工农士兵贫民游民的斗争普遍发展。在上述形势之下，蒋系在短期内无增兵江西的可能，在江西赣东赣北至少可牵制张辉瓒部三团（赣东二团赣北一团），张部只能用三团兵力对付赣西，谭道源一师不能回来，金汉鼎受闽西工农牵制，同时又有参加争福建地盘的必要一时不容易到赣西。

赣西成旅两团朱旅一团及靖卫队的部署如下：吉安二营靖卫队枪一百五十支守城，分宜、袁州、新余三县共有一营另一连流动游击，加以分宜有靖卫队枪三十支，袁州有商团及靖卫队枪三百支，新余有靖卫队六十支，峡江有易团团部及兵七连又靖卫队八十五支有工事，三曲滩有一营人游击于吉安三曲滩间，吉水有二连（新开去）及靖卫队六十八支，新淦只靖卫队三十五支，兴国万安均靖卫队守城，在以上各县敌军及统治阶级都非常恐慌。

2. 我方形势：赣西及兴国、于都、宁都、南丰各县共有赤色群众百十五万，宁冈、水新、莲花、永丰、乐安、宁都六县县城都是我们的，泰和、吉安、吉水只有县城在敌人手，四乡都在我们手，安福、新余、分宜、峡江，南丰、于都都各有一部分在我们手，兴国有大部分是赤色区域，加以红军四、五、六军都到赣西各地，尚有许多地方武装，斗争情绪很高。

3. 在上述敌我两方面形势之下，“打吉安”确是执行广大群众的要求。过去业已发动了广大群众动摇了敌基础，故这一行动口号是十分对的。但我们第一步不是打吉安城，而是实行围吉安城，目的在使吉安城内生活更加困难，人心更加恐慌，白色统治更形孤立，

然后进行第二步计划（后附）。

（四）部队的调动及布置：

1. 赣河以东：A. 四军三纵队及军直属队全部于二月十三号集中乌江市，十四号进攻吉水城，要有决心地打下来（四军三纵队在十二日以前要把永丰城拆完）；B. 六军第二纵队部第四支队二月十三号开往中鹄，十四号配合中鹄群众及武装消灭水东之敌，（二连）监视吉安城，响应四军进攻吉水；C. 中鹄苏维埃除分一部分群众与四支队配合进攻水东外，另要分配一部分群众于十四号清早开往吉水城，与四军配合进攻吉水城内之敌，消灭敌人，担任拆城及搭浮桥；D. 六军第二纵队第五支队于九日到达荇田东固，赤卫队由袁振亚率领于十日到达荇田与五支队取齐，组织一行委指挥荇田一带工作，袁振亚为书记（行委名单及任务另附）；E. 四军第四纵队及二十五纵队宁南游击队的任务仍如前委布置在宁都、广昌、南丰三县扩大红色区域牵制金汉鼎及筹款；F. 四军全部放弃永丰攻取吉水的意义是：揭出四军的目标，于吉安对面威胁吉安城，影响赣河下游群众起来，并使南昌反动政府的目标集中赣西；G. 吉水攻下后前委及吉水县委的工作①迅速拆城，②建立县政府，③建立县城工人组织，④发展城内党与团的工作建立区委。

2. 赣河以西：A. 五军及边界赤卫团的行动和任务：五军及边界赤卫团（至少要四百枪）限二月十三日集中永阳，以永阳为指挥中心，配合西区群众武装，向吉安城附近威迫，同时注意泰和之敌向吉安退却时相机截击之，所有西区一带群众武装都归五军指挥。B. 六军第一纵队（原二、三团）限二月十三日到达阜田集中（三团如赶不及可迟一天到达，二团必须同时到达），以阜田为指挥中心，配合相水金滩群众武装及吉水游击队向三曲滩吉安峡江三方面

威迫。甲、从第一纵队派出小部队配合群众武装向三曲滩扰敌，与吉水四军取得联络；乙、峡江边游击队向峡江城扰敌；丙、内外延赤卫队及儒行游击队集中桐树坪向吉安城扰敌（扰敌即每天拂晓及深夜向敌打枪），断绝吉安三曲滩敌人与下游的交通亦是六军一纵队的任务，所有北路的群众武装都归一纵队指挥。

（五）行动纪律及财政政策：

1. 各部队及工农群众到达的地方尤其是城市未得命令不得自由到民间及商店去搜索。
2. 各部队到达地方特别是城市应有计划地分配部队及负责人员去搜索应该搜索的处所，捕捉应该捕捉的人犯。
3. 关于没收反动财产及捉拿犯人均归政治部指挥并处理关于搜索残余敌人及没收反动派军用品均归司令部指挥并处理。
4. 凡罚款筹款没收及处理人犯均须由政治部或群众政权机关明白布告或宣布罪状。
5. 不得破坏学校及邮政。
6. 没有政治的必须时不得破坏公共机关及民众一切器物用具。
7. 禁止没有政治意义及群众基础的烧杀。
8. 财政政策：A. 红军军饷及政权机关的用费主要应向豪绅地主取得，而不应加增中小商人的负担。B. 商店资本在二千元以下的不筹款，两千元以上的按照下列比例要求他们捐助军饷：比例资本有两千五百元捐款三十元，三千元者捐款四十元。此外，资本增加一千元加捐于全部资本数百分之一。如资本四千元，除捐四十元外则加捐四千元之百分之一，共捐八十元；资本五千元者，除捐八十元外则加捐五十元，共捐一百三十元；资本六千元者，除捐一百三十元之外则加捐六千元百分之一即捐六十元，共一百九拾元；资

本增加者以此类推。C. 向豪绅地主筹款用罚款名义，向商人筹款用捐款名义。D. 对于豪绅地主所开的商店于其商店资本部分仍按照比例向其捐款，于其豪绅地主部分则加以罚款。E. 反动分子所开的商店经过宣传取得中小商人的同情之后，可以没收，否则仍不要没收。对于反动店主在群众意义的必要时应该捉拿并罚款。F. 河流交通在军事的必要上得施以检查，或有时期有范围地断绝船只来往，或扣留船只，不得没收船上货物及其他财产。

（六）党内外群众的动员：

1. 伟大的政治任务：只有动员党内外一切群众才能达到，过去许多地方对于行动目标只有少数负责人知道不让群众知道的错误应该坚决的废除。

2. 此通告到达各地方后要迅速召集党及群众的各种会议或大会，详细报告政治形势国际国内江西赣西反革命势力崩溃及革命势力高潮的形势斗争前途（工农夺取江西爆发革命）和目前行动的目标（六个中心口号），并宣布纪律（行动纪律各条），红军及政权机关并要发传单出布告，使群众完全明了我们要做什么。

3. 党内动员：A. 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开会讨论这一通告及续发的各通告。B. 开活动分子大会，由党的指导机关派人作报告，军队以军或纵队或支队为单位开，地方以区为单位开。C. 开支部大会报告通告内容发动党员全部。

4. 军队动员：A. 召集军政工作人员会议报告政治形势斗争前途行动目标及纪律各项，讨论执行方法，领导士兵积极行动。B. 举行士兵集合讲话亦是报告政治形势等各项，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

5. 工农群众动员：A. 召集各级群众机关及工农干部会议（即开各级委员会，以区为单位召集群众大会。B. 群众大会名为某区

攻取吉安示威大会，此通告到后三日内必须举行，事先要有好的准备，事后要将结果报告上级机关。C. 群众大会的中心口号除开前述六个中心口号外再加以下列六个口号（共十二个口号）。

- ①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消灭反动势力；
- ②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分配土地；
- ③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建立苏维埃；
- ④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扩大工农武装；
- ⑤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消灭军阀混战；
- ⑥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武装拥护苏联。

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

(1930年2月16日)

四军前委，赣西特委，五、六两军军委联席会议在吉安之陂头举行，二月六日至九日开会四天，联席会议开会时节的政治形势是帝国主义积极布置反苏联战争，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群众共起反抗帝国主义，中国军阀混战日益扩大，财政经济危机遍布全国，工农兵土城市贫民的反抗运动到处发展，特别是以江西为中心的南方各省红色武装斗争有大规模的开展，打红旗的工农兵土贫民群众在三百万以上。联席会议明确认识世界革命高潮要随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运动中爆发，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地要到来，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成为世界苏维埃的有力支柱，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都比别省要成熟。联席会议明确认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形势，也是扩大土地革命影响于全国各地的鲜明旗帜。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有力分子，而且是世界意义上实行着武装拥护苏维埃促进世界革命的有力分子。

联席会议在上述政治估量之下规定着党的主要任务是：1. 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 深入土地革命；3. 扩大工农武装。由于这三个任务之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动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的周围，成为推动全国

革命的一大动力。联席会议又告诉同志及一切正在斗争的群众，实现这三个任务不是完全不费气力的，它是要从激烈的艰苦的斗争中方能取得，从前所没有的大的艰苦斗争将随革命势力的前进而到来，因为和我们作对的不但是中国的统治者——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而且是世界的统治者——帝国主义，但艰苦斗争的前途则必然是全国革命高潮援助南方革命势力，南方革命势力则要汇合全国的革命势力把统治阶级完全埋葬。

联席会议指出，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

联席会议决定革命的土地法，反对迟迟分配土地，指出不论何地，凡暴动驱逐了豪绅之后，须立即没收土地分配与农民。没收标准不限于豪绅地主，只要真实的群众要求，自耕农的土地亦得没收。对于分配土地，指出土地革命的当前目的，是动摇封建基础和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应把所有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尽量分与一切需要这些东西人，只有不便分配的（高山大塘），才由苏维埃管理，仍归人民公共使用。联席会议指出，表面上站在左边在现时阶段主张所谓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理论，实际是帮助豪绅保持封建势力，违反彻底破坏封建基础的任务。同时，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与男女老幼平分，应该采取后者，这是为了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所不可忽略的紧要策略。“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联席会议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指导在这斗争局面下的土地

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有组织最高的指导机关的迫切需要，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应该扩大其任务，变更其组织，担负这一伟大的使命，四军则组织军委指导之。前委名单如下：毛泽东、郭贞、曾珊、王怀、方志敏、朱德、潘星元、黄公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指定毛、曾、刘、朱、潘五人为常委，黄、彭为候补常委，毛为书记。联席会议为了赣西南的统一指导，决定将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合并，指定新的名单，成立赣西南特委，同时指定四军军委名单。又决定召集赣西南党的代表大会及江西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

前委在联席会议指出的任务之下，业已开展工作。特为通告红军及地方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

前委

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

(1930年3月18日)

一 环境分析和行动计划

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现有成光耀、朱耀华、邓英三旅及唐云山残部，蒋系因对阎作战虽不能分兵到江西，但即此三旅以上兵力，使四军暂时不能走北进的路。

金汉鼎师向福建开，目的在与刘和鼎夹击卢部进占福州。赣南、闽西空虚，给我们以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的好机会。闽西只张贞部队，稍远的将来我们可取得漳州，使红色区域直通海口。同时两广战争益趋激烈，东江驻军只有一旅内外，东江西北七县的红色区域有扩大之可能。赣州虽未攻下，然给赣州群众的影响仍然是不小的，对全国也有相当的影响。新的军队到赣州接防短时期没有可能。新的军队未到赣州以前，金部七十团是无法离赣州的。

在上述环境之下，红军第四军的行动应该以三个月为期分路游击，其游击区域是：赣南之赣县、于都、瑞金、会昌、南康、信丰、安远、寻乌各县；东江之五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蕉岭、大埔各县；闽西之上杭、武平、长汀、宁化、连城各县。六军二纵队的游击区域三个月内应该是万安、赣县东乡、于都北乡、兴国东乡、宁都南乡和广昌石城各县。六军一纵队的游击区域是吉

安、安福、分宜、宜春、新余、峡江、吉水、永丰、乐安、新干各县。六军三纵队则是泰和西乡、遂川、万安各县。赤卫队的二十二纵队应与六军二纵队的行动配合，担任兴国全县、于都北乡、宁都全县的红色区域的完成，宁南游击队则担任广昌、南丰、宜黄的红色区域完成。红军第五军，第一步应与六军二、三纵队的行动配合，完成赣河上游的工作（泰和、遂川、上犹、万安等县），第二步应开返五军的根据地湘鄂赣边一带，推广湘东、鄂南、赣北的红色区域，并使赣北与赣西的道路打通起来。

分兵游击的意义，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在现时这种环境之下，若仍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反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分兵游击一时期后，因为别一种环境的需要和夺取闽南、发展赣东等地，便应该集中行动。所以我们要反对绝对集中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分兵主义。

二 同时扩大同时深入

只求扩大不求深入是严重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赣西南与东江等处，很久不分配土地，不建设苏维埃和忽视赤卫队组织是十分错误的。红军游击时亦易犯这种只求扩大不求深入的错误。每处住不到三五天又开起来走，做了些宣传，也组织了几个小小的农工会，几个嫩芽般的支部，但红军一走动，马上就塌了台，这样的组织算不得组织。这种只做宣传不做组织的地方不是没有的，如南康、大余、会昌、瑞金、石城等县，有些原来没有一点组织的，有些原来有点组织的但只是很小的一点，我们要在这样的地方做深入的组织

工作是白费力的，在这样的地方自然只能做些宣传及分配豪绅谷物的工作，给群众以相当的影响，就可以开起来走。但在别的地方，如宁都、于都、安远、寻乌、长汀、武平等县就完全不同，不但原有党和群众的组织，而且有小块甚至大块公开的红色区域，有长期的武装斗争经验，红军到了这些县内，要有计划地帮助原有红色区域的党及群众去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加强党与团体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将原有区域扩大到全县，并推广到邻县。比如在赣南就应该扩大宁都、于都、安远、寻乌四县整个的赤化，在闽西要往武平县、长汀各县整个赤化。这样就把瑞金、会昌、石城包在中间，再图发展闽赣的联系，就成功了。寻乌的红色区域与东江的红色区域原来是通的，这样三省的接连都成功了。若不使这五六县工作深入，单是走马观花地游击一番，如去年赣南四十五天工作，则闽粤赣接连的任务，就不知何日才得实现。在一定时间，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一地区，同时即深入这一地区，是很有效力的工作方法。红军各部队分开工作时，应该指定时间，支配于指定区域。应该做深入工作的地区，工作时间要支配多，不做深入工作的地区，工作时间要支配少。在一定地区内（如四军三纵队之于都）哪块是要支配时间多的，哪块支配时间少的，又要计划，才能工作更有效。

三 伴着发展

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从我们的经验中是显示工作的效力的。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它去发展，这个观念要深刻地建设起来，因为从前没有过。过去的经

验，非如此则工作白费力，湘赣边界大块红色区域的创造，是因为大革命时，茶陵、酃县、莲花、永新、宁冈各县的群众斗争有一些党的组织的残渣，伴着这些固有的基础，才发展起来的。遂川原来没有基础，勉强制造的结果，仍然弄不出一个局面。四军闽西七月的分兵游击，一纵队在坎市兰家渡沿汀河而上，复折返上杭、永定交界一带，都是伴着原有的一些基础发展的，是“打通”“连贯”的工作，所以一纵队那次的工作效力特别大。三纵队在龙岩龙门一带是伴着原来斗争的区域，帮助农民去工作，所以也收了效力，可惜工作时间不久，仓卒开入闽中，所以效力不及一纵队远甚。二纵队去的雁石、姑田一带，原来一点基础没有，所以是完全白跑一趟，简直无效力可言。这回四军到江西来宁都、乐安、永丰、藤田四地的分兵，只有宁都四纵队一路收了大的效果（四纵队在宁都二十天不但推广了红色区域，主要还要在它纠正了宁都党的机会主义，执行了分配田地、组织苏维埃、建设赤卫队的重要任务）以外，其余三路都没有达到推广赤色区域的效果，因为三地都不是原来有组织的，只有三纵队曾派了一个小部队到吉水，可惜三纵队的党发展这个区域太迟，未能派很多的工作人员下大力去工作。虽然我们并不放过它，上面这些例子很够我们认识：“伴着发展”的口号是无疑的正确。虽然我们并不限制红军的脚板，不准跑入纯全白色区域去一步，有时为了全国的意义或其他不可避免的原因，如“影响时局，解决经济问题”和“退却”等等，是要跑入原无基础的区域去的，但这不是工作路线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无疑是“伴着发展”，也即是历来所说的“波浪式的向前扩大”。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应付地方党部及群众“请兵”的问题，有些同志对于地方党及群众向红军请兵去打土豪、打民团一件事，随

便的看过了，不知地方群众请兵是好工作机会，因为群众做了主体，一切布置设计都是群众自己的，红军趁此机会帮他一手，斗争之发展是异常迅速的，不顾群众的请求只是主观地布置工作，失掉极好的发展机会，这是个人主义的工作路线，也是错误的。

四 武装农民

扩大红色区域主要条件就是农民武装，若不能创造农民武装，则所谓深入工作只是一句空话，游击队所到之处，凡属做有深入工作希望的地区，不但不能把原群众武装收缴了去扩大红军（要在广大赤色区域的腹地部分土地斗争业已深入，武装作用减少了的时候，才能有计划地集中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红军）。在红军战斗力不大，感觉损失的条件下，还一定要由红军拨枪支去武装群众，不但要出枪，有时还出子弹，不但拨出子弹，有时还要拨出军事工作人。在红军力量不强，事实上无法拨出枪弹及人员的时候，就要尽可能地努力去收缴豪绅及小部队敌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总之，游击部队对于地方武装是与他的工作同始终的，谁不把武装地方看作十分迫切的工作，谁不看重地方武装，如同看重他们自己的部队一样，谁就是抛弃群众的机会主义者。

五 训练地方干部

红军党的斗争经验，是比许多农业区域的地方党部要丰富些、进步些的。同时地方斗争的发展，工作人员缺乏，工作路线不正确，也就越发表露。因此红军党的指挥机关，无疑的要负担新发展

区域地方干部人材训练的责任，短时期党内训练班和群众领袖训练班之说，依然要按照从前的经验去进行。

六 地方党的行动要与红军的行动合拍

去年四军在赣南东河一带游击时候，赣南特委却去注意西河的日常斗争，把东河方面红军发动起来了的热烘的群众，一点不去指挥，让他冷下去，机械地执行赣粤大道为中心区域的口号，忽视红军在东河一带的政治作用，忽视赣南、东江、闽西三区域联系的伟大意义，表现了十足的机会主义，赣南等处如有过许多许多乌龟干部，红军到了许久不出来接头，要他发动武装斗争就吓得魂飞魄散，有的比较积极一点，也不能利用红军游击的时机，加紧发展斗争的工作，这些地方党的行动与红军的动作不合拍的现象，是使工作失去效力的最大原因，此现象赣南最利害，赣西南特委要努力地纠正。

七 红军党部地方党部的关系

红军的军委与地方的特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军委可以直接地指导工作。红军的纵队委与县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区委以下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支队委和地方的区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地方的支部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大队委与地方的支部，开联席会解决问题。特委对于纵队委可以指导它的工作，但在超地方性的红军各纵队，不能完全束缚它的行动。前委以纵队为单位，派遣的巡视团与特委开联席会议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行使指导的职权。

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1]

(1930年3月19日)

为令知事。照得攻城之法，不外奇袭强袭两种，本军此次攻打赣城，即以强攻之决心，施行奇袭之手段，乃以下述缺点之影响，致未克奏效，殊为憾事。兹将是役之缺点及战后之教训，大略列下，以资他山之鉴。

一、敌情之判断不确

屡据各方来报，有谓城中无敌，仅靖卫团^[2]百人，有谓城中敌人仅一营者，致使指挥官之判断敌方兵力误为一营，实则城内之敌为七十团全部（三营，每营步三连、机枪一连）。因此攻城之配备及计划多轻忽不周。

二、地形未预先观察

先日一、二纵队既抵城门附近，敌即闭城顽抗。当时我方尚未决心攻城，故高级指挥官未经率领各部指挥官观察城郊一带地形，致翌日四纵队到达南门附近时，未能即时占领有利阵地，以为尔后扒城之预备。对于炮兵、机枪之阵地，亦未预先选定射击区域，射击距离等更无测定。

三、事先无充分准备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二号训令。

[2] 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当我军到达茅店、冬田一带时，尚未准备扒城器具（如竹梯等），以致临时匆促。

四、上下决心不一致

在战斗间，各部官长以至士兵偶见城中之敌实有一团兵力，遂有一部动摇其攻城之决心，未照攻击命令实施。

五、战场报告不确实

战场之报告实为上级指挥官判断敌情相机处置之资，不宜轻敌妄大，亦不应^[1]此次战役，有一时报告欲即再举攻击，而旋又报告不能攻击，反复无常，毫无正确^[2]指挥官处置不易。

六、不按时施行总攻

攻城命令原定十六日晨三时三十分施行总攻击，乃第四纵队于四时三十分尚未到达原定之东南两门间之预备阵地，以至施行总攻击时间错过，及南门外发火时瞬已天亮，遂使扒城不能奏效。

七、指挥不适当

一部指挥官陷于急进务胜之感情，而地形之顾虑不周，攻击点之选择不适宜，当不应攻击之地区（如正对城楼之大路）及时间（如不在夜间而在日间）而施行攻击，而应施行攻击之地区及时间反而错过。

以上诸项系略举其大者，至各部在战场上部分之缺点，应由各部自行召集军官会议讨论批评之，并具报本部为要。此令。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 泽 东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九日

[1] 原件在“不应”之后空缺六个字。

[2] 原件在“正确”之后空缺四五个字。

整顿军风纪的训令^[1]

(1930年3月21日)

为令遵事。照得本军在此工作，原为争取群众，训练本身，故于军纪风纪一层，自应严为遵守，岂容稍有松懈，致生不良影响于群众中，是以不嫌三令五申，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2]，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所乐为。故凡违反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至于花街柳巷，尤禁荡检闲游，以免一染恶疾，则百般困难，既戕其身体，复贻误于要公。况值此春初，百病丛发，各官兵人等，正宜多加谨慎调摄，以冀健康，方克肩兹革命之重任，安可自寻疾病，以误工作。为此，除另行令饬特务支队派出巡查外，特此剀切训诫，勿得故违，致于拿办。切切此令。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 泽 东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1] 这是1930年3月21日17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省南康县唐江镇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三号训令。

[2] 三条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大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是红军在1928年提出的。

关于官兵考绩的训令^[1]

(1930年3月29日)

为令遵事。照得军官、军佐之任免升调的适当与否，直接影响于战事的胜败和工作的利钝，所以要有考绩调查，使上级指挥机关明了各级官佐工作状况，而施以指导、纠正和教育。况且红军在游击时期，其重要任务在打倒阶级敌人，武装工农，帮助地方建立政权，扩大赤色区域。为达到此种任务，所以在战时，要能使官兵一致，奋勇猛进，歼灭敌人，解除其武装而武装工农。在平时，则一面官兵须一致做宣传、发动和组织的工作，一面各级主管官须负责训练本部士兵。因此，在这种重大责任之下，红军官长的本身训练和训练士兵是很重要的工作。查现在我们军中官佐提升调动都只在经过战争牺牲之后，迫不及待地将将就就把一个人补上一个缺，或者在下层去提升，这样都是无计划的用人行政。至于教育方面，我们的红军不是行军作战，就是分兵工作——这自然是环境和任务所必需的。但因此却使军部没有方法去有系统地计划各纵队的士兵教育，这样士兵教育只有归各级（纵队、支队）主管官负责计划，而军部仅能给以方针的指示。所以官佐任用得适当不适当，就是说他们在战时指挥能力、平时管理方法、教育训练等等，尤其是游击时的群众工作，是不是适宜的，这都关系于红色战事和群众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五号训令。

作。至于士兵中，自然不少勇敢老成、素有作战经验的工农的革命分子，其能力可以充当官佐的，然而我们从没有考绩调查。对于官佐则无从有计划而适宜地调用，对于士兵也无从提升。教育计划，更付诸阙如。现在为了（1）使官佐之调用适宜，（2）能将士兵中勇敢进步比较有能力的提升任用，（3）使全军官兵的教育训练都能够比较有计划的推动之下得到良好的效果。所以决定如下的办法：

一、规定教育系统。以后士兵教育归纵队，军部只能给以教育方针的指示（但各纵队之教育计划及实施状况仍须随时报部核查），军官教育则归军部。

二、实行测验制。以后教育经常采用道尔顿测验制^[1]，以促其进度之迅速。测验之办法如下：

测验之机关

- （一）兵卒之测验归大队（由支队派员参加）。
- （二）军士（班长、副班长）归支队（由纵队派员参加）。
- （三）下级干部（中队副以上，大队长以下）归纵队（由军部酌派人员参加）。
- （四）中级官佐（支队长、支队副、直属队队长、股长）归军部。

三、调制官兵考绩表（表式另列）。

- （一）考绩表分三项
 - 1. 调查。
 - 2. 测验。

[1] 道尔顿测验制，是美国人帕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这种制度废除课堂讲授，强调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

3. 考绩。

(二) 兵卒之考绩

1. 调查：姓名，年龄，入伍时间，战役及负伤次数（政治方面政治部规定）。

2. 测验：(1) 学科——典、范、令、游击战术。(2) 术科——操场、野外动作。

3. 考绩：个性，嗜好，能力（由各排长考查填报）。

(三) 军士之考绩

1. 调查（同上）。

2. 测验（同上）。

3. 考绩：个性，嗜好，班之管理方法及战时统率平时助教之能力（由各大队长、大队副、政治委员考绩详定之）。

(四) 干部之考绩

1. 调查：姓名，年龄，籍贯，奉任现职日期，未入红军前之经历，入红军后之经历，参加战役及负伤次数，曾受赏罚及有何特长。

2. 测验（政治另由政治部定之）：战术原则，射击学理，阵中要务。

3. 考绩：主张（是否合乎红军政策及遇临时事变有无主张），管理法，训练法，游击工作，指挥能力及果断，个性（对同事之关系情感），命令之执行，在士兵中之信仰。

(五) 中级官佐之考绩

1. 调查：同干部。

2. 测验（政治由政治部另定之）：战术学，射击学，地形学，阵中要务。

3. 考绩：同干部。

四、各部处之教育。

(一) 军需处：军需处对于各纵队经理人才，应每月出试题，举行道尔顿式之测验，并尽可能地与以工作之指示，并用开会方式教育他们。

(二) 军医处：军医处则对于医官、看护士、看护兵、担架兵等，亦须有计划地施以普通医学、药物学与救护教育，并行测验。

(三) 副官处：副官处对于各级副官之管理（对于马夫、火夫、公差等），须时常予以指示并开会讨论心得，纵队或支队副官应时常召集马夫、火夫、挑夫、公差等训话。

以上关于教育之方法，各部队务须切实执行，并且用军官会议或部务会议的形式去讨论执行的方法，把这种方法及意旨转达到下级去，这样才能使红军中军事技术进步。军事技术进步自然也更容易达到我们的政治任务。为了革命的工作，希望各部一律执行为要。此令。

附表如下^[1]。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 泽 东

公历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1] 本文收入本书时，将表略去。

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1]

(1930年3月29日)

为令遵事。照得红军为工农革命之斗争工具，在此反动政局日益崩溃，革命潮流日形高涨之际，自应多征忠实勇敢之工农分子扩大红军，以资扑灭反动势力，获取最后胜利。惟近查各部队对征募新兵一项，只图征募小公差兵及任意增添挑夫，极少注意战斗兵之补充。更有收募五官不全、驼背、跛足及患肺痨、花柳病、盲肠炎、痔疮等症者，此殊不知五官不全、驼背、跛足者不特有关红军观瞻，实亦不合军人之资格。原因患目疾者不能瞄准射击，耳聋者不能分辨号令，鼻塌者多为梅毒遗传且易受传染病，口吃者不能担负军人之传达任务，至于身患肺痨、花柳病、盲肠炎、痔疮诸症，不但身体孱弱不能随军斗争，抑且有传染他人之危险。本长鉴于上述各项之非是用，特规定征募新兵及新兵入伍时应注意之事项如下：（一）征募新兵之资格：年龄须在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身长四尺二寸（裁尺）以上，体格强健，无恶疾及非五官不全者。（二）征募职权及检查手续：各大队皆可随时征募新兵，但必须经军医处或卫生队检查合格后始得补名。如分兵（指一支队分出）游击时，得由支队长、政治委员或支队副亲自检验，确与第一项资格相符合者始行补名。（三）新兵教育：教育以集中为原则，新兵多则在纵队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六号训令。

设新兵大队，少则在支队设新兵排。教育训练至相当时期及有相当程度时，始行补充入连。自训令后务仰转知所属，一体遵行。倘再玩忽乱收不符上述规定者，除否准其补名之伙食外，并处罚其主管长官，决不宽贷。切切此令。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 泽 东

公历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宣传员工作纲要*

(1930年4月26日)

第一条 每一宣传员须备一副写标语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颜料，根据本部规定各种标语，随时随地写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的墙壁上。

第二条 根据本部规定的标语本子，除每个都要在墙壁上书写外，字数较多的标语得用有色纸写好，张贴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之处。

第三条 每到一城市，要用红布写上本部规定之主要标语，悬挂在街道中间。

第四条 在宣传队中，要经常指定专人背带所有宣传品及浆糊筒，将宣传品张贴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之处。

第五条 每一宣传员无论在行军、驻军，均须携带宣传品，碰见群众即行有计划的散发。

第六条 在白色区域，群众受反动宣传恐慌逃避时，各宣传员要注意将宣传品适当地配置，让群众回来可以看见。例如将各种宣传品贴于通衢大道之中及学校、工厂、商店、兵房之内。

第七条 在宣传队中，择定善于词令的宣传员若干人，担任口头宣传，随时随地打着宣传旗及引动群众之工具，召集群众对之宣传，并在群众中找出比较接受宣传的分子，作个别谈话。如群众很

少时，即和他们作个别谈话。

第八条 在宣传队中，择定性近艺术、善于词令的宣传员，担任化装宣传，在有一天以上休息、群众较多的地方去工作，并设法召集群众大会。

第九条 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将每天调查所得的结果，报告调查统计股，做成总的统计。

第十条 每一宣传员要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置。

第十一条 在打土豪时，须分派宣传员随保卫科出发作宣传，并帮助保卫科工作（如没收谷物分给贫农等）。

第十二条 在开群众大会时，须负责布置会场，召集群众维持会场秩序。在开会前后，深入群众中去宣传。

第十三条 在作战失利时，或敌军向我进攻因战略关系退却时，各宣传员须多写对敌方士兵宣传的口号及多散发对敌方士兵的宣传品。

第十四条 在作战时，每一宣传员须帮助抬扶负伤官兵，并雇请战地附近群众扛抬负伤官兵，引送至卫生队上药。

第十五条 在每一战斗结束时，每一宣传员须注意招待敌方官兵与之谈话，作个别的宣传。

第十六条 战事结束以后，应帮助雇请战地附近群众收埋死亡官兵。

第十七条 每个宣传员，于随时随地须注意维持军风纪。

第十八条 每个宣传员，每日工作结束后，须将本日工作情形报告队长，由队长汇报成书面报告交科长察阅。

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发布

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1]

(1930年4月)

为令遵事。我们红军作战既没有强盛的火力压倒敌人，又没有军用化学可以制胜，全凭着已腾沸的热血、誓死斗争的决心和敌人肉弹相搏，用血去染成赤色区域。所以每次胜利全靠官兵奋勇猛进，以我们的勇敢骇倒敌人。然而，这样就要靠有强健的体力才能一天奔跑百多里路，抢十多个山头，作几场恶战。这样还是不够，我们还没有制弹厂，还没有固定的后方。子弹无多，就应该特别爱惜，射击精确才能杀伤更多的敌人。如果跑步前进而落伍了一大半，就失了团结而强固的冲力；快放齐放，打不到一个敌人，就不能摧毁敌人的战斗力而动摇他们的阵地，对于掩护冲锋更不发生威力。所以没有健强的体力，就有万分的革命精神和志愿也无从施用；没有良好的射击技术，就不能在战场上杀伤得多数敌人，而自己也就多受损失。因此，锻炼身体增进体力，熟习瞄准增进射击效能，是现在红军军事训练中的第一要着。现在规定各部早操时间废除跑步，或多操持枪体操，或徒手体操。在每星期的操课表中须另有体操时间。晚上游戏多做各种运动，如竞走、踢球、演习、叠罗汉……在休息时间比较长久的时候，可酌量设置简单器械——单杠架、吊绳、吊棍、秋千、吊环、爬城索……（此等器械都可以带走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八号训令。

的)施行器械体操和设备些障碍物，施行应用体操——就是做超越竞走。这些事情只要有一个星期以上休息的地方，有相当的地点时就可以举行，派兵士去做并没有困难，而且他们必定也很欢喜来干。另一方面，在学术科施行中都要特别注意射击教育，加多射击教育的时间，举行射击比赛。以后军部拟在每一个月至两个月之间，召集一次各纵队及军直属队的体力比赛和射击比赛，由各部挑选选手参加，分别给奖，以资鼓励(比赛办法临时再行拟定颁布)。现在各纵队和军直属队就要开始准备，要知道这是增进红军战斗力的唯一要件。望各部长官负责转达各兵佐一体知照，并督促执行为要。此令。

军长 朱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反对本本主义^[1]

(1930年5月)

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1]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2] 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1]，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1] 参见《论语·八佾》。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 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

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 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 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1]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 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1] 李逵是《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1]，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2]、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

[1]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军第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2] 这里是指中农。

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

雇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游民

手工业者

小商人

中农

富农

地主阶级

商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我们暂时的工作区域中所没有的，只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其余都是经常碰见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两者的策略始终

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1]，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 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

[1] 这里所说的山头指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平地指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的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向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进军，开辟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

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1]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七 调查的技术

(1) 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

[1] 指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1929年初，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曾经把这些决议案汇集印成单行本，发给红军和地方的党组织。

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 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 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4) 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5) 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

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6) 要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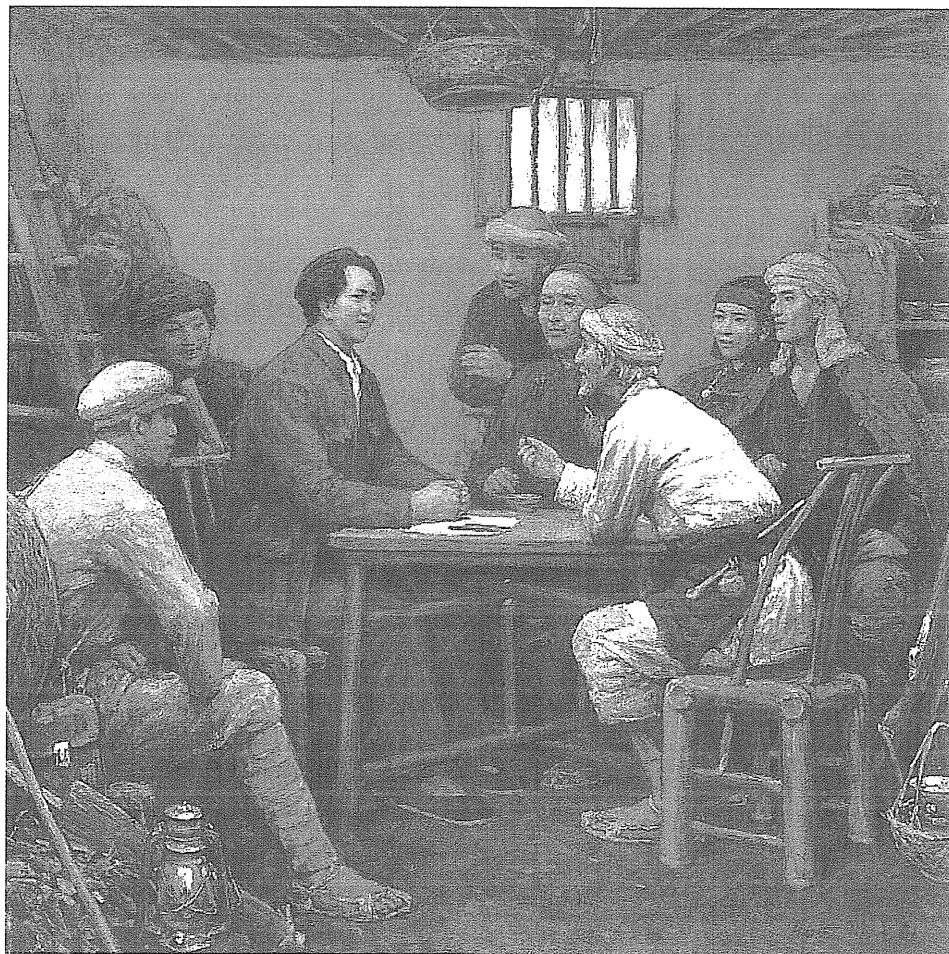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7) 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一文。图为《调查工作》的封面、目录和内容（部分）。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油画)

寻乌调查

(1930年5月)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1]。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2]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是一九三〇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3]（二月

[1] 宁冈调查，是毛泽东在1927年11月做的。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1928年春做的。

[2] 蒋，指蒋介石。桂，指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1929年初，蒋介石派遣其驻江西的第一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派遣其驻湖南的第四集团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

[3] 陂头会议，又称二七会议，指1930年二月上旬，毛泽东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武装；在土地问题上，否定了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主张，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

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1](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中学生，破产小地主，曾任小学教师、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篁乡区人)。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2]职员，城区人)、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3]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还有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

[1] 汀州会议，又称南阳会议，指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会址先在福建长汀的南阳(现属上杭县)，后移至汀州城。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会议除肯定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

[2] 县苏，县苏维埃政府的简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通称苏维埃政府。本书中的“区苏”“乡苏”“市苏”，分别为区、乡、市镇苏维埃政府的简称。

[3] 陈炯明，(1878—1933)，广东海丰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1925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钟步瀛（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到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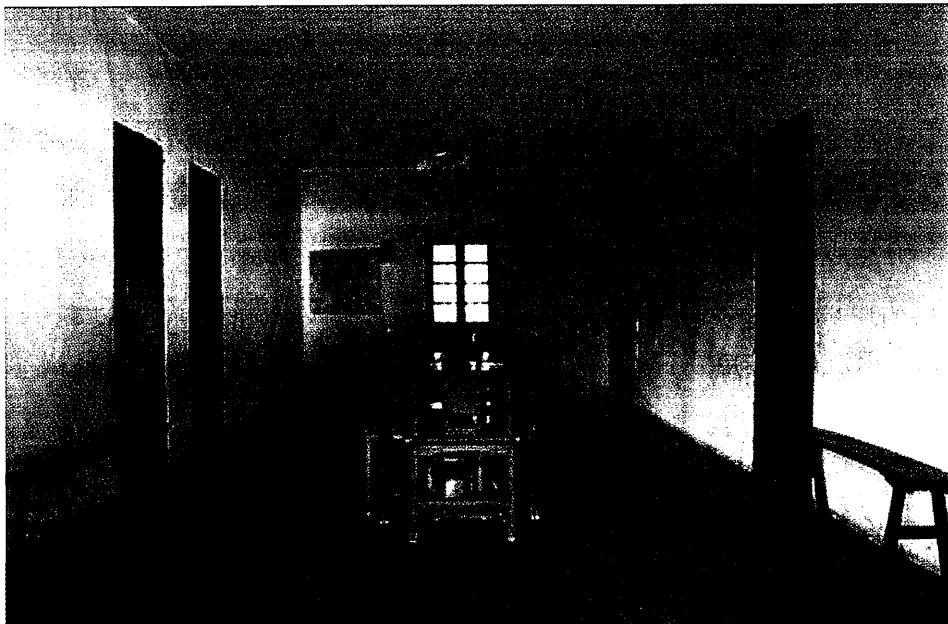
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于宁都小布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城马蹄岗进行了寻乌调查。图为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时开调查会的旧址。



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时在寻乌县城马蹄岗开调查会的会场。

第一章 寻乌的政治区划

全县分为七区，七区之中包括四厢十二堡。

七区是：

城区：分东西南北四厢，为全县政治中心。

仁丰区^[1]：即篁乡堡。公平圩、菖蒲圩（即篁乡圩）为本区两个政治中心，各设一个局。

双桥区：即双桥堡。内分十三段，以留车为政治中心。

南八区：分南桥、八富两堡，以牛斗光为政治中心。

兼三区：分项山、腰古、滋溪三堡，以吉潭为政治中心。

[1] 仁丰区，在1930年5月寻乌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曾改称篁乡区。

澄江区：分寻乌、大墩、桂岭三堡，以澄江圩为政治中心。

三水区：分三标、水源两堡，以三标圩为政治中心。

明万历前寻乌还未设县，万历以后才设县。没有设县的时候，一部分属江西的安远县管辖，设置石溪堡，其地域是现在的澄江、三水、仁丰、县城等区；一部分属广东平远县管辖，其地域是现在的双桥、南八、兼三等区。

第二章 寻乌的交通

一 水路

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一带山地发源，经澄江、吉潭、石排下、车头、留车，流入龙川，下惠州，故寻乌水乃是东江的上游。船可通到澄江。沿河以澄江、吉潭、留车三个圩场为最大，吉潭在三个圩中更首屈一指。

另由石排下可以通船到城区之河岭（城南十里）。

二 陆路

以石排下为中心，分为四条大路：一条经过吉潭（三十里）、澄江（六十里）、盘古隘，通筠门岭（一百一十里），为兴国、于都、会昌通广东的大路。一条经过县城（三十里）、三标（六十里）、太阳关，通安远城（一百四十里），为信丰、安远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珠村、牛斗光（二十里）到平远之八尺（四十五里），为会昌、安远两方通梅县的大路，即会昌、安远两条路均到石排下集中，共同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车头（二十里）、留车（三十五里）、荒塘肚（六十里）到兴宁之罗浮（九十五里）、罗冈（一百二十五里），往兴宁、五华，为寻乌下惠州的大路。

另有几条小些的路：一条从澄江通安远挖补界之罗塘（三十里），再由罗塘南往下坝，北往门岭。一条从吉潭经小田、船肚、书园往平远（六十里）。一条从县城经大炉下、滋溪、剑溪、礼𪨶、赖地往武平（一百八十里）。一条从县城经上坪通安远南乡之胡山（六十里），再由胡山北往安远城（六十里），西往太平（三十六里）、鹅公圩（六十里）。一条由县城到新圩（六十里），再由新圩经公平圩（三里）、两广亭（四十五里），往定南之鹅公圩（八十里），再南经鹅公圩，西往定南城，西经鹤子圩往信丰。由新圩经菖蒲（二十里）、隘排口往龙川城（二百四十里）。由菖蒲、隘排口通兴宁城（一百八十里）。以上各路比较小一点。

从寻乌城出发，往门岭九十里，往武平一百八十里，往梅县二百四十里，往兴宁二百四十里，往安远一百一十里，往龙川三百一十里，往定南（经上坪、胡山、太平、鹅公圩）一百六十里。

三 电报

过去电报局设在吉潭，民国十一年移到县城。电线由吉潭通寻乌城，通筠门岭，通平远。

四 邮政

县城是三等邮局。一路走吉潭、澄江通门岭。一路走牛斗光通八尺，再由八尺通梅县；另由八尺分一路通平远。一路走三标通安远。澄江、吉潭、牛斗光三处有“代办所”，三标、石排下二处有“代收所”。旧历二、五、八走门岭，一、三、五、七、九走八尺，二、四、六、八、十走安远。赣州的信走安远，送于都、兴国的信走门岭。县城邮局通常可以汇款二百元以内，五百元以内须先期交

涉，否则不能。前年三二五暴动^[1]，抓了邮政局长，罚过五百元。此次新局长怕抓，先期跑了。三二五暴动还杀了一个电报局长。

五 陆路交通器具

和广东一样，不论什么道路一概没有车子。陆路运输工具大多数是活人的肩胛，其次是骡马。县城通梅县大路上骡马很多，县城通门岭、县城通吉潭两条路也有，此外没有。运输的骡马是骡多马少，但普通一概叫做“马子”。用马子驮的货物以盐豆两门为大宗。

第三章 寻乌的商业

本章目录

- 一 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 二 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 三 梅县到门岭的生意
- 四 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 五 惠州来货
- 六 寻乌的出口货
- 七 寻乌的重要市场
- 八 寻乌城
 - (1) 寻乌城是什么
 - (2) 盐
 - (3) 杂货

[1] 三二五暴动，指1928年3月25日寻乌党组织领导农民和青年学生举行的全县性革命暴动。

- (4) 油
- (5) 豆
- (6) 屠坊
- (7) 酒
- (8) 水货
- (9) 药材
- (10) 黄烟
- (11) 裁缝
- (12) 伞
- (13) 木器
- (14) 火店
- (15) 豆腐
- (16) 理发
- (17) 打铁
- (18) 爆竹
- (19) 打首饰
- (20) 打洋铁
- (21) 修钟表
- (22) 圃场生意
- (23) 媚妓
- (24) 同善社
- (25) 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鸟调查》(油画)

一 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从石城、瑞金来的，米和豆子为大宗，值几十万元。从兴国来的，茶油^[1]为大宗，米也有（少）。于都、会昌没有什么货来。

澄江圩每圩从门岭来的油约有四船（门岭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装油十二担，每担约值小洋三十元，每年以百圩计算，约值十五万元。

石城、瑞金的米到门岭，大部分经罗塘、下坝（武平属，在三省交界）、新铺（蕉岭属，离梅县三十里）往梅县，每天有约三百担

[1] 茶油，也称木油，指用油茶树的果仁榨的油，可供食用。

过。米走寻乌通过往梅县的，很少。由寻乌通过的是油豆两大宗。豆子担数比油多一倍，每担有五斗的，有三斗的，不等。价值每斗小洋一元五毛。每圩（三天一圩）用船载的有五船，每船十四担，每担（以四斗计）值六元，每圩共值四百二十元，每年一百圩共值四万二千元。另还有肩挑，每圩有二十担，每年有二千八百担，共值一万六千八百元。两项共值五万八千八百元。

二 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鸡

这一条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鸡，次是牛，又次是猪。鸡的大部分是唐江、南康、信丰来的，安远也有一点，甚至有从遂川来的。走王母渡、金鸡圩、新田、版石，不入安远城，由安远城北五里地方通过，入寻乌下梅县。由梅县的鸡行装往松口，向汕头输出。鸡每天走寻乌通过的，安远来的是大宗，也还有小部分走门岭来。每天少也有一百担，多的到百三十担。每担六十斤，以每天百担计，六千斤。鸡贩子由唐江一带一直挑到梅县城或新铺圩（由寻乌走大柘去新铺下船，直往松口，不经梅县）发卖，每斤价五毛（寻乌鸡价每斤四毛）。每天六千斤，共值三千元。每年三百六十天，共值一百零八万元。梅县鸡行卖与松口，每斤价七毛以上，可谓大赚其钱。

牛

每月逢一是“牛岗”。十一月最旺，每岗七八百头牛。正、二月次之，每岗一二百头。三、四、五、六、七月最淡，每岗少的三五头，多的也不过十余头。八月初一这天为牛市“开岗”的日子，从这日起生意逐渐旺盛，每岗从四五十头到六七十头。九、十两月每

岗就有百把头了。

每年共有多少牛呢？

正、二月每月平均一百头，共二百头；

三月六十头；

四、五、六、七月没有市；

八月三岗，二百五十头；

九月同八月；

十月三百头；

十一月三岗，二千一百头；

十二月只有二岗，一百六十头；

全年三千三百二十头。

牛价平均每头值四十元，全年共值一十三万二千八百元。

牛也是如鸡一样，从唐江、信丰来的为大宗，安远也有一点点，寻乌本县没有。和鸡不同的是，鸡于寻乌只是经过，牛则在寻乌出卖。牛市在县城东门外河墈上，卖主是唐江、信丰、安远人，买主是梅县、武平、蕉岭、平远人，经纪（牙人）是寻乌人。不是经松口向汕头输出，大概是牛贩子们买了去转卖给人家耕田，或转卖给城市宰杀。牙人钱每只牛买卖双方各出半毛。牛税有承商包办，每年缴政府一千七百四十元。牛税从前每年“标”（即投标）一次，出钱多的得标，近改为三年一标。税到牛身上，黄牛每头四毛，水牛每头五毛，名之曰“饷”。抽过了税，在那只牛身上拍上个“饷”字的石灰印，买主就起牛跑。饷以外，还有捐，是近来附加的，每牛一毛。承商向政府出的税，连同他自己的赚项，年在二千元以上。以平均每牛抽税四毛半计，每年在寻乌城出卖的牛，当在四千五百头以上。上面说每年三千三百二十头，乃是最少量的估计。

猪

信丰来的最多，安远次之。走两条路来，一条从安远城，经寻乌城，走牛斗光、八尺去梅县，这一路最多；一条由安远南乡，走公平、新圩、留车、平远之中坑圩，往梅县，这一路较少。两条路全年有五千只猪通过。平均每只一百斤，每斤价四毛半（每只四十五元），五千只猪共值二十二万五千元。寻乌政府每只抽税二毛。

三 梅县到门岭的生意

大宗是洋货（牙粉、牙刷、电筒、胶底鞋、肥皂、洋伞、马灯、洋铁均大宗。其中如牙粉、牙刷等，本属中国制的多，但普通也叫洋货），海味（海带、海参、鱼肚、鱿鱼、淡菜、咸鱼等为大宗），盐（十年前惠盐多，三四年前潮盐多，这是因为商人包办路线不同的缘故。现在又是惠盐多，则因八尺、中坑等处反动派对红色区域封锁，阻塞了潮盐的路的缘故。盐到门岭后，一直通往兴国），洋油（亚细亚牌的多），布匹（梅县去的少，兴宁去的多，均买了洋纱自己造的。兴宁织造很发达。兴宁一般生意也比梅县大）洋纱（外国货）这五类。糖与面粉亦有好些。

梅县与门岭不通车，货大部分是肩挑，盐通用马子驮，只有用船载至澄江起岸。面粉之一部也用马子驮。

门岭去梅县，脚夫们一担货去，一担货回。

四 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货物种类与往门岭的同，但数量少于门岭，大概比例是门岭六

成，安、信四成，因门岭货物销到瑞金、石城、于都、兴国等广大地方，安远、信丰地域较狭之故。

五 惠州来货

只有盐一门是大宗。咸鱼、黄糖二样略有一点来寻乌卖。此外没有。

六 寻乌的出口货

上面说的都是进口货或通过货，这里要说寻乌县对外出口货。

第一是米。梅县一带很缺乏米，价比寻乌贵一倍，寻乌每年要供给它很多。澄江、三标、吉潭（项山的）、城区四个区域的米，从牛斗光经八尺、大柘，向梅县输出；龙图、腴田、留车、芳田、篁乡上半区一带的米，走中坑向梅县输出；大同、篁乡下半区、大田、蓝田、斗晏及龙川来的一部分，走岑峰经石正向梅县输出。三条路输出数量大略相等，每天共计输出米一百担，全年三万六千担，平均每担价八元，共二十八万八千元。

第二是茶。出于城区西厢之上、下坪，南厢之图合、冈上、鹅子湖一带。三、四、五、七、八月为采茶期。每圩约输出二十担（每担七十斤），每年百圩输出二千担，共一十四万斤，每斤价五毛，共值七万元。十分之八以上向兴宁输出，十分之二以下向梅县输出。采茶时兴宁客子到乡下，收买生叶自己制造。生叶中，“雨前茶”（谷雨以前的，又叫“头春茶”），一块钱八斤，每五斤生叶可以制出一斤茶。这种雨前茶价颇贵，要一块钱一斤。“二春”（三四

月的)和“秋子”(七八月的)，每块钱能买生茶叶十五斤，制造出来每斤卖五毛。做茶生意的靠着二春和秋子赚钱，头春茶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十二月还能产出些茶，名叫“雪子”，和雨前茶一样的贵，同属上等人家吃的。出不多，客子们于它也赚不到什么钱。城区之外，双桥区之雁洋坪也出茶，虽很少(每年只值百多元)，但很好，因为不是岭头种的，而是菜园子里种的。

第三是纸。出于笪乡，向兴宁(走罗浮、罗冈)、梅县(走中坑，也有走岑峰的)、龙川(走贝岭)三地输出。平均每圩六十担，全年一百圩，六千担，每担价八元，共四万八千元。

第四是木。产地是城区的西厢(上、下坪)、南厢(鹅子湖)，南八区的河角圩一带，笪乡区的香山、高头一带，三水区的肖木坑、寨塘坑，兼三区的罗福嶂。除罗福嶂的向潮汕输出外，其余均向东江输出。但罗福嶂木头输出潮汕价钱很贵，输出东江的则价钱很贱，每年约值万余元。二十年前出产较大。

木头出口是龙川客子出本钱，本地木商作辅助。都上山去完了，把山价(那山里许多木头中，讲定可以“倒”的那些木头的价钱)交与山主，由客子自己雇工倒下来，本地商人则为之照顾，使木头不被别人偷去。四五月是倒树最多的季节，六月以后，倒的渐少，九月以后便不再倒了。木一倒下就剥皮。剥了皮之后至少有两个月摆在地上，使它干起来。两个月后如果市价好，出卖有利，就扎排子下河，往往有搭架搭到三四年的。本地商人对于树贩(外地客子)是处在一种工人的地位，他们称树贩叫“老板”，而树贩称他们叫“排头”，利益的分配是老板九成，排头一成。

第五是香菇。主要产地是三标和安远交界之大湖嶂、小湖嶂、寨塘坑、上下坝，城区和安远交界之上、下坪一带山地，其次是双

桥区与平远交界之叶子峯。香菇每斤二元，每年约出一万元。安远出香菇比寻乌多，销往南雄，寻乌的销往兴宁。没有客子来收，是寻乌人贩了去卖。

第六是茶油。出在双桥的大同、斗晏、荒塘肚、蓝田、大田一带。年约一万五千斤，每百斤二十五元，共计三千七百五十元。从罗浮、岑峰两条路对兴宁、梅县两地输出。

总计寻乌六种出产（单说出口部分）价值如下：

1.米	二八八，〇〇〇元	四二九，七五〇元
2.茶	七〇，〇〇〇	
3.纸	四八，〇〇〇	
4.木	一〇，〇〇〇	
5.香菇	一〇，〇〇〇	
6.茶油	三，七五〇	

七 寻乌的重要市场

吉潭第一，盐、米、油、豆是大宗。牛斗光第二，盐、米略小于吉潭，油、豆与吉潭等。留车第三，布匹是最大宗，由兴宁进口；油、豆次之。县城第四，牛行要算第一门生意；第二是油、盐、米行；第三算是布匹（从前赣州有布子来，民国十七年起没有了，因为它是土纱织的，“一股大，一股细”，被兴宁、梅县的洋纱布抢了生意去。兴宁、梅县的布很好，“一掌平”）。鸡生意虽大，但它只通过不归“行”，故不算。澄江第五，油、豆、盐在这里过驳，是大宗；米次之；鸦片亦是大宗，从兴宁、于都来。石排下第六，油、盐、米、豆的总口岸，但多属通过，只盐、米有些买卖。

鸡、猪、牛亦是通过。

此外，如岑峰（米）、公平（纸）、篁乡、三标等处，都属普通小圩场。

八 寻乌城

（1）寻乌城是什么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寻乌的许多市场中，由于机会的便利，特为把寻乌城这个市场拿了来观察一番。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城马蹄岗进行了“寻乌调查”。图为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

说到寻乌城这个市场，真是不胜今昔之感。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的要大一倍。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澄江、吉潭要到寻乌城来办货，就是南半县的篁乡、留车甚至平远县的八尺也到寻乌城来办货。这是因为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不但东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南半县的留车等地也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再则光绪二十七八年以前还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行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那

时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到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还有，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它约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坚固城的内外，表现它那寂寞的情调，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临时地热闹几小时，这又是一件很好的资料吗？

下面是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

(2) 盐

本城的一切货物，大都是销向城区的东西南北四厢和三水区的三标、水源两堡这个区域里的，别的地方很少到本城买东西。惟独盐是例外。盐的大部是销往安远、信丰，小部才销在城区、三标。又因为它是日用品，所以它是城里生意的第一大宗。城内有五家盐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两万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万元生意。

盐分潮盐、惠盐。潮盐好，但贵，每元（小洋）买十斤到十一斤。潮盐色青黑，清洁能防腐。惠盐色白，但质差味淡，因之价也较贱，每元能买十六七斤。要是贪便宜的人才吃惠盐。寻乌的盐，历来是潮盐多，惠盐少。

开潮盐行的，本地籍二家（汇通、新发昌），平远籍一家（韩祥盛），万安籍一家（周裕昌），泰和与本地合开一家（万丰兴）。汇通有本三千元，算最大。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去年因做纸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多元，现只存千元左右了。以上两家都开了二十多年了。第三家要算韩祥盛，本约七百元，开了十几年。第四家万丰兴，两百块钱进店，开了四年，现有本四五百元了。第五是新发

昌，开了十多年，拉拉扯扯不上一百元本。

汇通店主钟周瑞是个地主（开盐行的只有他是地主）。店子开在东门城内，家住在南门城外。有二百二十石谷田，每年收获两季，每季出谷二百二十担，一季完全交租，一季农民得着。他家里有个老婆，三个奶子（儿子），三个新妇（媳妇），一个等郎嫂（买来的，五岁了，因为她现在并没有郎，还要等着她老板娘把郎生下来，故叫等郎嫂，别处叫做童养媳），连他自己，共九个人吃饭。没有雇店员。他自己指挥他的奶子、新妇做事。这是城里第一个“资本家”。

韩祥盛，平远八尺人，自己两公婆，一个奶子，三个人吃饭。没有请店工。每年能赚些钱。

新发昌，主人叫邝明奎，车头人，是个前清的文秀才。他开了十多年店，几十块钱做生意，两公婆又一儿子吃饭。因他办事公平，做了两次商会长，前清一届做两年，去年到现在又是他，六十几岁的白头老人家。

（3）杂货

大的上十家，连同小的共十六七家杂货店。志成（兴宁人）、纶泰兴（吉安人）、义泰兴（吉安人一、本地人一合股）、义成、潘月利、王润祥、潘登记、祥兴、永源金（以上六家均兴宁人）、均益（挑担子出身，本地人）、骆晋丰（本地人，杂货商人中只有他是个地主，收租三百担）、范顺昌（福建人）、黄裕丰（福建人）这十三家，就是大一点的杂货店。其中黄裕丰以黄烟、纸张为主要生意。其他都是以布匹为主要生意。次于布匹就是洋货生意。这个小小市场竟什么洋货也有卖，略举之有一百三十种：

牙粉 牙刷 胶底鞋

皮鞋 套鞋 运动鞋
拖鞋 铅笔 钢笔（自来水笔）
粉笔 天然墨 毛笔
墨盘（砚池） 墨湖（墨盒） 笔套
笔架 浆糊 练习本
印色 原纸 油墨
教科书（没有单独的书店，附在杂货店卖）
字画 小手巾 肥皂
香碱 花露水 花露精
毛面巾 洋袜子 洋瓷面盆
洋瓷碗 洋瓷水角（把碗） 生发油
生发膏 手袜子（手套） 腮脂
围巾 大小梳子 水粉
雪花膏 电筒 电土（电油^[1]）
洋火 香烟（有金字、中国、三炮台、哈德门、扇美各种，以
金字、中国两种销得较多）
麻姑烟 烟嘴 洋遮（洋伞）
草帽 礼帽 洋瓷茶杯
文明帽 洋毡 棉毯
球被（毛毯子） 绒线帽（小儿用） 夜帽
木棉枕 皮枕 中山扣
白骨扣 乌骨扣 海螺扣
阴阳扣 宽紧带 吊带

[1] 当地称电池为电油。

丝裤带 洋裤带 爽身粉
 汗衫 扇子（乌纸扇、白纸扇）
 钟 表 叫人钟
信纸 信封 日记册
 镜子 眼镜 洋刀子
 儿童玩具（小洋枪、火车、不倒翁、人公子、小皮球、哨子，
 此外还有很多）
 德国响刀 安全刀 挥剪 毛剪（以上四种均剃头用） 皮夹
 子（皮箱子） 藤夹子（藤箱子） 洋靛（蓝的） 染布用颜料
 （洋红、乌粉、灰粉、品洋）
 铜锁 铜番锁 铁锁
 铁番锁 铜帐勾 骨帐勾
洋油 马灯 不灯（即草灯）
 宝盖灯 洋瓷桌灯 莲花宝盖灯
 三练洋灯 四方带灯 六角带灯
 圆火带 扁火带（以上两种均点灯用）
 骨筷 漆筷 算盘
 水烟筒 杆子烟筒 洋钉
 铜煲（烧茶用） 轻铁锅子 轻铁盘子
 轻铁调羹 明瓦 各种瓷器
 骨牌 麻雀牌 枣子
 泡圆 各种罐头（牛肉、杂菜、鸭肉、冬笋、批把、沙梨、荔
 枝、龙眼、菠萝、牛奶）
 对联 洋蜡烛 白洋蜡
 葡萄干 洋线 铅线

铁线 墨水

以上一百三十一种，商人都叫作“洋货”，在杂货店里出卖。其中打横画的二十三种是销数较多的，没有打横画的各种销数都少。一百三十一种中有一百十八种是从梅县及兴宁来的，梅县来的占最大多数，只有洋袜子、围巾等织造品大部分是从兴宁来的。明瓦、对联二种完全从赣州来。皮枕、信纸、信封、铜煲、洋油、扇子、水烟筒、毛笔八种，梅县、赣州两处都有来。皮枕、信纸、信封、瓷器、扇子、水烟筒，赣州货不但占多数，而且比较好。信纸、信封，赣州的是本国纸制的，梅县的是用洋纸制的。洋油、纸烟则广东来多，赣州来少。纸烟是梅县、兴宁、赣州三处来。毛笔亦赣州来多，梅县的只有很少一点。

为杂货店里的次要生意的洋货已如上面所述，下面再说杂货店里的主要生意——布匹。

布匹有土布（青、白、花、灰、红、绿、柳条各种），竹布（蓝、白、灰、乌、红、光、青、印花各种），竹纱（白、灰、乌、蓝、柳条、靛各种），绸缎（各种华丝葛、各种纺绸、薯莨绸、香云纱），呢绒（厚呢、粗呢、镜面呢），夏布（白、蓝、乌、机白、波心各种）。土布是中国人用洋纱制造，从兴宁来。竹布、竹纱都叫洋布，从香港走梅县来。绸缎中华丝葛、纺绸从杭州走赣州、梅县两路来，寻乌女人买来织头帕，这种头帕每个女人都有。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约值十万元，销地是城区和三标。

杂货店里除布匹、洋货二个大宗外，还附带出卖黄烟、糕饼和香纸蜡烛，也有搭卖零油零盐的。

城内杂货生意，前清时候每年总计十五万元上下，现今十二万元上下。十二万元的分配是：布匹八万余元（土布七万元，洋布一

万元，呢绒二千元，夏布千余元），洋货二万元（每家多的千一二百元，少的二三百元），此外黄烟一万元上下，糕饼四百元上下（只有两家附带卖糕饼），香纸爆竹五百元上下（附带卖香纸的二家，卖爆竹的十三家）。

还待举出几家杂货店，好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情况。

最大的杂货店，店主陈志成，兴宁人，在县城、吉潭、澄江各开一间店。县城这一间本钱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来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钱、伙食等项开销，每年以赚得利息为止。陈本人又嫖又赌。

第二家要算纶泰兴，三个份子合成，本钱二千元。除了开销，每年赚得三四百元。

第三家算义泰兴，三个份子，吊多钱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赚得一二百元。

第四家，罗义成，一人开，千多元本，每年能赚四五百元。很节俭，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带两个徒弟，家眷在兴宁没有来。他是兴宁人，早年来寻乌挑糖箩子，在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一个明钱^[1]敲一块小糖（现在敲一块糖子起码要一块铜片^[2]了），或者拿糖子换各种荒货（头发、烂铜、烂铁、猪牛骨头、烂棉被）。他就是这样子起家的。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

郭怡和是本钱最小的杂货店，百多块钱本，卖些黄烟、纸烟、蛋、自来火、带子、红索子（红绳子）、丝线、综条（镶鞋口用）、笔墨、毛巾、洋纱巾、骨扣等等东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参加我们

[1] 明钱，即铜钱。

[2] 铜片和本文中的“铜板”“铜壳子”，都指铜元。

这个调查会的）和他一个老婆，每年穿衣吃饭缴费百多元，生意赚项仅敷了它。他是万安人，十二岁到寻乌，现在五十九岁了。他未来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寻乌做了六十年生意，连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历来做的是杂货布匹。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时，有本三千元，从外边缴（商家赊借货物叫做“缴”）到五六千元，自己缴给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时虽只三千元本，却做得二万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寻乌城里第一家大商店。现在是往留车、八尺、牛斗光、车头等处去买货，那时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却都要到寻乌城中他的店里来买货。因为那时货物来源主要是赣州（布匹、绸缎、纸张、笔墨、草帽、苏席），吉安亦有来往（紫花布与丝线）。那时向赣州买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现钱，货就可拿得动。现在不行了。这种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么商店都缴不动了。不独赣州，梅县、兴宁也缴不动了。这是一种经济的大变化。就是从前年（一九二八）起，“世界不好”。商家的货缴与农民，农民受了重租重利剥削，本来就是穷的，加以前年蝗虫吃了禾，同时又遭旱灾，农民还起本城商家的账，因此本城商家也还起梅县、兴宁商家的账，梅县、兴宁商家都不放心缴给人家了。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抢（光复派率领农民千多入城，抢了许多别的店子。随即官军克复，又大抢郭怡和，抢去六千九百多元东西）。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现时这个样子。郭做过两任商会长——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

这里还要说到杂货店的店员制度，看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杂货店的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

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而且地位也不同了。帮工一年将要过去的时候，能干的，老板继续留他做；不能干的，老板便辞歇他，老板对他说：“我的店里不需要这么多人做了，明年你要另找生意。”他斟到了一个新的店家，他的地位越发高了一些，衣服也穿得越发好了一些，薪俸（不叫工钱）也逐年加多起来。他的社会名称再也不是“徒弟”了，而是令人尊敬的“先生”。他在帮做的那一年中，老板给他的薪俸不是取讲定数目的形式，也没有“薪俸”的名目，只是老板要给他做各色冬夏衣服。再则他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做得好，店里长钱，他的薪俸便逐年增加。光绪年间生意好时，先生的薪俸最高有到一百二十元的，但现在因为生意零落，最高薪俸不过八十元了。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自己回到家里去住也是有的；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像郭怡和的老板郭友梅回到万安去住家，把生意交给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是一例。靠不住的先生，是不能把生意交给他做的，因为他讲嫖赌、“打斧头”“打雷公”（“打斧头”“打雷公”，都谓“吃油饼”^[1]）。

[1] “吃油饼”，这里指明吃暗拿占便宜的行为。

(4) 油

油是本城第三门生意，从门岭、安远两方面来，销在城区及篁乡，三标也有点把子（点把子即一点子）。只一家油行，刘福兴，一百大洋领了一张“帖”，就算本钱。代客买卖，经过一担油收行佣两毛子。十一二月是顶大门生意，每个大圩（逢一为大圩）有一百担，两个月六百担；小圩（逢四、七）三几十担，两个月四百担。一月到十月很淡，每圩不过三几担，通共不过三百担。全年约一千三百担，抽行佣约二百六十元。因为他领了帖，由他卖独家，什么人都只能从他那里买油。帖从南昌省政府领来，要县政府用公事去，付足领帖钱，才有帖子发下来。一百块领帖费之外，还要五块钱手续费。一张帖八年有效，过了八年成为废纸，又要领过新帖。要领帖的不止油行，还有盐行、豆行和牛行。

(5) 豆

也只一个行，没有店，城隍庙公地上买卖。何子贞是个公安局长，近来做警察队长，寻乌的反动首领。他在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顶大门，两个月有八百担。全年约共一千担，一担（一担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佣两升，每担豆价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约计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佣三百元。何子贞是本城人，住在东门外，小时很苦，平远中学毕业，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回来当小学教师，当了八九年，古柏、潘丽都是他的学生。民国十六年清党前后，古、潘等领导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贞领导的“新寻派”发生冲突。民国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国十七年，三二五暴动把何子贞赶跑。四月，何子贞恢复势力，大出头，大罚革命派的款子，后来又做公安局长、警察队长，渐渐发了些财，在近郊买了田地。他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即没有与

合作社派冲突以前，是代表商业资本势力的，起始组织“留粤学友会”，开办平民义学，时在民国十年。民国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县城开大会，革命派势力长起来，何便与封建豪绅妥协，并且取得了对封建派的领导地位，成为寻乌最恶劣的反动首领。这次红军到寻乌，他才率领警察队（靖卫团^[1]）逃往项山。

（6）屠坊

只有三个案，摆在街边，没有屠店。三个案是刘奕二、陈老二、刘世渭。刘奕二从前有百把元本，现在了了（了了即没有了）。陈老二、刘世渭也完全没有本钱，因为买猪不必要现钱，猪杀了后收了钱再付猪价，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杀两个猪，每猪一百斤，每年杀猪七万二千斤。拿现时说，买猪进来每斤二毛半，卖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赚三分，全年可赚二千一百六十元，是个不恶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税，从前三家每月出税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为三家包缴屠宰税，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杀猪卖，除非自己吃便罢。红军入城后，由三家增加到七八案，销路大增。税又不要，赚了一个就是一个，屠户人人欢喜。肉价，红军未入前每斤三毛二，现在每斤二毛八。

（7）酒

陈贵和、高元利、元利栈、周裕昌、刘双盛、凌文盛、彭同孚这七家是较大的酒店，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是小酒店。周裕昌（吉安人）、高元利（吉安人）、刘双盛（本地人）、陈贵和四家是最大的，本钱都不出百元。凌文盛（本地人）、元利栈（吉安人）、彭

[1] 靖卫团，又称靖卫队，是一种反动的地方武装。

同孚每家不过四五十元。以上七家都是卖糯米做的甜酒，叫做水酒，因为色黄，也叫黄酒。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一般喜欢喝的，因它味醇，也吃不坏人，又较便宜的原故。分为“双酒”“单酒”（只城里这样称呼，乡下不说“双”“单”而说“好”“淡”），双酒酒娘多。卖酒以壶算不以斤算。双酒十八个铜板一壶，是黄酒中最好的，普通人家请客才吃；但也有自己一日三餐吃的，那些酒鬼们每餐喝一点，他就不吃饭也做得。单酒十个铜板一壶，口渴了，贫民买了当茶吃。双酒生意比单酒大。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三家均本城人，本钱都不过十把块钱，卖的都是白酒。还有周裕昌卖的也有白酒。这种酒用黏米做，味较黄酒烈，出卖不讲壶，零卖两个铜板一杯，趸卖一毛六分一斤。白酒生意比黄酒少，黄酒约九成，白酒约一成。不论黄白，凡属做酒生意，他的目的并不全在酒，拿了酒糟供猪（喂猪），是他更重要的目的。自己的猪吃不完，拿了发卖，两个铜板一小碗。黄酒店最好的时节（三月至八月口渴时节）每店每天能卖五块钱，平常时节（九月至二月）每天能卖两块钱。黄酒店每家每年可做一千零二十元生意，七家共计七千多块钱生意。白酒店热季半年，每天每家收一块钱，凉季半年，每天只得五毛子，每家全年二百七十元，四家共只有一千元上下。

酒税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约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

(8) 水货

水货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呀，“山珍海错”就是它们的标语。水货商人的荣枯得失，亦是颇饶兴味的。下面先举出各样的品类，次观察他们的得失。

咸鱼 第一大门。桂花鱼、青鳞子、海乌头、海鲈、剥皮鱼、

石头鱼、金瓜子、黄鱼、金线鱼、圆鲫子、大眼鲢、拿尾子（身大尾小）、鞋底鱼（即“并背罗食使”，只有一侧有眼睛，要两鱼并走才能觅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谓之“并背罗食使”，就是拿了这种鱼做比喻的）、角鱼子（头上有两个角），都是咸鱼类，一概从潮汕来。

海带 第二大门。有青带、海带两种。青带亦名赣带，最好，赣州来。海带少于青带，货较次，价钱较贱，梅县来。年销千多斤，两毛子一斤。

糖 也是水货店里出卖，第三大门。分为白糖、黄糖、冰糖、橘饼各种。白糖中有雪粉，看是好看，不甜，梅县来；有粗白，很甜，惠州来；有糜白，中庄货，惠州来。三种都是洋糖，一毛七八一斤。黄糖中有芋头糖，一团一团的，梅县来；有片糖，一片一片的，最好，惠州来；有散沙糖，掺有沙子，最差，惠州来。过去是黄糖便宜白糖贵，现在是黄糖贵白糖便宜。黄糖过去不过一毛六子一斤，现在涨到二毛四五了。过去白糖二毛六七子一斤，现在跌到一毛七八了。黄糖都是土糖，白糖都是洋糖。本城白糖每年销千多斤，黄糖销六七千斤（只冬季有来）。因为黄糖更甜，所以比白糖销得多。冰糖从梅县来，年仅销几十斤，两毛多子一斤，属洋糖。橘饼，梅县来，年销二三十斤，三毛子一斤。

以上各种糖中，以片糖销数为最大门，因为做米果要用它，过年时候不论城、乡、贫、富，家家都要做米果。

豆粉 第四大门。筠门岭来的多，他县来的也有。番薯做的，还是粉，没有成条子，做肉丸等用。年销几千斤，一毛五六子一斤。

猪皮 第五大门。普通席面用碗猪皮做假鱼肚。梅县来。年销千把斤，一毛子三两，每斤五毛半。

闽笋 从梅县、安远两条路来，“闽笋”是个名而已。第六大门。不但酒席用它，普通亦作粗菜吃，特别是割禾莳田时候。寻乌自己本有些笋子，三四月间农民挑了卖到梅县去，七八月后寻乌人要用，又零零碎碎从梅县买了来。年销五六百斤，二毛三四一斤。

鱿鱼 办酒席就要用，普通也要。第七大门。梅县来。年用三五百斤，每斤七八毛。

豆豉 年销三千斤内外，一毛四子一斤。寻乌人也会做，做了熬酱油，没出卖的。差不多家家要吃，放点油到里面蒸一碗吃得几餐，人家省吃省用，往往这样做。

面灰 即面粉，梅县来，洋面粉多。做包子，做饺子，做面条，做糕饼，都要用它。尤其是糕饼用面最多：蛋饼、提糖饼、有饼（“有”，当地读胖，意曰里面是空的）、五仁饼、猪油饼都是面做的。两毛子一斤，年用百包上下。

洋蜡 一块一块的白东西。二毛五六一斤，每年销四五百斤。

玉粉 又名西粉，番薯做成的，和豆粉不同就是它已造成了条子。梅县方面来。普通人都吃它。一毛子半斤左右，年销六七百斤。

以上十一门是比较用得多的，以下各门都用得少。

盖市 鱿鱼里的一种，即是最好的鱿鱼，请上客才用它。梅县来。用得不多，每年三两百块钱生意。普通的鱿鱼叫“洋鱿鱼”。

菜莆 就是芫菁，和萝卜相像，腌了的。走信丰来。每年销得三两百斤，端午过了才有卖，八月一过就没有来了。两毛子一斤，比西粉贵一点。

鱼翅 四毛子一两，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参 每年用三两百斤，比鱼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鱼肚 用三两百斤，价和海参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参必定

要用鱼肚，便不用假鱼肚的猪皮了。

墨鱼 只用四五十斤，每斤价七八毛，同鱿鱼差不多。

珧柱 销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贡鱼干 仅销十斤八斤，每斤价二毛。过去可销七八十斤。

大虾 销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虾并不是很大的虾，它的名字又叫“虾米”，不比“潮虾”有四两一个的。

虾壳 极小的虾子压扁起来好像虾皮一样，叫做虾壳。销得百多斤。过年过节家家要镶豆腐——把豆腐挖一个口，把猪肉、鱼子、香菇连同虾壳，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酱塞了进去，叫做镶豆腐。虾壳价每斤一毛多。

蜇皮 三毛子一斤，销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 大的叫做“蚝鼓”，又叫“西利”。淡菜年销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没有卖。

天青鮆 一种海鱼，大的有扇子大一个。本城少卖。

以上盖市到天青鮆各种都是海菜，从潮汕来。

金针菜 即黄花，两毛子一斤，年销四五十斤。

云耳 销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绪年间每斤不过五毛子，涨了一个对倍。梅县来。

香菇 销百把斤。冬菇较好，两块零钱一斤。春菇较坏，一块二三毛一斤。本地出产。

冬菜 白菜制成罐头，过去走天津来，近来梅县也可以造了。销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 豆腐皮卷成条子，两毛多钱一斤，销四五十斤。兴宁来。

豆腐霉 即腐乳，梅县来。豆腐浆、芋子、面粉三样东西做成，与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

胡椒 白胡椒，销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四毛钱一斤，贵了两倍。乌胡椒，销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两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国来的。

榄豉 把生橄榄煮熟，去核发霉，即成榄豉，寻乌叫榄角，梅县叫榄豉。每年只销得十多斤，每斤价二毛多。

酱油 本地做的也有，门岭来的也有。小黄豆子蒸熟，晒得半干，摊开使它上霉，再拿了去煮。煮出来的水加进香料和盐，就成酱油；煮后的豆子就成豆豉，但这种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没有滤去酱油的豆子。豆豉和酱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较大。豆豉每月销得二三百斤，年销三千多斤，每斤价一毛四。酱油每年销三几百斤，每斤价一毛半。

柿花 年销百把块钱，小的三个铜板一个，大的一毛子两个。

红枣黑枣 两样年销百零斤，黑枣四毛子一斤，红枣两毛子一斤。

龙眼 一年只销十把二十斤。有壳的三毛多子一斤。无壳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药店里才有。

荔枝 很少有卖。价和龙眼略同。

杨桃干 销得几十斤，四毛子一斤。

从柿花到杨桃干各种均从梅县来。

瓜仁 就是瓜子，信丰、门岭都有来，三毛零子一斤，销得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种都是水货店的生意。此外，水货店还附带卖洋油和茶油。

水货店中的盛衰兴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顺昌老店、顺昌兴记、卢权利、汤尧阶、荣春祥、骆接赐、张

均益七家，是水货生意中大一点的。此外，还有卖水货的小摊子若干家。其中，顺昌老店和张均益是杂货店兼做水货。

顺昌兴记是顺昌老店的分支，水货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块本钱，每年向梅县缴得动两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饭，生意赚项仅敷缴用。

卢权利，算第二家水货店，梅县人，资本千多两千元。除水货外，还做桐油、茶叶、香菇、茶油各样，运往兴、梅做“行岗生意”，他做的水货生意不如兴记，这一宗却是兴记所没有的。他也能在梅县缴得些些动，因为他是梅县人，生意颇红，缴千把八百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两公婆，请了两个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缴用外，每年至少赚两三百元，财气好的年头，千把八百也要赚。

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盐行很赚钱，前年起蚀本，改做水货。

荣春祥，本地人，资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几十担谷田，七八人吃饭。不请先生。用度呢，生意赚了钱来开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储蓄起来，算水货店第一家好的。苏维埃成立，把他的田没收了一部分，不待说心里是呕气的。他小时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

顺昌老店主人范兴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里十多个人，请了个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货生意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后来败下来，土地分散，范兴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担谷子的田了。现在苏维埃分田，他家还能分一点进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却能收百多担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没有做生意。顺昌兴记是他共祖公的兄弟开的，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个人吃，苏维埃分田有

点分进去。前清末年到民国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七家店子，做的绸缎、布匹、杂货、水货各色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个原因，是和郭怡和失败同样的。其次是因为子弟很多，生长在那些封建经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练腔调”（闹阔气），把个家门了了。那时候（民国十年以前），寻乌的城东小学（一些地主凑股子办的，五块钱一股）是个有名的“毕业公司”。全县地主子弟练腔调无出息的，拿了钱去这个公司里坐三年，得张文凭，就大摆其架子，用他们的名片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回到家里骗祖宗。什么叫做骗祖宗呢？第一是刚毕业的时候，祠堂里头照例赏给毕业生一些钱，叫做“抢花红”；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举人有功名的平分学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毕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爷们竟有六七十个进了这个毕业公司。他们毕业后，在他们的大小公堂中，除开抢花红得谷子外，单分胙肉一门，每年得一百斤。

骆接赐，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个人吃饭，没有请先生，蒸烧酒，卖水货，除开销外，能赚一头二百块钱（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从前好嫖，讨了个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块钱讨来的），老实勤快，糟酒又可供猪，所以年好一年，家里有十多担谷田。

张均益，做水货又做杂货，一头二百元本，其余是借来的。没有请先生，指挥他的儿子做生意，每年颇有些赚头。他是本地人，

五六年前是个挑夫，帮寻乌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县，从梅县挑了布子及咸鱼回到寻乌。他自己挑东西，同时又当夫头。这种夫头的职务是能够赚钱的。寻乌商人拿了钱给他去办货，寻乌城的老板和梅县的老板两头都给酒钱与他，因此他就慢慢地发起财来。

摆摊子的水货生意，每家不过几十元本，多的不过一百元，他们的货是从本城大水货店和过往小贩那里买来。这种摆摊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干发起财来。本城由摆摊子起家开店的有许多家，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都是。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来。

(9) 药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来是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他因生子不育，又买来一个儿子，随后他自己也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娃子，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又带三个徒弟。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

[1] “奴古”，客家话，指男奴仆。

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药店中，只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现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跟了赖世璜^[1]部下一个连长，去年回到寻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钱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药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庆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黄裕兴、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杂货店的陈志成，水货店的宝华祥，火店的同来安，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苏维埃势力进城，四家都被没收。

（10）黄烟

城里有两家制造黄烟的店子。一家叫黄裕丰，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卖纸张杂货，赚了万多块钱，拿回上杭买了田，现在本城店里还有本钱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号，也是自己制黄烟，安远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开张。

[1] 赖世璜（1889—1927），江西石城人，曾任粤军第七军第一师师长、赣军第四师师长、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等职。

黄裕丰请了两个工人，一个刨烟，一个打包。涌泉号请了一个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饭，这一点与杂货药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无肉吃、无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则平日有吃，因此没有特别的打牙祭。吃饭也有些不同，先生经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则人少时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几个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唤工人，唤做“师父”。

杂货店、水货店的黄烟，多是从这种制黄烟的店子里买去的。

(11) 裁缝

共有用机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刘芹英、黄嫂子、廖接芳、刘森河、刘师父、谢神保、范癞子、谢其龙、何祥古、谢师父、黄老五、黄上先都是用机器的，每家一架“车子”（即缝纫机）。每家的老板都同时是工人。每人带个徒弟，缝下子边，打下子扣绊。这种裁缝店的资本，就是买一架机器的本钱。机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别人用旧了的）。民国九年以前，寻乌没有缝纫机，一概手工做。民国九年有个兴宁人何师父，第一次弄来一架机器开店。他原先是在留车开店，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因他“剪刀很利”（寻乌人说裁缝偷布，不说他偷布，而说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带着车子回兴宁去了。前年（一九二八）还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内有几架是买了别人的旧车子。其中黄老五手艺顶好，生意顶大，勾结官厅及豪绅，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赚钱买了田地。三二五暴动，他即表现反动，这次革命势力进城，他就跟反动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样，民国九年何师父创用机器，兴“上海装”（破胸、圆角、打边）。民国十二年，上海装不要了，行一种破胸、方角、大边装。去年起行“广州装”（七扣四

袋而身很长)，一小部分人喜欢穿这一种，但多数人还是大边装。从来的衣，一律是旧式的“大襟装”，从兴新学起，开始有破胸新装，到了民国七八年，新装渐渐多起来。但直到去年，拿全县人口说，还是旧装的多，新装的少。近两年来，尤其是土地革命胜利后，新装日渐加多，特别以青年为普遍。青年学生，不待说老早是新装，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大多数也是新装了，除非是很穷无钱做衣服的才仍然是旧装。在青年群众中，特别是鞋子起了个显著的变化。去年夏季，南半县抗租得了胜利，冬季又分了田，农村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胶底鞋和运动鞋来（这种鞋的底是从广州运到兴宁，兴宁做成鞋子，每双十毛左右）。赤卫队和苏维埃办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们还要佩个电筒，系条围巾，有些还要穿薄毛羽的夹褂子裤。

城里手工缝衣店至今还剩三家。

手工与车子的比较是：手工做一件的时间，车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价的比较：每套短衣裤手工做七毛，机器做六毛。货色的比较：车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机器哪得不驱逐手工？

全县重要圩场吉潭、澄江、石排下、车头、牛斗光、留车、篁乡（采用机器比任何一处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处，都有缝纫机，因此全县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废除手工、采用机器做衣了，特别寻乌的南半县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

（12）伞

彭万合、李祥仁两家造纸伞。彭万合是武平人，在寻乌城开伞店，开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来寻乌时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伞逐渐赚了钱，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动前，连田产共有千多两块钱资本了。店主彭老五子，他的父亲彭盛祥十多年前在寻乌南

门外田背地方买了六十担谷田，起了一栋新屋。他家兄弟老三、老七在田背住家。他自己在城内做伞生意。田背的田租给农民耕种，每年收租十分之五。他家本有七个兄弟，死了四个，还有三个兄弟，六个儿子、侄子，一个母亲，三个妇人，五个媳妇，共十八个人吃饭。儿子在初等学堂读书。他们三兄弟中，他是做伞的，三十岁了。请了两个工人。他的兄弟老七子，二十多岁，曾在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读过二十几天书，就碰着三二五暴动，反动派加上他“暴徒”的罪名，没收他田背的家产，烧掉他田背的房屋。老三、老七都在城东学校毕业，不过老三读的是在“毕业公司”时代的城东学校，老七时城东学校却已经是改造过的，即革命的中山学校派办理的时候了。因此老七于城东学校毕业后，也就进了中山学校，加入“暴徒”队伍里。老三自城东毕业后，就在武平当小学教员，现在老七也跑到武平去了。老五的店子现在只有四五十元资本了。他父亲彭盛祥时代（光绪年间）纸伞还很盛行，那时候社会用的伞有了三成洋伞，还有七成是用纸伞。民国到今，恰好翻了一个方向：洋伞占去七成，纸伞只有三成。不论城乡，不论工农商学，凡属“后生家”和“嫩妇女子”，差不多一概打着洋伞了。洋伞是从梅县和兴宁来，因此彭盛祥时代南半县的留车、牛斗光要到县城彭店来买纸伞，现在却通通往梅县、兴宁买洋伞去了。从前彭万合每年要造出三千把纸伞发卖，现在每年不过只造得千二三百把了。从前（光绪年间）彭店雇工六七人，于今只雇两个人了。伞价从前每把二毛五，于今四毛五。

李祥仁是个南康老表，四十多岁，伞工出身，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四五十元本，每年出伞二千左右，请了两个工，一个削骨子，一个褙纸，他自己上油。

洋伞有羽绸伞、洋布伞两种。羽绸伞通是日本货，中国不能做。洋布伞的洋布和铁骨也是外国来的，中国人把它绷起来，加上一个伞把子。羽绸伞每把价一块大几（谓一块五毛以上），洋布伞每把一块二三。纸伞、洋布伞、羽绸伞的销行比例是：纸伞、洋布伞各百分之三十，羽绸伞百分之四十。

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它的原因不外：一、伞业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二、伞店的学徒比杂货店的学徒要辛苦，学做伞十三四岁才去学得，要煮一店人的饭，又要买菜，又要扫地，又要捡拾作坊里一切拉拉杂杂的东西。

（13）木器

从前只有一家，胡东林，赣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开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种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铺、脚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盘、招牌、匾额（酬神、祝寿、颂德等用）、对联、书箱、衣箱、壁橱，学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礼用的扛盒和撑格，等等。

木器店算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销在城区，而且销往各区各县。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给工农贫民，而是供给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和富农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工农贫民要不了，除非为了嫁女才向他买些小衣箱、小柜子之类。他家很苦，在赣州。二十年前他从赣州来寻乌帮人家做木工，积了点子钱开个小木店，慢慢发展，盛时请过四五个工，赚了千把块钱，付了一半去赣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没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个工人，他自己做，儿子帮一点，仅仅敷口。衰败下来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县没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响。地主阶级和

其他有钱人也不做寿了，也不做热闹喜事了，酬神和歌颂功德也停止了，学校也大半关门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败下来呢？

他的木器的样式，凡供给封建地主的一概是旧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进步样范的，那就是学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师有来往。南门外福音堂和教会医院的建筑，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亲戚薛某，去年邀了十个人打了一个“月月标”的会，每人五块钱，共五十元起本，开个小小木货店在城隍庙侧边，不请工，两父子做，一年蚀了本，奄奄无生气了。

工农贫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场上供给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脚盆呀，饭甑呀，饭盆呀，饭勺呀，水勺呀，锅盖呀，倾盆呀（覆菜碗、覆锅头的盆子），砧头呀，菜板呀（切菜用，圆的叫砧头，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篮呀（盛了割下来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斗呀（打禾用），砻盘呀（推子），楼梯呀，等等东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里“做圆木的”匠人们挑了来卖。并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东西，是依了时节和需要而向圩场上供给的。砻盘一种要定做。风车要上杭师父才能造。全县有十来个上杭师父，每年由上杭来一二次。水车一门，本县农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县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着水车这种东西。

南门外还有两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贫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资本家乃至稍微有几个钱的佃农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请木匠做棺材。只有极穷人家，或是“抖紧”时候（急用时候），才会买这种火料子。失了东西或被人损坏了东西的人，常常是这样破口大骂：“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

的！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爱割”的“割”，消灭的意思。）这就是形容火料子这种棺材是不名誉的人才用它的。有钱人家自己请木匠做棺材，这种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风车的师父们，他们兼着造棺材。

(14) 火店

有刘万利、合昌隆、刘鸿兴、温得利、潘发利、潘金利、汤日恒、同来安、曾记涛、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刘矮二（兼卖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里的客人以挑担子的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卖牛的，背包袱子的（背着包袱子向着别地找生活去），四乡到城里来打官司的，往赣州读书的，变把戏的，卖膏药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缘的，行医的，看风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莲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担子客人中，大多数是鸡鸭客子，少数是挑烟皮客子（烟皮即烟叶）。

开火店不要多的资本，只须几条旧被窝，几床粗席子，买点米买点柴火，就可开张。店屋租钱要在几个月后才交付。

开火店赚钱，靠赚那些撑伞子的和穿长衫子的。他们来了，把点好东西给他们吃，把点好床铺给他们睡，要走了给他们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担子的及其他穷人来了，火钱（即歇钱）饭钱都要轻些。吃饭照碗数算，比长衫客子照餐数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会吃的一碗又一个零碗就够，不会吃的半碗也够）。吃酒的一壶水酒等于一碗饭价。火钱每夜三个铜壳子（即铜板），因为要点一盏灯火，还要烧水洗身，故要火钱。冷天盖被窝，另拿被窝钱，每人两个铜壳子。火店卖酒饭的利润，每十毛本赚四毛。真的讲起来，开火店的赚钱，还是靠畜猪子，因为火店的糠、饭汤和零饭，是经常有的。

火店的对头是警察和衙门口的差人，因为警察、差人要盘查，常常借了盘查为难客子，弄客子的东西，如像借了查烟土，一转眼把客子的银钱偷去了。若当戒严时候，还要因对答不妥当受那无妄的飞灾。以此客子怕上城里的火店，天还没黑，就在黄埠、河岭、长举、新寨等离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来，火店的生意大受影响。

火店中，同来安店是反动的。店主陈登祺，出身却是贫农，家在留车，穷得没饭吃，因为他会两手打，便在留车一带乡下教打。民国七八年他到县城当法警，民国十四年就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他因与官厅勾结，又跟留车劣绅陈吐凤要好，三二五暴动时保护县长谢寅出险，为谢所赏识，政权恢复，被提拔为靖卫队长。他率领队伍到双桥一带掳人勒款，焚烧革命群众房屋。谢县长走了，他回到火店里。这回苏维埃没收了他的房屋。

(15) 豆腐

以不满三千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赚一毛半。所谓“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子七块，三个铜壳一块。若是小豆腐干，则每桌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种。水豆腐销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开豆腐店赚钱，主要还是拿豆腐渣畜猪子。因为每天普通只能销一桌豆腐，特别情况才能销两桌，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

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猪，每店每年可畜四个，约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猪供米要多，还不如畜猪子划得来。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边磨豆腐，一边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

(16) 理发

全城理发店八家。民国元年以前器具都是旧式的，装式则一律是辫子。民国元年起，开始用洋剪（挥剪和毛剪），样式一概和尚头，没有别的。民国二年开始兴“东洋装”，器具还没有大镜子，也没有化学梳和轻铁梳子。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陆军装”，还是没有大镜子等。民国十年加上赣州来的“博士装”，寻乌学生到赣州读书传来这种新样。民国十二年开始有了宽八九寸、长尺二三的大镜子，又将一尺长四个脚的“单凳子”换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开始输入了轻铁梳。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梅县来的。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的。现在县城及别的大市镇中，剃光头的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乡村农民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剃光头。在整个人口中，那种剃平头、陆军头等等新样子的，还只是一个小部分，这一个小部分又全数属于青年群众。

理发价，剃光头、挥光头都一毛，挥各种新装一毛半，修面只

半毛。

开理发店要四五十元本，师父普通请两个，少的一个，至多三个。工价以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九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块钱生意，普通是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能进三元，每年能进千元内外。开销工钱百多元，其余都归老板，再开销伙食（以四个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内），可赚四百元内外（老板自己的工钱在内）。这一笔钱的消耗呢？就是老板的嫖和赌。

剃头和裁缝，不论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赚项储蓄起来发财的，原因是这两种人多半聪明伶俐、好嫖好赌、好吃好着。为什么这两种人是这样的呢？大概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卑下。前清时候，社会上看剃头工是属于“下九流”的。别的地方，缝工的社会地位也很卑下。缝工虽有老婆，但他们仍是好嫖。剃头工则十个有八个没老婆。这种没老婆的人并不觉得苦楚，他们倒在嫖的上面表现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对“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脚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烟铳），五采茶（男女合唱采茶戏），六唱戏，七差人，八剃头，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1]，五流丹青^[2]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铁

三家打铁店，叶师父、杨师父、李师父。杨师父安远人，叶、李均于都人，每家资本五十元内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头，锄

[1] 堪舆，和本文中的“地理先生”“看地的”，均指看住宅基地和坟地的迷信职业者，通常称为“风水先生”“阴阳先生”。

[2] 丹青，通常借指绘画。这里指画工。

头，铁鋤（即耙头），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鲢鲤刨，梭镖（寻乌土话“炮子”，梅县叫“挑笔子”，东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锅铲（炒菜用），铲子（刨锅头用），火钳，火铲，钩环（挑水用），铁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种铁器（各种刨铁、各种凿子、斜铲、铁锤、凳头钳、角罗钻、割刀），铁尺（做衫压布用），绵刀子（裁缝用），马刀，关刀，双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铁钉，门鎗（上门用），铁箍。除马刀、关刀、双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销向城厢附近。打铁器和打铁方法，一概旧式。

铁是城区南厢的黄沙水，双桥区的铁鋤水、石塅坑，南八区的车头、横径、大陂角六处地方所产，每处都有炉，铸铁，又铸锅头、犁头、犁壁（犁鋤）。铸出的铁不但销在本县，大部分还是销往惠州、石龙，也有销往门岭的。锅头除销本地外，约有半数销往会昌及赣州，还有一小部销往潮汕。犁头、犁壁销在本县。每个炉子要挑响炭的（响炭即木炭，铸铁、铸锅都用它，挑的约二十人），烧炭的（用木烧响炭，每窑三人，五窑炭供一铁炉，共十五人），运砂的（铁砂从山崩下，农民挑运卖与打炉子的，这种工人不便统计），以及炉厂内的工人（高炉铸生铁十人，炒炉铸熟铁十二人，铸锅头十二人，火夫一人，坐柜和行走三人），共计一炉铸铁需二百人上下。每个炉子单铸铁要资本千元，单铸锅头也是千元，铸铁兼铸锅头则需二千元，大宗开支是砂子和响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钱。炉厂有独家开的，也有合股开的。工人的工钱，师父（工头）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食吃老板的。坐柜每年七十元。师父和工人以日计，做一天算一天，坐柜以年计。还有神福、红包和来往盘缠，都是老板对工人的缴费。师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蚀本。师父会做的每年可得工资五百元。每间炉厂每

年能生产四千元，六个厂二万四千元。民国以前没有洋铁来或来得少，工价又便宜，寻乌的铸铁生意比现在大，会做的炉厂每年能生产二万元以上。前清时虽只有两间炉厂，却共能生产四万余元。现在炉数加了，每间炉厂的产量却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钱贵（工钱贵是因外来工业品贵）和洋铁侵入。

铁价现在比三十年前（光绪二十五六年）贵两倍，那时生铁每担（四十斤左右）最贵不过十一毛，现在却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钱买一斤生铁。三斤生铁打成一斤熟铁，价五毛。

本城三个打铁店，两个于都人，一个安远人。乡下打行炉的通通是于都人。于都铁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炉子出门，高炉每座四个人打，矮炉三个人打，共有铁工一万三千左右。他们打铁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广东，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18）爆竹

一间爆竹店，钟老板，会昌人，几十块钱本，开了六七年。自己及请的一个师父共两个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习惯大年初一那天大放其爆竹，寻乌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两块钱。今年初一反动政府宣布戒严，不准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准放，爆竹生意因此大减。南半县农民暴动区域彻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钟老板的爆竹生意减少了，从前梅县和门岭两方输入寻乌的爆竹，近来也停止了。

（19）打首饰

寻乌的妇女们也和别的封建经济没有彻底破坏的地方一样，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

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银也是个名，实际是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有些是铜上面涂一点银。打这种首饰的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几十元做本。他们的首饰，一部分是人家来定做的，一部分是用个小匣子装着背往四乡去卖的。七家首饰店中，有四家是一个老板、一个工人、一个徒弟三个人做事，一家是四个人做，一家是两个人做，另一家只一个人做。学徒制度与理发业差不多，不过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烂一些。

(20) 打洋铁

一家，刘俊记，兴宁人。前年来本城开店，以前无所谓洋铁。三十块钱本，一个老婆、一个徒弟和他自己三个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铁灯呀（不^[1]灯），盛洋油的壶子呀，盛茶油的壶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烧茶吃的壶呀，洋油透子呀（滤子），酒透子呀，盛茶叶的瓶子呀，各种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这样一个洋铁店乃社会需要的。生意也很赚钱，三个毛子一只洋油瓶，从本城、吉潭、三标、澄江、牛斗光等处杂货店里收了来，做成洋铁器以六个毛子卖出去。此次红军进城，刘俊记不知何故跟着反动派跑了。

(21) 修钟表

也是一家，叶公昌，梅县人，除工具外，十把块本钱，专门修理钟表。全县除本城一家外，牛斗光还有一家。两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开的。寻乌全县有十二万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钟表，共有钟或表二千四百个，所以需要一两家修理钟表的店子。

[1] 不 (dùn)，方言，指形状短粗、矮胖。

(22) 圩场生意

寻乌城还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着的城子。以寻乌情形说，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店铺生意与圩场生意的比例是：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

圩场生意的要项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铺不做这门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许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农民部分自己有米），而且运到广东去。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叫做“盐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寻乌城一切生意大。寻乌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盐（年十万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货（十万元），第四豆（二万余元）。米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国元年五元，民国十六年旱灾有过十六元，本年红军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落墓，从四乡挑来“赴圩”。木炭（响炭）价，光绪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涨到二十二毛，现每百斤十六毛。片柴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国元年二毛二三，民国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国十六年到现在五毛到六毛。

第三猪肉。前头店铺生意中已讲了的三个案子，其实应该讲在圩场生意里面，因为是圩场上的生意。

第四猪子。细猪子（两个月的）和猪条子（三四个月的）都没有行，都在圩场上买卖，每圩约三十个，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个上下。现细猪子每斤三毛，猪条子二毛，大肉猪二毛五。为什么猪条

最便宜呢？因为猪条子是四五十斤一个，不是很没有钱用的人不肯拿了出卖的，但迫得拿了出卖时，人家就卡他的价钱了，他也只得忍痛丢手。

第五鸡鸭。本地四乡来圩上零卖的，为数不多，平常每圩鸡鸭两门十把二十只，也有时一只都没人要的，这证明了寻乌城之苦。过年过节每圩可销百多只。价钱，鸡每斤四毛半，鸭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场出卖的部分已在前面店铺生意中木器项下附带讲过了。现在讲竹器，谷箩、谷笪（笪读达，即晒簟）、畚箕（挑灰粪下田的）、鸡鸭笼、猪笼、篮子、橐子（盛米果等零碎东西的）、磨栏（即栏盘）、糠筛、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捞（捞箕）、筷子、扫把、洗锅把、掇耳子（即鸬箕，比畚箕小）、角箩（小孩子装米果吃的小箩子）、篓（即鱼篮，摘茶子^[1]也可用）、河子（即“得鱼忘筌”^[2]之筌，别处曰篆）、茶篮、笠麻（斗篷）、菜篮、晒篮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场上卖。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苋菜、藠头、脉子、芥蓝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丝瓜）、节瓜、甜瓜、黄瓜、西瓜、番莆（南瓜）、茄子（广东人叫吊菜）、凤菜（又叫空心菜，别地叫蕹菜）、芋子、莆子、萝卜、韭菜、葱子、茼蒿菜、白菜、菜头（芥菜头）、当机（即刀豆）、辣椒、雪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八月豆）、老虎豆、树豆子、青豆芽、黄豆芽、马齿、黄芽白，以上各种小菜都由附近乡村供给本城居民。

第八鱼。有鲩、鲢、鳙、虾子、鲤、鲫、黄鳝、泥鳅、虾蟆、

[1] 茶子和本文中的“木梓”，都指油茶树的果实。

[2] 出自《庄子·外物》。原文是“得鱼而忘荃。”荃亦作筌，捕鱼用的竹器。

虾公、元鱼（脚鱼）、河鱼子、“抢”等等。普通市上卖的只有鲩、鲢、鲤、鲫、黄鳝、泥鳅、虾蟆数种，其余各种不经见。鲩每斤二毛半，黄鳝每毛十两，泥鳅每毛一斤，虾蟆每毛七两。“抢”是少有的大鱼，寻乌城去年曾卖过一个四十斤的，别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带循河上来，个把人淹死在水里，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糍粑、那子（粉皮）、板子（软板子、铁练板、铁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鱼子板、芋叶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种）。圩期到了，他们就来了，特别是“会景”的时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时候）来的更多。一两块钱本钱。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荠次之。此外，枇杷、柚子、杨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娇呀，月娥呀，钟四妹呀，谢三妹呀，黄昭坤呀，戊秀呀，润凤呀，大观兰呀，小观兰呀，昭娥呀，来昭呀，玉淑呀，五凤呀，亦娥呀，都是这个苦群众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观兰、亦娥两个外，都是人们所谓“嫩货”，润凤、戊秀、月娥、五凤、昭坤五个更加著名。

科举未废、文武两考盛行的时候，也有现时这样多的娼妓。科举既废，逐渐减少，光绪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几名了。往后又渐增多，到现在又恢复科举时代的盛况。南城县革命向北发展，同时红军开抵澄江，娼妓们许多跑下乡去了。她们中间传说，“红军见草不留，扫把都要过斩”，所以她们吓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所谓少爷）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豪绅嫖娼的最多，少爷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长月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离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

（24）同善社^[1]

约当光绪二十七八年时，赣州一个绸缎店恒孚号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寻乌来开办同善社，他就是所谓天恩先生。那时的善长古鹤甫是个秀才，住在城里，家务也不很好。后来善长改了潘明典，是个拔贡，有千元上下家资，现做九江地方法院书记。郭友梅是光绪二十七八年进的同善社，那时候有社员百把八九十个，以后还进了好多，最盛时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发源在四川，由那个四川的同善社发出公事到各省开办同善社，各省的政府准许后再向各县开同善社。赣州府的天恩先生是得了南昌省的公事的。他来到寻乌，首先拜会县知事，知事赞成了，出了保护告示，同善社就可以大大地开起来。入社是要经过神明的批准的，一个筒子放些纸坨子，有的写个“准”字，有的就是白纸。同善社的神明叫做达摩祖师，介绍人引导要进同善社的，走到神明面前磕头祈祷

[1] 同善社，从先天道分化出来的一种会道门组织，清朝末年发源于四川省永川县，后在反动政府扶持下逐渐蔓延到许多省。

之后，伸只手到筒子里拈那纸蛇，拈个“准”，便进同善社，拈个白，不能进去。有个屠夫三次都是拈个白的，有个土豪四次都拈个白的，“莫说无神也有神哪”。林虎到过寻乌城，好大一个头，二十八九岁，威武得很。许崇智^[1]也曾到过这里。林虎部下营连长有七八个进了同善社，在这里扎了一个多月。进同善社要入社费一元，以后随时捐钱，也不勉强。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来要捐钱，公事上说：“捐了钱，二天到那里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饭哪。”郭友梅捐过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寻乌社二百多人中有三四十个是女子。他们的成分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农民百分之三十。但所谓农民没有贫农，都是“有碗饭吃的”“不求人的”。民国七八年省政府来公事要停办同善社，停了一两年。随后唐生智^[2]有公事来，说“善菩萨，可以信得，不要取消它”，又办起来。民国十二三年政府又来公事要停，才停止到今。

每天早中晚三次静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两天内不能和女人睡觉，睡了就不灵验。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层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讲，郭友梅还只两层工夫，未曾听得什么秘密。四川有个九层工夫的天恩先生到过赣州府，那里同善社每人出两块钱接天恩先生的风。方本仁^[3]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两次“龙华会”，社员都到，见人出两毛钱，向祖师磕头，奏鼓乐，吃斋菜。

进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1] 许崇智（1887—1965），广东番禺人，曾任粤军第二军军长、粤军总司令等职。

[2] 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1927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3] 方本仁（1880—1953），湖北黄冈人，曾任北洋军阀赣南镇守使、赣粤边防督办和江西军务督办等职。

寻乌县长曾有三个进了同善社，他们和社员们一样到同善社磕头。

(25) 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乌这个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析起来，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业比例如下：

职业	人口数	百分比
农民	一，六二〇	六〇
手工业者	二九七	一一
游民	二七〇	一〇
娼妓	一六二	六
商人	一三五	五
政府机关	一〇〇	四
地主	七八	三
宗教徒	二二	一弱
共计	二，六八四	一〇〇

看这个表，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所谓手工业者，包括各业手工工人和手工业主，商店的店员也算在内。所谓手工业，就是缝纫店、黄烟店、酒店、伞店、爆竹店、理发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饰店、洋铁店、修钟表店、屠坊店这一些。所谓宗教徒是耶稣教十人，天主教三人，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本城纯粹地主十二家，共约七十八人。商人兼地主五家，算在商人里面。商人是指盐行、杂货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货店、药材店、火店等，共计一百三十五人。娼妓是三十多家，三十几个妓女，却养活一百六十二人。

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同等。若把游民和娼妓合计，便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这表示失业群众之多是怎样的可惊。所谓政府机关一百人，是指新的县苏维埃、城区苏维埃两个机关（四十人），加上县苏赤卫队（六十人），不是指的旧政府。但是旧政府机关人数也是与新政府人数差不多的。说到这个群众中的领袖部分，即那旧社会的指导阶级，自然不是那总数占百分之八十七的农民、工人、游民和娼妓，他们是被统治者，统治者是那仅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稣教天主教传教士等。商人的商会虽没有多大权力，商人群众中却有几个人参加那统治全县的县政府。不过那几个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说话，他们是接受地主的领导，帮着做些事。这也是因为寻乌城商业不但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

商人而能向政界话事的：第一个算何子贞，豆行老板，用个假名出张帖子拿给别人去开。他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当公安局长，又当警察队长，又当国民党委员。他父亲承包牛岗税，剥削牛商。他初回寻乌表现的是资产阶级意识，颇有新派之称，后来便与地主妥协了。现逃。第二个是黄光甫，水货店宝华祥的老板，商会的文牍，能到衙门话事。现逃，店没收。第三是火店老板陈登祺，初当法警，升靖卫队长，跑衙门。现逃。第四是杂货店主陈志成，虽没做官，却事事与反动派同谋，有会必与。现逃，店没收。

十二家收租的地主，列举如下：

何德新 从前收租五六百石，现收百石，七八个人，仅够开销。乡人和衙门有交涉时要请他话事。他儿子何挺拔，平远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

何成治 收三百多石，人少，有三百石出卖，是城内第一个大地主。何成治死，寡妇当家，买个儿子不能话事。

刘佛荣 收二百多石，人少，有谷出卖，寻乌城第二个大地主。“水浸牛皮——很吝”，不与外事。

刘段轩 只收几石谷。中山派，与何子贞打官司打穷了。他的儿子还在赣州班房里。他的儿子是赣州第四中学毕业，新的城东小学校长。

范老八 百多石，有多余。他哥哥开顺昌老店，他在家收租，不走衙门。此次派款三百元。农民没收了他。

范家声 百多石，有多，十五六岁，中山学生，被何子贞罚款。此次又被苏维埃派款一千元。

张三玉 百多石，有多，寡妇管家，不出面。

邝四嫂 几十石，有多，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不反动。

吴老四 已死，留个寡妇，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百多石租，有多，不话事。吴老四光绪年间坐县署征收柜，全县钱粮由他过手。死了四年。

范明才 先前开杂货店，歇了十多年了，收八十石，稍有多。民国初年当保卫团总，是劣绅，好嫖，好赌，现跑了。

何祥盛 摆摊子出身，做水货生意发财，三二五暴动被罚款，生意关门。他儿子何家常，买来的，梅县东山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领袖之一，共产党员，过番去了（往南洋叫“过番”），现到福建。

何学才 何子贞之父，县衙刑房科写口供，后做堪舆，承包牛岗税，买了几十石谷田，是个大劣绅。

以上十二家是纯粹地主（两家中地主，十家小地主）。其中何德

新、范明才、何学才三人是积极反动分子，刘段轩、范家声两人是同情革命的，何祥盛的儿子何家常是共产党员，其余六家是所谓“只顾发财不管闲事”的。

下面五家是商人而兼地主：

钟汇通 寻城第一家盐行，二百二十石租，有百石余剩，跑衙门，话事情。

骆晋丰 分成四家，共六七千元。老二最富，有二百五六十石租，老实，不话事。老大死了，十多石租，糊口不够。老三有三四十石，糊口而已。老四（前商会会长，同善社主任教员）也只几十石，仅糊口。

荣春祥 几十石租，全部储蓄着，做生意吃饭，不话事。

温荣记 八十石，全存着，做生意吃饭。第三个儿子温锡纯与新寻派勾结。

林笔利 水货生意，百多石，稍有多，不管闲事。

以上五家均商人而兼地主。其中钟汇通与温荣记是反动派，余都是所谓“不话事”的。五家中钟汇通、骆晋丰两家是中地主，余三家是小地主。

第四章 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

本章目录

- 一 农村人口成分
- 二 旧有田地分配
- 三 公共地主
 - A. 祖宗地主

B. 神道地主

C. 政治地主

四 个人地主

A. 大地主

B. 中地主

C. 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D. 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E. 小地主

五 富农

六 贫农

七 山林制度

八 剥削状况

A. 地租剥削

1. 见面分割制

2. 量租制

3. “禾头根下毛饭吃”

4. 批田

5. 批头、田信、田东饭

6. 谷纳、钱纳

7. 铁租、非铁租

8. “要衫裤着去捞”

9. 劳役

10. 土地买卖

B. 高利剥削

1. 钱利

- 2. 谷利
 - 3. 油利
 - 4. 卖奶子
 - 5. 打会
- C. 税捐剥削
- 1. 钱粮
 - 2. 烟酒印花税
 - 3. 屠宰税
 - 4. 护商捐
 - 5. 牛捐
 - 6. 赌博捐
 - 7. 财政局总收入
 - 8. 派款借款

九 寻乌的文化

一 农村人口成分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零四五
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四
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	百分之三
破落户	百分之一
新发户	百分之二
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	百分之四
中农（够食不欠债的）	百分之一十八点二五五
贫农（不够食欠债的）	百分之七十

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专门脚夫） 百分之三
游民（无业的） 百分之一
雇农（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 百分之零点三

二 旧有田地分配

公田 百分之四十
地主 百分之三十
农民 百分之三十

三 公共地主

A. 祖宗地主

寻乌公田多，成了各区普遍现象。各种公会多得很，祠堂里的公会如什么“公”什么“公”，差不多凡属死人，只要是有“后”的，而他的后又是有钱的，他的所谓后者必定从他们的家产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个公。这种凑份子立公的办法是什么姓都普遍采用的。凑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现钱。再则那什么公还在时，他自己就留出田产立起公来，这一种比前一种更多。公田一经成立，就年年收租。租除祭祖用费外，大概总是有多余的，便把它积蓄起来。积蓄的方式不是拿谷积蓄，而是拿钱积蓄，就是每年把多余的谷子粜给贫民，把钱积起来。积得若干年成一笔大款，便购买田地。如此下去，这一公的田地就渐渐地增多起来。但这积蓄增多的在全部款子中只占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的子孙均分了去。多半是子孙穷苦的多才主张分的，子孙富足的多呢，那便不主张分

了。分是在什么时候呢？又是怎样一种分法呢？就是当那过年过节时候从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没有分（有些族上寡妇有分），每人分得几斗谷、几斤肉。这种谷叫“红丁谷”。肉有四个项目：一是“胙肉”，从前是秀才、举人有功名的人分的，后头加上“毕业生”。二是“房股肉”，每房一份。三是“老人肉”，七十以上的人每人一份。四是“丁肉”，每个男子一份。分的次序：先分胙肉，次老人肉，因为这两种人是可贵重的，每人大概分一斤。次房股肉，每股十斤八斤的有，十多二十斤的也有，整的分出去，再零分与房众。为什么要分房股肉呢？这是一种斗争，房下人少的要分房股肉，房下人多的反对分房股肉，主张分丁肉。但结果各地多半是照了人数少的房份的意见分了房股肉。为什么少数对多数胜利呢？因为这种公的产业，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权利的。次分丁肉，不是每个公都有分，多数公是没有丁肉分的，这是因为公款不多，或是人太多了的缘故。有少数公堂谷肉不是平分而是轮分，名义叫做“轮收”，又叫“管头”，轮流替祖宗收租的意思。租收了，每年开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头的荷包里，这并不算“吃油饼”，因为这样做正是公堂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呢？当他那个祖宗还没有死，把家产分拆给儿子们的时候，为了怕他的子孙日后把分得的一点田产变卖了弄得没有饭吃，就从田产中挖出一部分不分，作为公田，永不变卖。一面有了他死后的祭费，一面呢，他的穷困的子孙便得了周济了，这叫做“留出后路”。他的子孙也很赞成这种办法，因为这就是为自己留出后路。凡那祖宗生前没有立起会的，祖宗死后，子孙们只要稍为富裕也必定为他立会，出名叫做祀祖，其实是为了自己。所以轮流收租名则是轮流替祖宗收租，实则是轮流替自己收租。在这个意义之下，那些贫苦子

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那些穷苦人闹着要分公田也不是要分了田去耕种，他们是要分了田去变卖，得钱还高利债或买明天的早饭米。在这种情形上面，看得出贫农群众因为他们苦得没有米煮，便把什么“祭扫”呀、“慎终追远”呀等等封建思想逐渐地不要了，他们的生活迫着他们要不了这些宝贝了。

总计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六十。

B. 神道地主

神道地主即神、坛、社、庙、寺、观六种。“神”是指的各种各色的神，许多都有会，如赵公会、观音会、关爷会、大神会、真君会、婆太会、赖爷会、公王会、伯公会、文昌会等等，都是没有庙的。还有一种醮会，祈神之用，也属这一类。在上述的各种神内有一部分是立了“坛”的。坛是立起一块石头，有的几块石头垒成一个小屋，那里面藏着好灵验的神呀，因此叫做坛。不论神、坛，凡有会都有公田，出钱弄这种神会的通通是富农地主。神会的产业百分之九十五是田地，百分之五是谷子和钱。这种田、谷、钱，叫做“会底”。目的：一是为神，因为神能保佑他们人畜清泰，财丁兴旺；二是吃东西，神诞那一天吃一顿，过年过节还有肉分，但要斗了份子的才有吃有分。斗过份子后来穷了的，有顶退份子的办法，譬如每份是五块钱会底，人家就出五块钱给他“顶”了去，他就算是“退”出了会。“社”是与“神坛”有别的一种“社坛”，每个村子有一个，即使那个村子只有三家人，也有个社坛。为什么要社坛？保佑禾苗没有虫子食、牛猪六畜不至于遭瘟，保佑人们得到康健。每个社都有会，二月起，十月止，每月都开会，会期普通是初

二，有些地方是十六。开会那天，同社的人每家来一个，不分贫富，一概有份，杀猪买酒，大吃一顿。吃过之后，开堂议事，作陂开圳呀，禁六畜伤害禾苗呀，禁胡乱砍伐山林竹木呀，条规不一，议论纷纷，也没有什么主席，也不要什么记录。虽然乱讲一顿，却有一种自然的秩序。就是当那所谓“老前辈”或所谓“更懂事的”讲得“更公道”的时候，大家都说他的话“讲得好”，就是这样子成了决议。这种社是群众的，虽然也信神，却与地主富农的神坛完全两样。这种社的会议是农民作主，不是豪绅作主，也不完全是富农作主，是大家来而“更公道”的人的话为大家所信仰，这个人就作了无形的主席。社坛有公堂的最少，大多数是每月初二开会（要敬神）时候大家斗钱，每人每次二毛、三毛至四毛，不来吃的不出。再讲到“庙”。庙是有屋子，而屋子里面有菩萨的。庙有个庙祝，土名叫做“庙老”，是个老头子，服侍菩萨，招扶香灯。庙多少有庙田，也有无田的庙。有庙田的，庙老吃庙田的租，无庙田的，庙老伙食从群众中捐钱谷。庙有城隍庙、关帝庙、三官庙、三圣宫、赖老庙、龙王庙、关岳庙、杨公庙、东岳庙、江东庙等等。庙的性质，是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的意思。神坛是地主需要的，社坛是农民需要的，庙是地主、农民共同需要的。庙的田产很少，租入不够香纸费及庙老用，所以不是严重剥削所在。“寺”则完全不同，它是和尚的巢穴，是剥削厉害的地方。寺产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为什么施田地给和尚呢？因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大地主为了“修子修孙修自己”，所以施田给和尚。五福庵、回龙寺、正觉寺、观音阁、东笔山、大悲阁、鹅湖庵、西竹山、天台山、狮子岩、三角峰、角公岩、法华庵、西华山、南阳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龙山，都是城

区附近的和尚寺。道士斋公的叫做“观”，则有云盖峰、大山里、川塘坑等等。观的田产的来源和剥削的状况，与寺无二样。

总计神道方面（神、坛、社、庙、寺、观）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二十。

C. 政治地主

又分二类，一是考棚、宾兴、孔庙、学租一类属于教育性质的，一是桥会、路会、粮会一类属于社会公益性质的。

县城的考棚田收得六百五十石租，经手的豪绅“吃油饼”吃去一百八十石，交出四百七十石与考棚。考棚田的来历是前清时候修建考棚，大地主捐了许多谷子，建筑余款，置买田地，作为考棚年修经费。起个“尚义祠”，把那捐款大地主的姓名写在木主上，捐多的主高，捐少的主矮。

宾兴田的来历也是地主捐起的，田散在全县各堡，多数仍由原主管理，年交收获之五成与县城宾兴祠。宾兴祠在各堡设有分局掌管田产。田产的用途是作为乡试、会试的路费及中了举人、进士的奖赏（主要还是作为乡试路费和乡试奖赏），奖赏的别名叫做“花红”。县宾兴祠年可收千五六百石谷租。乡试（省考）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举行。每届寻乌试考的一百多人，每人路费二十四元，中了举的有花红百多元。宾兴祠内有百几十块木主，写的都是出捐的豪绅们的名字。科举废后，凡在赣州第二师范毕业的，每人发参观费三十元，使他们好往江浙一带参观。此外，往外国留学的也曾津贴过一回，一个留学日本的给了三百六十元。县城办简易师范及高等小学，即是用的宾兴祠的经费。

建筑学宫也是地主捐钱，因此也如尚义祠、宾兴祠一样，起了一个“好义祠”，纪念那般捐主。后头祀孔经费又捐了千多元，是款

子不是田地。

学租是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如篁乡古姓有学租一百石，车头邝姓有二百多石，至少的也有几十石。此外城区有“薪水会”，各区也有。各区普遍地有“文会”，性质同是奖励取功名，但系一种地方形式，由几姓或一区集合起来的。还有篁乡古姓某地主（古柏的祖父）捐出一百石租起个“尊育堂”，却是奖励全县读书人的，算是一个特别形式。

总计教育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至于公益性质的桥会、路会、粮会的土地，数亦不少。不但大桥、长桥有会，村落小桥也往往有会。有会就有田，都是地主、商人捐起的，目的是修理桥梁。起始钱少，逐年放债堆积起来成了大数，置买田地。每年十二月算数、敬桥神，名之曰“做桥会”，捐主都来吃一餐，吃了之后还分猪肉，所以桥会实在是个剥削机关。桥会大的有八千元，田产每年收租五百石，那就是留车的浮桥。小的有二三石租的，乃是很小的小桥。

路会不多，会田也少，全县不过十大几个（十五个以上叫十大几个）路会，每个路会不过收七八石谷。为什么桥会发达路会零落呢？因为路烂了修补易，不修补也不至于完全不能走人，桥则不然。

粮会也少，全县不过几个，如篁乡的严姓，大田的梅姓，车头的邝姓，吉潭圳下的刘姓，各有一个，各有些田地。多的如车头邝姓粮会有五百石租的田，原是“军田”，现充粮会。粮会的作用是代替一族人完粮，抵制政府向族内各家迫粮。各方敲榨，各人不利，故斗钱成立粮会，或由各小公出钱斗成。有了粮会，法警只找粮会一处，免得各家受害。没有粮会呢？法警来了，脚钱多过粮钱，逾

限不完要算利息，利又非常之重，因此起个粮会。粮会起始钱也不多，也是逐年放利积起来的。

总计公益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四 个人地主

A. 大地主

以上说了公共地主部分的土地，再说个人地主部分的土地。个人地主土地在全部土地中占百分之三十，比公共地主土地要少。个人地主土地中又以小地主（收租不满二百石的）土地占大多数，中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上但不满五百石的）土地次之，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土地最少。

全县共有八个头等大地主，如城区的刘士垣，篁乡区的罗含章，南八区的谢杰、邝文荣，双桥区的梅洪馨，兼三区的潘明征（绰号“屎缸伯公”），澄江区的林朝官、王菊圆，收租都在千石以上。其中最大的算“屎缸伯公”，他是兼三区的项山堡人，连田地、房屋、山林、牲畜及他在吉潭圩上开的药店、杂货店，共计价值三十万元，田地收租一万石左右。他是全县豪绅的领袖。民国初年他的第三个儿子潘梦春（是个文理不通的脚色，没有考过科举，也没有进过学堂）做过县财政课长（国家财政）。民国六七年他的大儿子潘奕仁（是个秀才，粗通文理）做过三年县财政局长（地方财政，管理考棚、宾兴、牛捐、赌捐、护商捐等款）。民国十三四年潘梦春又做全县保卫团总公所长，统辖七区保卫团，全县实权都在他手

里。他在总保卫团任内为了要钱用，同时北洋军阀邓如琢^[1]部队到县要军饷，发了许多纸票，使用了几个月，被一个中地主叫赖翹虚的在省城一状告了他，才停止了。民国十五年国民党势力来，他就失势，但他立即和原来带资产阶级色彩的、这时已经和地主妥协了的新寻派结合，当上了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今年三月豪绅们把县长胡泽凡推倒，他就上台做县长，红军到来他才跑往武平。他有七十多支枪，被武平钟少奎收编去了。刘土垣算第二个大土豪，但不活动，是个中学毕业生，在县里没有权。谢杰，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做过赖世璜的师长。现在上海组织什么赣南钨矿会，争钨矿自办，加入改组派^[2]，组织“江西自救会”，出版《自救日报》，反对蒋介石。对于“剿共”，呼号甚力。王菊圆，赣州第四中学毕业生，澄江方面很有势力，和流氓很要好。他在澄江圩开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卖生意，店的后楼开个鸦片烟馆，让流氓们去吃不要钱，因此取得一班流氓对他的拥护。他嫖人家的老婆，别人若不识高低也去嫖时，流氓们就要给那个人以厉害的打击，有受这种打击弄得倾家荡产的。

寻乌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有十二个。曹善成（西厢田背），收租五百石，祖父发的财，是个“老税户”^[3]。丘树烈（西厢图合），收五百石，无大用。他的儿子是个工程师，南洋大学毕业，

[1] 邓如琢，安徽阜阳人，曾任北洋军阀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第一师师长等职。

[2] 改组派，是国民党的一个派别。1928年底，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因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被称为改组派。

[3] “老税户”，指祖辈父辈已经是地主的人家。

到英国打过一转，现在天津什么锅炉公司当工程师。曹愿森（东厢），收五百石，本城高小毕业，四十岁了，在东厢有权。黄甲宾（北厢长举），收七百石租，国民党员。何子贞想利用他，他不出来。现在投机，向农民表示好意，要枪交枪，要钱出钱。他说：“国民党没有用，出了钱不能保命，出到苏维埃还可保命。”谢善德（三标鸭子墓），五百石，读老书的，是个“山老鼠”^[1]。王佛盛（水源堰背），五百石。儿子王维藩，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国民党员，在外未归。蓝绍宗（澄江），五百石，蓝死了，寡妇当家。曹国栋（吉潭），六百石，从前称万户，造房子用掉一些，高小毕业，“屎缸伯公”之戚，与潘梦春合作。易展良（双桥区桂石下），五百石以上，开头反动，田快被分掉，又罚去千多元，穷了，不反动了。赖鹏池（双桥区丹溪），称万户，五百石以上，前清附生，老实得很，辫子还留着，但不反动。邝明经（南八区鸡子叫），六百石，他的第四个老弟当白军营长，反动，全家走尽。陈万保（廷岭），六百石，做猪贩，做烟土贩，开杂货店。他自己不反动，他的老弟是新寻派，和他共家，很反动。以上头等大地主八个，二等大地主十二个，共二十个，江西人所谓“万户”就是指的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逐一列出来？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为的这个理由，我们还要把中地主列出来，只是小地主为数太多不便列举。地主阶级中为什么要分出中地主，因为中地主的政治作用不但和小地主大有分别，和大地主亦显然有分别。

B. 中地主

首先举城区。丘伟伍（西厢图合），收四百石，日本帝国大学皮

[1] “山老鼠”，指住在山区，很少外出，不问世事的地主。

革科毕业，在赣州贫民工厂做工程师半年，民国十一年回寻乌做教育局长，进国民党，新寻派领袖之一，为新寻派计划，是个厉害的东西，红军到寻乌，同谢嘉猷一路跑了。黄甲奎（北厢长举），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寻乌国民党指导委员，新寻派分子（新寻学校教员），积极反动。骆松盛（北厢长举），收三百石，城内开骆晋丰杂货店，不积极反动。有个侄子是国民党员，高小毕业，说共产党的坏话。何挺拔（北门城外），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干事，新寻派主要人物，努力于反革命。刘佛荣（小东门外），收三百石，不反动，做医生。

三水区：雷昌响（三标长排），三百石，是个“山老鼠”，无用。胡恩荣（三标圩），三百石，是个斋公，不问世事，专门要两个铜钱，在家里困觉。胡镜如（三标圩），二百石，赣州第四中学毕业，二十多岁，三标有名的土霸，参加县政权。凌鲁石（三标径石），三百多石，老秀才，做过多年财政局长，又做什么课长，又做考棚首士，一连干了十多年，赚了钱，在三标起了新房子，五十多岁。袁德和（水源袁屋，最反动地方），二百石左右，中学毕业，国民党员，反革命。此外，三水区还有中地主多人，记不清楚。

澄江区：蓝子乾，四百石，省立中学毕业，在澄江圩开蓝协泰杂货布匹店，反革命。谢嘉猷，三百石，高小毕业，四十多岁，做过十四军谢杰部下团长，寻乌团防总队长，改组派，把红军五十团第一营消灭的就是他，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凌希贤，三百石，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澄江新圩开个店。

兼三区：陈玉横（吉潭），三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吉潭的土霸，新寻派主要人物，“屎缸伯公”的孙婿，很活动。刘太宗（吉潭圳下），四百石，赌博头子，流氓出身，赌博发财，民国五年还是

“当鸟”（做贼挖壁，夜间出门，叫做“当鸟”）。潘金棣（项山），二百多石，梅县师范毕业，新寻派，国民党积极分子，吉潭靖卫团总。潘明瑞（项山），四百石，“屎缸伯公”亲属，吉潭圩上开了两间杂货水货店，项山反动首领。潘观澜，虽是个百多石租的小地主，却是反动首领，潘丽死于他手。赣州高小毕业，做小学教员五六年，那时并不反动，三二五暴动前后就腐化反革命了。他的父亲是个赌博头子，以此发财。潘明典（项山坪地），百多石，前清拔贡，民国法政毕业，做过陆丰、会昌两县知事，又做本县教育局长数年，还担任许多别的事，有“身兼九长”之称。本是个中等地主，运动省议员用掉四千多元，还是落选。去年做南昌高等法院管监狱所长，今年在九江做高等法院书记官，是个官僚主义者。说话很漂亮，字也写得好，样子也好看，又很规矩，像个孔夫子。潘景文（项山大坜），三百多石，前清秀才，老先生。潘国才（项山村），三百石，也是个老秀才。潘国卿（项山村），只有五六十石租，高小毕业，叶子峯土匪的秘书，反革命。刘翰元（剑溪），二百多石，不中用。

篁乡区：李其琅（篁乡圩），三百石，赌博出身，儿子李含辉高小毕业，反动派重要分子。刘玉接（篁乡圩），二百多石。儿子刘金燕，南昌心远中学读书，又进了沪江大学、上海大学各读过一下，过去接近合作社派。刘玉麟，刘玉接的弟，四百石，是个哑巴，四五个儿子均小学毕业；小儿子读过中学，参加三二五暴动，现反革命。赖寿成（红头岭），四百石，儿子赖世芳梅县东山中学读过书，反革命。赖翫虚（红头岭），四百石，秀才，上海理化专修科毕业，做过县立高小校长一年、教员五六年，运动省议员失败。两个儿子中学读书，其中一个又在北京师范毕业，接近合作社派，三二五暴

动时新寻派向他进攻，现在两个均反革命。汪子渊（山子下），二百石，篁乡的反动首领，是个大劣绅，做过保卫团总，宾兴分局长。刘经曦（司城村），三百多石，梅县中学毕业，父亲在胡谦那里干事，被土匪打死了，不反动。刘荃兰（司城），二百石左右，高利贷起家，现在也不反动，儿子加入农协，因误会被农民乱枪打死。罗成添（溪尾），四百石，买半毫子黄烟都要同人讲价钱，是个守财奴，要钱不要命，他那村子整个的反革命。罗福寿（溪尾），前有三百石，分开了，反革命。罗佩慈（溪尾），二百石，做过于都县长，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三二五暴动前大家还在秘密准备，他看出来了，在农村中散布改良欺骗主张说：“家里的谷子要赶快平价，不要钱，发与本姓的贫民，不然不得了。”是个反动首领，豪绅中很厉害的。罗禄寿（溪尾），二百石，儿子是新寻派，喜出风头。古乐三（塘背），两兄弟合计三百石。他哥子是个秀才，做过两任省议员。他自己在胡谦那里做过军需，陈炯明时代做过五华县的一个区长，全县反动首领之一，带三四十支枪，跟谢嘉猷跑了。古光瑞（塘背），二百多石，高小毕业，反动。古化南（塘背），二百石，是个老实人。古光禄（塘背），四百石，守财奴，顶好便宜，买小菜都要讲价。他儿子在梅县东山中学毕业，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以上塘背各古，均古柏同屋人。）古有余（塘背），五百石，开纸行，又卖烟土，又开花会，纵赌。他是个守财奴，不问世事，专门要钱。因他是强房中的弱股，他的亲支大家欺负他，向他要五十就五十，要一百就一百。严锦绣（高头），过去唤万户，做屋做穷了，剩三四百石谷，开了间铺子在公平圩，子孙十几个，不问世事，发财为主，算得个“山老鼠”。严国兴（高头），百多石租的小地主，以做生意为主，公平圩开杂货店，同时贩纸，商家来往扯得通。贝岭、岩下

的商人借钱给他，连同他自己的钱，共用掉六七千元，运动省议员，失败，现负债。篁乡区的反动首领之一。严锡柏（高头），二百多石，开了间杂货店在公平圩，不甚反动。（以上兼说了几个小地主，因为他们是著名脚色。）

双桥区：黄庆云（黄田），二百石，不反动。罗守汉（黄沙），二百石，不反动。赵尚钦（腴田），三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反动。谢友丰（腴田），二百石，不反动。陈德全（留车），二百石，在留车开盐行，反动，二十一纵队把他枪毙了。陈镜日（留车），二百石，不反动。儿子陈继光参加三二五暴动，梅县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失败，跑往南洋。陈山牛（留车），赌博鬼，二百石谷，不反动。陈标记（留车族坑），过去是万户，分开三四家。陈标记死了，他的儿子“不子六”有三百石，在留车开水货店，反动首领。陈国才（留车族坑），二百石，梅县中学毕业，反动派。陈吐凤（留车族坑），二百多石，大劣绅，寻乌五虎将之一。“潘（明典）谢（虚左）陈（吐凤）彭（子经）邝（太澜），寻乌五虎将。”“新寻”“合作”两个新派起来后，老的五虎将就倒台了。陈及潘、彭、邝都是秀才，只谢是毕业生（寻乌简易师范）。廖洪贵（石碣），二百石，开个水货杂货糕饼店在枫山圩，不反动。刘俊福（坛坊），过去称万户，分开了，现有四百石。儿子刘鸿翔，赣南中学毕业，又在北京文化大学读过书，狗屁不通，却十分反动，双桥区反革命首领之一，现还在死守炮楼。刘石福，刘俊福的兄弟，二百多石，过去拿钱办过小学，现亦在炮楼中。刘元瑛（坛坊），二百多石，在炮楼中。刘作瑞（坛坊），四百石，三二十个人的大家庭，参加革命，把田分掉了。原因是早前和刘俊福争田买，又为了一个奸情案起衅，三二五暴动他家有人参加，失败，刘俊福诬告他，并勾结叶子峯土

匪把他家烧掉了。现在他侄子刘国香做区苏维埃委员，刘日升做乡苏维埃委员，他自己在家不问事。他是梅县第五中学毕业生，老实得很，二十三四岁，比他侄子还年小，官司是他侄子的父亲即他的哥子主持着打的。刘宝华（石贝），三百石，儿子在县中山中学毕业，参加革命，做共产党区委书记。刘开香（石贝），二百石，高小毕业，不反动。汤思贤（下磜），三百石，梅县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十分反动。汤立贤（下磜），二百石，黄埔生，做过靖卫队长，新寻派。汤佛淑（下磜），二百石，是个劣绅，人称土霸，小学教员讲习所毕业，新寻派走狗。曾超群（上磜），百多石^[1]，梅县中学毕业，不反动。曾锡麟（芳田），三百石，读老书的，放高利贷放得很厉害，他和他的侄子曾光华（小学毕业）反动到十二分，均在坛坊炮楼里被农民围困着。曾菊香（芳田），二百石，侄子曾产丰，高小毕业，是个共产党员，房子被叶子峯土匪烧掉了。曾海澜（伯公坽），过去是万户，最近分拆，他得二百石。参加三二五暴动，被曾锡麟告状用去千余元，叶匪又罚他，老弟被叶匪捉去罚款六百多元。现不反动。易颂周（桂石下），二百石，前清秀才，是个劣绅，与叶匪有勾结，现跑走了。何子文（丹溪），过去是万户，分开了，现在二百多石，反动不厉害。钟寡妇（丹溪），二百多石，反动派，跑了。赖荣俊（岑峰），二百多石，过去是小劣绅，现不反动。梅仁华（岑峰），二百石，不反动。梅调先（大田），秀才，三百石，反动派，逃走。赖文莲（大同），三百石，红军二十一纵队捉着罚了二千元，田分掉，现不反动。邝春龙（雁洋坪），二百石，高利贷起家，没收了，现不反动。邝世仰（雁洋坪），二百石，梅县师范毕

[1] 这里指分家后曾超群所有的田亩数。分家前曾家兄弟二人共有谷田200多石。

业，国民党员，死反动。邝应绍（黄羌坪），二百石，不反动。邝兰春（黄羌坪），二百石，不反动。陈陶香古（族坑），三百石，寡妇管事，赌博起家，反革命。

南八区：刘篁先（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枪决了。刘添运（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杀了他一个儿子，屈服了。刘焕通（龙图），三百石，被红军罚款千余串，现不反动。刘世滴（龙图），二百石，前清秀才，反动派，全家逃走。刘振广（河角圩），二百石，第三个儿子反动，跑了，其他不反动。刘梅荣（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曾月辉（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寡妇管事。曾路福星（河角圩），二百石，有余钱，勾结叶匪，全家反动，跑了。陈二赖禾（鸡子叫），二百石，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侄子被红军枪决，很反动。赵芷香（车头），二百石，老先生，过去有点子“劣”，不反动。赵赞杨二（车头），二百石，全家反动，跑到坛坊炮楼里去了。他是赌博鬼，祖父发的财。赵奐二（车头），二百石，老实，兼做生意，在车头开华兴店，今年第三次四县会攻时店被烧了，他的父亲被杀，不反动。赵应华（车头），二百石，过去是万户，分了一半给他四个儿子，余一半归他两公婆，“坐灶子”（把家分拆，自己留一份，叫“坐灶子”），不反动。他的余积是临时分给他子女比较多的儿子。温赞标（青龙），二百多石，高小毕业，不反动。钟文发（珠村），四百石，兼做盐米生意，祖父遗财，不反动。钟斑三（珠村），三百石，祖父遗业，他过去曾赌博，有时会做和事佬，不反动。钟继善（珠村），二百石，梅县中学读书，参加革命，在红军十一军五纵队工作。钟大面六（珠村圩），三百石，老税户，赌博，反动，全家走尽。钟咏柳（珠村圩），二百石，东洋留学生，做过武穴警察局长，在本县做过一等课员、承审员、实业局长，在谢杰部下

亦干过事，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逃到平远去了。彭子经（古坑岗），三百石，前清秀才，本县五虎将之一，清末做过湖南凤凰厅巡检，民国时代又在本县做过财政局事务员，收过赌款，最近在团防队做军需股，每次清乡都参加。一个儿子彭秉彝，梅县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做过知耻小学校长。全家反动极了。黎祖德（古坑岗），过去是万户，做生意，做蚀了本，剩下三百石，全家反动，走了。彭宏云（下廖），二百石，不大反动，开个杂货店在下廖村。彭宏权，彭宏云老弟，二百石，反动，跑往平远。彭锦汉（下廖），二百石，兼做生意，开药材和杂货铺，死爱钱，不反动。韩佛仙（满坑），二百石，兼做生意，又耕田，老实人，但亦逃到平远去了。钟奕材（林田坝），三百石，高小毕业，祖父手里是万户，两家人分，过去不赞成革命，逃走，现自愿罚款，要求回家。钟丁四（林田坝），二百石，祖父遗业，子弟也有耕田的，不反动，“怕共产”。钟树芬（林田坝），二百石，他自己死了，老婆当家，罚款二百元，不反动。谢瑞琳（牛斗光），三百石，医生，不承认罚款，逃走。谢肇凡（牛斗光），二百石，新寻派，赣南中学毕业，做过保卫团总，最近做过靖卫团总，南八区革命胜利后，在反动县政府当秘书，是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陈春荣（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儿子高小毕业，当白军连长，反动，全家走平远。陈六记（牛斗光），三百石，在留车和牛斗光各开一个油盐米豆行，勾结叶匪，很反动，全家走了。陈忠俊（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他的儿子过去做过保卫团总，不反动。谢佩钦（牛斗光之枫树岗），四百石，是个高利盘剥者，很多赌贩向他借钱，他的儿子在新寻学校读书，反动，逃走了。陈安如（廷岭），三百石，兼做猪牛贩，开火铺，罚了他的款，现在不见得反动。曾人升（莲坪），三百多石，自己会耕

田，赌博发财，不交罚款，逃走。钟星奎（珠村龙虎坑），二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做干事，南昌训政人员养成所毕业，新寻派的中坚分子，反动之极。

以上全县七区，共有中地主一百一十三个。

C. 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请一个工人，只有“万户”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单薄的方才请两个工人。为使工人不致“闲翻”（“翻”，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开做杂事外，便要他耕点田。

D. 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大中地主的生活，依寻乌状况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他们的生活比较奢华。他们看钱看得松，他们什么洋货也要买，衣服穿的是破胸装，头也要挥一个洋装。派遣子弟进学校也颇热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学等类学校毕业的。这种人在地主阶级中比较少，而且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澄江的王菊圆就是好例。第二种是半新不旧的。他们赞成一点“新”，但随即就批评“新”的坏处。他们也办学校，也做教育局长，但他们办的学校是专制腐败的。做教育局长是为了拿到一种权，可得到一些钱，而不是为了什

么“开通民智，振兴教育”。但历来的教育局长多半是他们做，第一种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们的生活介在节俭与奢华之间。他们人数在大中地主中占着大多数。守旧是地主的本性，这第二种人为什么也要半新不旧地随和时势一下子呢？完全为了争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城区的丘伟伍，兼三区的潘奕仁，澄江区的谢嘉猷，就是这个阶层的适例。第三种是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他们的住地是在与河流及市场隔离的山僻地方。他们始终希望恢复科举。他们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他们的生活很节制。他们至多挥个光头，有些仍是薙去额发一二寸。这种人在大中地主中依寻乌说是占着少数，双桥区（大田）的梅洪馨就是适例。大中地主阶级中新的占百分之十，半新的占百分之七十，全旧的占百分之二十。但所谓新的，是说他们走向资本主义化，不是说他们革命。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还有一种情况要说明的，就是大中地主阶级的新旧，不仅是以地域的原因（河流与山地，近市与远市）而形成，还有以年龄的原因而形成的。一家之中，老年人多半守旧，少年人多半维新，中年人就多半半新不旧。这种年龄的原因即是时代的原因。老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最深，同时他已行将就木，也无能力讲新，所以只得守旧。少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浅，同时不维新没有出路，所以他们比较不顽固些。中年人则介在二者之间。举一个例，大地主“屎缸伯公”是很顽固的。他的儿子便主张办学堂，但办出来的学堂却是半新不旧。他的孙子则往广州，往上

海，往北京，往英国，有六七个出外读书，研究所谓“新学”的。不过无论怎样研究新学，依然是彻底的反革命。“屎缸伯公”的孙子潘作琴在英国医科毕业回来，现在汕头行医，称汕头西医第二个好手，每天收入四五十元，每月能收千多元。他初回国时，寻乌教会医院出千二百元一年请他，不肯就，因为他在汕头的收入更要大。

E. 小地主

小地主（二百石租不满的）数目更多，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府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1]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但是小地主在地主阶级中是占着绝对大多数，而且显出下面的特点，即：（一）做小生意的多。他们开小杂货店，收买廉价农产品候价贵时卖出去，大概百个小地主中有十个是兼做这种小买卖的。中地主虽也有做生意的，而且他们一做生意就比小地主做得大，但他们做生意的成分比较很少，即中地主多半还在一种封建经济的领域中过生活，不如小地主商业化得厉害。（二）特别表现小地主商业化的，还有他们派遣子弟进学堂一事。小地主子弟进初等小学是全部，进高等小学也几乎是全部，至少十家有八家，进中学的亦十家有三家。这个阶级接受新文化的形势是比哪一个阶级要快要普及。他们在全般政治生活中是受中地主阶级统治的，即是说他们是沒有权的。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却表现很迫切，革

[1] 蒸尝费用，即祭祀费用。

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寻乌的合作社派（即中山中学派）的运动，就是代表这个阶级的运动，而和他们对抗的新寻派（即青年革命同志会派）的运动，却是代表中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运动。为什么小地主阶级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即民权主义的革命文化如此之迅速普遍，他们的革命要求与活动如此迫切与猛进呢？则完全是因为他们这阶级的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破产得非常厉害的原故。由这两个阶层（小地主与大中地主）的斗争，引导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即代表中等地主而多少带了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寻派，日益与大地主妥协结成反革命战线，而代表小地主带着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合作社派，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形成近来的土地革命斗争。

上面所说的小地主，不是说小地主的全部，只是说他们的一部分。普通所讲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百分之三十二。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一是一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百分之零点九六，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刘鸿翔、赖世芳、刘瑞标就属于这个阶层。他们都是合作社社员，三二五暴动中以及失败后，就陆续表现反革命了。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寻乌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阶层。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

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璆(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点六四，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以上说所谓老税户破落下来的小地主，它的第二、第三部分一般说都是参加革命的。以合作社社员来说，有三十个中学生，一百个高小学生或小学教员，都是过去或现在参加革命的，都属于这两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阶层，尤以第二部分为特别多。

普通所讲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这个阶层是在一种“方新之气”的活动中。他们的经济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种(雇长工帮助的很少，雇零工帮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窎远的瘦瘠的土地租与别人种而自己收取租谷。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粮食年有剩余，并且有许多不是把谷子出卖，而是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甚至去平远的八尺等处发卖，以期多赚几个铜钱。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放谷子出去，压迫贫民“上档量本，下档量利”(上档下档即夏收冬收)。他们又放“捡谷钱”和“捡油钱”。什么叫做捡谷钱？趁着青黄不接时候，以钱捡与农民，到了收获时候以谷还与债主，大概捡给两块钱，就要在收获时还一担谷，而那时谷价常常值得四块钱一担了，这是一种对倍利。捡油钱也是一样，多属对倍利。所有放高利贷，

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大地主、中地主放债也是放的加三利，加五利非常之少，捡谷钱、捡油钱可说没有。还有更凶的“月月加一”利，即见月还利百分之十，一年便对倍有过。这种借贷都要抵押品，并且要借一种“会”做面子，如“订同会”。还有“印子会”，是月月加一，利上起利，比订同会更厉害。这些都是大中地主所少做的。前清时候放恶利的比较少，民国以来放恶利的渐渐增多。“现在人心更贪了”，就是贫民对于高利贷者含有历史意义的评语。“今个人，人心较贪了咧”这个话，在寻乌贫民群众中到处都听见。这班新发户子看钱既看得大，更不肯花费钱米抛弃劳动送他们子弟去进学堂。所以他们中间很少有中学生，高小学生虽有一些，但比破落户阶层却少很多。至于破落户阶层为什么进学堂的多，就是因为他们看钱看得破些（因不是他经手赚来的），而且除了靠读书操本事一条路外，更没有别的路子可以振起家业，所以毕业生就多从这个阶层中涌了出来。上面所说那种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在有些人的说法却不叫小地主，而叫它作富农，即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五 富农

另有一种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普通说法叫他们作自耕农或中农的，实际仍是一种富农。前边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则不叫作富农而叫他们作小地主。贫农群众便是作这样看法的。这种所谓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理由是他们没有半地主性，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自劳动不是剥削他人来

的。其实在贫农眼中，他们仍是一种特殊阶级。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因为他们有钱余剩，他们有多余的土地。他们在自己农产品上面加工，如使谷子变成米子，自己挑了出卖。他们还做些小的囤买囤卖生意。他们供着猪子、猪条子或大肉猪。以上这些都是与半地主性的富农一致，而与自足的中农不相同的。因此，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

六 贫农

——贫农中的四个阶层——

什么叫做贫农？我们简单回答道：不够食的叫做贫农（不够食的原因是受剥削，那不待说）。但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若从贫农里头再加剖解，便知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他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阶层。第一个是半自耕农。他们是不够食的，因为他们的土地不够使用。他们须从地主那里租来一部分土地，完了租去，自己又不够食了。但他们在贫农群众中则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不但有牛，有犁耙，多少有些活动本钱，而且有一个表现他们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自己有一部分土地。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十点五，在贫农全数中则占百分之十五。第二个是佃农

中之较好的。他们有牛，有犁耙，也多少有些活动本钱，但没有一点土地。他们的特点在于有牛，大多数有一条牛，极少数也有两条、三条牛的。他们比半自耕农穷，即比半自耕农更不够食，但比别部分贫农却要好些。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占贫农人口百分之六十，是农村中一个最大的群众。第三个是佃农中之更穷困的。他们同样无土地，他们虽有犁耙，但多窳败，虽也有几个本钱，但是很少。他们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是每家有牛的，他们是几家共一条牛，或有一条牛，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地主为了节省饲养费交给他饲养的，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一下子这条牛的劳力，寻乌所谓“只能定得一爪子”的就是指这种牛。这一个阶层之不够食的程度比上举两个阶层都厉害。他们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十点五，占贫农全人口百分之十五，是一个与半自耕农相等数量的群众。第四个是佃农中之最穷的。他们除没有土地之外，还没有一点本钱，借米借盐是常事。他们又没有一点牛力，农忙时节，候别人把田耕过了，然后同别人（那些亲戚家族们）借了牛来，或租了牛来，耕那数亩用重租租来的瘦田。他们虽然有犁，但没有耙，因为打一架铁耙要好些钱，他们力量不足办此。这一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七，占贫农全人口百分之十，是一个并不很小的群众。他们衫很烂，要讨来着。三餐饭两餐食杂粮（粟板呀，番薯片呀）。做米果卖，砍柴火卖，挑脚，就是他们添补生活的办法。

七 山林制度

寻乌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脚的氏族手里，后到的氏族便没有山或少有山。因为先到的占领，所以也有小姓先占了山，大姓后到仍没有山。田与山的情形不同，田地转移很快，小地主和农民的田

地，用典当的方法一年转移两次的都有，一年转移一次的就更多了。至于卖绝，也是常有的。山地则因其生产力小，通常一姓的山（一姓住在一村），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所谓“公禁”者，不但禁止买卖，而且绝对地禁止自由采伐。除非死了人，“倒条把子树，搭墓棚”，才得许可。为公共利益使用，如作陂，开圳，修桥梁，那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只有定期开山，落墓三年两开，树木两年一开。由“禁长”召集本村同姓人等到场议定开山日期。到期，每家出一工，到山采伐，所得落墓或树卡（开树木山又叫落卡，即砍树枝）共同分配。也有按山林生产情况分成若干小块，召集公众到场拈阄，然后按所分地段各自去采的。以上是家族主义的山林“共产”制度。还有地方主义的山林“共产”制度。多半以村为单位，由村内各姓人等公举禁长。严禁私采，定期开山等等，都与家族“共产”的山林一样。禁长三个起码，多的到十多个，依村落大小山林广狭而定，以五六个为最普通。禁长均由选举，任期不定，有一年换两回的，有四五年不换的，全看他尽职不尽职。凡做禁长的都要铁面无私，公公道道。“不管你天皇老爷的奶子，捉到了你偷树子，偷落墓，均要罚的。”南八区龙图乡有个禁长，捉到了一个偷树子的女子，那个女子对他说：“我倒条子树子搭下子亭子，不要罚我，我同你龙图人都是亲亲戚戚，为什么你就这样没有情呢？”那个禁长回答她道：“不要说你这个卖板子（米果）的昭凤妈，今天就是我的舅婆也要罚，要晓得我刘世烈狂是铁面无私的。”若是禁长不能维持，大家又乱砍乱伐不顾公益的时候，就要“暖禁”（唤起大家注意，恢复从前规矩，叫做“暖禁”。疏忽神明，重新致敬，叫做“暖神”或曰“暖福”）。禁长们每年召开禁山会议一次，一切关于禁山的规矩都是由这种会定出

来的。禁山会临时召集的多，也有“有底子”的。开禁山会的那天，不但禁长们到，而且那个范围内每家都到一人，每人自带酒饭，另外出一毛子或半毛子买菜，并买敬“伯公”（“伯公”就是杨大伯公，什么地方都有，每个树头下，田塅下，山埂上，什么地方都有他）的香纸。以上两种这是说的“共产主义”的公山。还有“资本主义”的私山，乃是香菇山、茶子山、茶叶山、竹山、杉山等，生产品能变卖，出息较大的。这些山原来也都是公山，渐次落在有钱人手里，大概是大地主占一半，小地主（新发户子）及富农占一半。因为开这种山不是有资本的不能开，特别是开香菇山、茶叶山，要大地主，其余则多是资本主义化的小地主及富农。寻乌的山地约作如下的分配：一姓公山占百分之十五，一乡公山占百分之五，私山占百分之十，离人家远开发不到任其荒废的所谓“荒山”，则占了百分之七十。成为荒山的原因，有些是人少山多用不着它，有些则是姓界限制，虽有他姓欲利用的，亦被山主拒绝，只好让其荒废。这种被姓界限制欲开发而无从的情形，到处都有。土地革命之后，这种姓界便消灭了。

八 剥削状况

A. 地租剥削

1. 见面分割制

见面分割与量租，两种同是寻乌县的收租制度。见面分割是禾熟时地主与农民同往禾田，农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对分，双方各半，地主部分要农民送到他家里。有些地方分割之先，由地主先取一担，这一担不在对分数内，这种多半是肥田。地主的理由是：此

田我买来时多费了田价，你佃户耕了省了粪草，若不先取一担，你占便宜太多。但这种办法是很少的，百家之中不过一家。另有一种，是农民先取出些谷子，叫做“撮谷种”，数量是在全数租谷中撮出一撮箕。理由是：秧子打在别人田内，不在你这个地主的田内，打了秧子的那块田，早子^[1]没有收，别家地主要受损失，为了补偿佃户亦即补偿别家地主的损失，所以要先撮出一撮箕。当地主自己或派人到场监视分割时，要吃有猪肉有鱼（有些还有鸭子）的午餐。午餐过了，禾分割好了，农民挑了租谷伴同地主或其雇工送去过地主家中时，还要加上两个鸡蛋，放在谷子上面一同挑了去，每天都是如此。农民和地主感情好的，送上七八个蛋的也有。

2. 量租制

量租制是“早六番四”。平远是对分。为什么要“早六番四”呢？因为早子价较贵，收获量也更多，交租六成才不便宜了佃农；番子^[2]价较贱，收获也较少，故交四成。表面上看，早六番四两档扯平，还是五成，实则不然。地主常得五成六，农民只得四成四。因为早子收获量虽多，每十担中地主现已得去六担，农民只剩了四担了。番子则收获量每十担中往往要比早子少二担，只有八担，交去四担租，自己只得四担，合起早子的四担共得八担。地主却共得十担。成为四点四成与五点六成之比。

大暑（旧历六月）割禾，立秋（旧历七月）量租，地主通知农民把租送来。不见送来时，地主自己打个洋遮子，亲自跑到农民家里去催。再不送来，就派工去取。取又取不着，就调了他的田。有些恶地主呢，就告农民的状，捉了农民去坐班房，不过这种恶地主

[1] 早子，指一年两季稻的早稻。

[2] 番子，指一年两季稻的晚稻。

不多就是。原来见面分割占全县百分之四十，量租占百分之六十。近来见面分割的加多，量租的减少，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为什么见面分割的加多起来呢？因为佃户穷的日多，常常一割下禾就没有谷子，地主怕农民收后不量，所以见面分割加多起来。同时农民为怕调田与吃官司，也宁愿见面分割。

3. “禾头根下毛饭吃”

“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说的是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这种情形寻乌简直占百分之四十。为什么禾头根下毛饭吃呢？譬如耕了二十担谷田的，量去了十一担多租，剩下八担多。去年过年和今年青黄不接毛饭吃时借过地主谷子两三担，加上加五利，又要还去三担多至四担多。打禾了，要买好东西招扶地主。禾打过了，买上一点油盐，春上一点米子，立秋刚到，一切都完。这就叫做“禾头根下毛饭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阿嘴”。南半县土地斗争中，农民、小孩子普遍地唱了一只歌，那歌唱道：

月光光，
光灼灼。
唉跌苦，
你快乐。
食也毛好食，
着也毛好着。
年年项起做，
总住烂屋壳。
暗婧女子毛钱讨，
害埃穷人样得老。
暗好学堂埃毛份，

有眼当个瞎眼棍。

天呀天，

越思越想越可怜。

事业毛钱做，

年年总耕田。

六月割也就，

田东做贼头。

袋子一大捆，

擎把过街溜。

吗个都唔问，

问谷曾晒就？

穷人一话毛，

放出下马头。

句句讲恶话，

俨然税户头。

唔奈何，

量了一箩又一箩，

量了田租量利谷，

一年耕到又阿嗬！

又阿嗬，

会伤心，

穷兄穷弟爱同心，

穷姊穷妹爱团结，

团结起来当红军，

当到红军杀敌人！

注^[1]：“埃”，我。“毛”，没有。“项起做”，继续做。“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样得老”，怎样得老。“暗好学堂”，再好学堂。“割也就”，刚割完。“做贼头”，很恶之意，如贼头一样恶。“袋子一大捆”，用去收租的。“过街溜”，洋伞。“吗个都唔问”，什么都不问。“放出下马头”，打官腔。“税户头”，大地主。“阿嗬”，没有了之意。“爱同心”，要同心。

4. 批田

寻乌地主把田批与农民通通要写“赁字”，没有不写的。五年一小批，七年一大批，是全县普通的赁期。这是东佃间的“规矩”，也就是不成文的法律。只有那种恶地主才敢借故破坏这种法律，三四年或七八年调换佃户。赁字上面写明的是：（一）田眼，写明田的所在及界址。（二）租额，写明见面分割制还是量租制。（三）租的质量，写明要“过风精燥”，不得少欠升斗，如违转批别人。（四）田信，写明每年或每两年交一只鸡公。这种赁字，哪怕少到三担谷田都要写一张。因为若不写赁字，一则怕农民不照额交租，打起官司来无凭据，二则怕年深日久农民吞没地主的田地。赁字只农民写交地主，地主不写交农民。

下面是赁字的一个例：

“立赁耕字人邝世明，今来赁到凌贱贵兄手内禾田一处，土名铁寮坝，禾田一大丘，计租六桶。当日三面言定，每年合纳租谷六桶，限至秋冬二次，早六番四，送至家中，过风精燥，交量明白，不得缺少。如有缺少，任田主另批别佃，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赁字为照。

[1] 这个注是毛泽东加的。

每年信鸡一只。

见人 罗长盛

代笔 谢雨霖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立赁耕字人 邝世明”

5. 批头、田信、田东饭

批头分“批头钱”“批头鸡公”二者。批头钱，每石租普通单批（五年一批叫单批）一毛，双批（十年一批叫双批）二毛，也有三毛的如篁乡等处，均批田时交清。批头鸡公不论批田多少总是一只，也是批田时交。单批转到双批，即五年转到十年，批头钱、批头鸡公一样照交。南半县双批多，如篁乡、双桥两区完全没有单批，就是一份田耕几十年的现在也还有，只很少。地主将田批出去后不久卖了与别人时，退还批头钱一部分与农民。北半县单批多，地主卖田时不退批头钱。

田信鸡每年一只，赁字上写明是“鸡公”，因为鸡公（阉鸡）比鸡婆较大，但农民还是送鸡婆的多。赁字上虽说了每年一只，但农民往往两年才送一只。送的时候在冬收后或过年时节。不见送来时，地主常常自己去催。“田信鸡公送了来啊！”“唔曾畜到。先生！等我后圩买到来。”或者说：“毛啊，先生！今年子总要免下子。”

双桥区有田东饭，每年请地主吃一次。别区很少。

6. 谷纳、钱纳

送租，全县说来百分之八十送谷子，百分之二十折钱。公堂、神会、庙宇、桥会的租，约有一半是交钱的，因为公堂、神会等佃农亦多半有份，因此佃农常常要照当时市价折钱送去，而把谷子留下备自己食用。这种人多半是兼做小生意的或有猪鸡出卖的，才能得到钱。那些豪绅把持的公堂、神会，为了有利他们的侵蚀（候谷

价高时钱卖得多)，便强迫农民交谷上仓，农民亦无可奈何。同一理由，地主田租总是交谷而不准农民交钱，只有离田庄很远的地主才有准许折钱的。

7. 铁租、非铁租

非铁租占全县百分之八十，水旱天灾，面议减少，但每石租只减少一斗到二斗。遇大灾害收成大减时，请了地主来看过了，有谷（“有”，当地音胖，有谷，无米之谷）也要分一点去。铁租是在赁字上载明“半荒无减”，在全县占百分之二十。但实际上农民实行得少，仍然是请了地主看过，精有照分（精谷就是好谷）。

8. “要衫裤着去捞”

许多的农民把租交过，把债还清，就没有饭吃了。地主们收了那些租不肯出卖。过年了，农民急于得点谷子，地主把谷放出一部分，但不是卖而是借。因为借谷的利息是半年加五（早前的利率是“钱加三谷加四”，近来谷息加四的少了，大多数都是加五），比卖的味道更多。地主卖谷是要到四五月间青黄不接时候，那时价钱抬得更高，但他还要三歪四摆。

农民走到地主家里向地主道：“先生，食了朝？”

地主：“唔，系哟！”

农民然后慢慢地话到余谷：“您的谷，埃来余两斗子。”

地主：“毛……啊！自己都唔够食。”

农民：“好哩哪！您都毛谷，河坝里水都毛流！搭帮下子，让斗子给埃，等稳就要做到来食啊^[1]！”

地主：“好，你十分话紧了，埃的口食谷都让点子把你，你肯不

[1] “等稳就要做到来食啊”，意思是等米下锅。

肯出这多价钱呢?”

农民：“先生，莫这样贵，算减点子给埃！”

价钱如了地主的意了，然后把谷子粜与农民。

有个传遍全县的故事：篁乡地主刘福郎，是个著名刻薄的人，青黄不接时候，他把有谷掺进精谷里发粜。有一天，有个农民到他家里籴谷子，他叫他的媳妇和女儿道：“要衫裤子着就要去捞！”农民们把他这句话传了出去，就成了全县闻名的大笑话。为什么这句话会成笑话呢？因为寻乌习惯，女子偷人叫“捞”，把有谷掺进精谷去也叫做“捞”。他当着农民不好明说把有谷掺进精谷，一个不留心，对他的媳妇和女儿说出那句好笑的话来，就成了流传至今的典故。

9. 劳役

劳役制度全县都没有了。地主有紧急事如婚丧等类，也常常求佃户替他做事。地主带耕一点田地，农忙时候，也常常求佃户替他做工。但通通是出工钱的。

10. 土地买卖

据知事公署粮柜上当雇员的刘亮凡说，民国十四年全县把田出售的有六百家（买田的不足六百家，因为有一家买几契田的），以全县三万家计（十二万人，每四人为一家），每五十家中有一家破产。至于典当，更多于卖绝，每百家有五家把田典出（典进的每百家有二家，因一家有典进几契田的）。即是寻乌近年每年有百分之二的人家破产，有百分之五的人家半破产。

田价：坑田每石租十七元到二十元，塅田每石租三十元到四十元。普通坑田二十元，塅田三十元。典当坑田每石租典价普通十五元，塅田普通二十元到二十五元。

典当分为“过手”“不过手”。过手，是田主收了典主的典价之后，把田交了给典主，典主收了田或自己耕或佃给别人耕，都由他作主，田主不能过问。过手之后，典主也没有租送给田主了，田主除了保留收回权之外，简直和卖绝一样，因为主权的大半已在典主手里了。不过手，由典主将典价交与田主，而田仍由田主耕种，每年量租给典主，租率是照普通田租一样，每一石谷田交一石谷租（两档共）。譬如塅田典价每石租二十元，田主得了二十元，交出一石租，每石谷价普通四元，利率是年二分。为什么典田利率低于社会借钱利率呢（普通借钱年利三分起码）？因为一般富农（新发户子们）的心理，高利放债不如低利典田靠得住，“把钱放到泥里头”是很稳当的。富农们为什么不买田而去典田呢？因为农民和地主的破产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先典后买”，成了普遍现象。但“田就姓大，一典就卖”，也是普遍现象，故买田与典田仅仅相差一间。过手不过手二者，过手的占百分之九十，不过手的占百分之十。不过手的多半是包租（铁租），但也有法律上过手，而由原主向典主书立赁字成为东佃关系仍耕着这份田地的。这是于债主（典主）债户（田主）关系之外，再加一层东佃关系。

不过手典当的田，有些是偷典的。就是那些“嫖赌食着”的少爷们，当他们赌输了或者没有嫖钱了，欠了暗帐，不得开交的时候，便瞒了他的父亲把田秘密典给那些强房大姓的富农或地主之手，等到他的父亲死了，然后把田过手。为什么要典给强房大姓呢？因为只有强房大姓才不怕事，秘密发觉了，他就公开起来，也不怕他的父亲不依。

典田不过手，也是典主对田主的一种重利盘剥的机会。因为田主每年交租交不清时，典主就对那未清部分行起息来，年年加多，

最后非把这份田完全卖给典主不可。这种欠租利息是三分以上的高利贷，而不是二分的典价利息。

B. 高利剥削

1. 钱利

钱利三分起码，也是普通利，占百分之七十，加四利占百分之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二十。通通要抵押，有田地的拿田地抵押，无田地的拿房屋、拿牛猪、拿木梓抵押，都要在“借字”上写明。大地主、中地主、公堂、新发户子（发财的小地主及富农）都有钱借。其中以借额论，中地主占百分之五十，新发户子占百分之三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二十。以起数论，新发户子最多，占百分之七十五，中地主占百分之二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五。以借债人论，加五利（年利五分，每百元利五十元）、加一利（月利一分，每百元年利百二十元）差不多通通是贫农借的。加三利（月利三厘，每百元年利三十六元）也有，但极少。以贫农借额作一百，加三利占百分之二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七十，加一利占百分之十。贫农的借主多半是新发户子，三元五元，十元八元，零零碎碎，利上起利。抵押品贫农无田可指，多半指房子，指牛猪。借主时时想吞并贫农的房屋牛猪，或他很小的一块田，或一个园子，察到贫农要钱用，就借给他，还不起，就没收抵押品。也有中等地主借这种吞蚀贫农的小份子债的，古柏的祖父古有尧就是一个例。他曾经用这种借贷法吞并贫农三个菜园子、两个房子。今天借一元，明天借两元，逐渐成一大注，便有资格吞并一个菜园子了。他常常处心积虑，用这种乘人之危、零碎借债的方法去谋人的财产。他于地方的事、公堂的事一切不管，因为这些事颇妨碍于他个人的发财。他算得个典型的重利盘剥者。

加三利，多半是富农向富农借的，借债的用途是做米贩、做猪贩或者往市上开家小商店。为什么富农向富农借得到加三利，贫农只借得到加五、加一利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趸”。普通总是二百元、三百元一借，还了来，作得用，不像贫农之三元五元一借，零碎得很，还了来，也不能作个什么用。二是靠得住。富农有田契作抵押，他的经营又是生利的、有希望的，不像贫农之财产很少，借钱多半是为消费或转还别人债务，很不可靠。

中等地主的钱多半是借给那些小地主中之破落户及正在走向破产路上的农民，他的目的也是在于吞并土地。

大地主及公堂的钱很少借给人家的，因为大地主的目的在享乐而不在增殖资本，做八十酒呀，起大房子呀，留了钱做这些用，送子弟读书也要用钱（这不是他的重要目的）。一小部分商业化的大地主，拿了钱去做生意。因此，也就无钱借与别人。那些有多钱余剩的，没有工商业可以大注地投资，零零碎碎借给小地主及农民，既借不得几多，又不甚可靠，他就宁可挖窖埋藏，不贪这点利息。加以军阀捐派频繁，看见多钱出借之家，就这也要捐，那也要派，闹得不得不下地。陈炯明部下林虎、刘志陆^[1]，在篁乡向大中地主、公堂、神会派了万多元，派过两三次，因此更发使他们把钱藏起来。

2. 谷利

谷利比钱利重得多，乃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十二月、三月两个期间借的最多。贫农为了过年，故十二月要借谷；为了莳田，故三月要借谷。不论十二月借，三月借，均六月早子收割时候要还他，利息均是加五，即借一石还一石

[1] 刘志陆（1890—1941），广东人，曾任广东潮梅镇守使、粤军第二军军长等职。

半（三箩）。这种六个月乃至三个月算去百分之五十的利息的制度，乃是高利贷中很厉害的。

贫农六月收下早子，还去租谷和借谷，吃到八月就没有谷子了，又要跟地主富农借谷。八月借谷一石，十月打番子时候还他，加二利，要还一石二斗。若贫农十月还不起，只得同债主说：“埃今年毛有还了，明年早子收了再还。”债主就说：“也可以的，本利加算起来才行。借给你的那一石本，算加五利是五斗，那利息二斗利上起利也要加五，就是一斗，你明年六月总共还我一石八斗。”（本一石，加利二斗，又加利五斗，又加利一斗，共一石八斗。）那末从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一个对年，共是加八利。假若他明年六月又还不起，那末从一石八斗再行加五起算。假如那个农民到了那年番子时又还不起，转到次年六月，再转到次年八月，如此转下去，一年转两回，转到十年就成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

3. 油利

油利是所有借贷关系中的最恶劣者。所谓“对加油”，寻乌南半县有茶子山的地方都有的，北半县没有茶子山，所以没有对加油。什么叫做对加油呢？借一斤，还两斤，借两斤，还四斤，借四斤，还八斤，这样叫做对加油。什么期限呢？九月打油时候为标准，九月以前一年之内不论什么时候借的，一概对加利。

油山^[1]是地主或富农的，租给贫农耕种，地主富农收油租，二十斤油收十斤，六十斤油收三十斤，计收百分之五十。地主富农收了这些油租，大概百分之九十是挑赴市场发卖，百分之十是用对加利借给贫农。但他借时，往往说这油是他儿子或他媳妇的私家油。有些呢，也确是他儿子、媳妇的私家油，富农家里的媳妇们和他还

[1] 油山，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没有当家的儿子们常常有私油。它的来历是，当摘茶子的时候将过了，茶子树下的零茶子遗落没有拾的，他们就拾起，打出油来作为他们的私财，他们就有资格放高利贷。

“先生，借点钱给埃！”

“毛！”

“借点谷给埃！”

“毛！”

“毛有吃了，总要借点子！”

“油就有，埃奶子的。”

贫农目的不是借油，因为油利太贵了，但因为地主富农钱谷都不肯借，迫着只得借油，借了油去变卖成钱，再籴谷子吃饭。

也有借油吃的。贫农们打禾子，没有油吃，提个壺子跑到地主富农家里借一壺油，六月借油九月还，一壺还了两壺去。贫农家里没有秤，有些贫农的老婆、媳妇也不识秤，借一壺还两壺，她们是容易记得的。

4. 卖奶子

上面第二节里所说十年拖欠的话是假设的，事实上债主很少准许农民一笔账拖到十年之久。他总是压迫农民很快还清，还清一次，再借二次，因为他怕农民欠久了靠不住。通常情形是准许农民还本欠息，息上加息，推算下去，也只三年五年打止，不准太欠久了。债主怎样强迫农民还债呢？打禾了，债主挑了箩子走到农民的稻田里去，对农民说：“你的谷子还了我来！”农民无法，望着债主挑了谷去。既交了租，又还了债，“禾头根下毛饭吃”，就是指的这种情形。许多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扯着袖子揩眼泪呢！

“嫁姑娘卖奶子，都要还埃。”这是寻乌的习惯话。债主们对那

种“可恶的顽皮农民”逼债，逼到九曲三河气愤不过的时候，往往是这样说的。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刘亮凡是城区富福山人，富福山离城十八里，那村子里共有三十七家人，分为刘、曹、陈、林、黄五姓，共有五家卖奶子（客籍叫儿子曰奶子）的，内三家都姓刘，是刘亮凡（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的亲房，名字叫做刘昌育、刘昌伦、刘昌纯，其他两家，一家叫林芳廷，一家叫陈良有。刘昌育（刘亮凡的胞叔）是小木工人，余四个都是佃农。刘昌育有四个奶子卖去三个，刘昌伦三个奶子卖去一个，刘昌纯两个奶子卖去一个，林芳廷三个奶子卖去两个，陈良有一个奶子卖去一半。五家都是因为破产到完全没有了，没法子，把奶子变卖得些钱，一面还清债主的账，一面自己吃饭。买主都是附近村庄里的本姓绅士和富农，绅士更多，富农次之。卖价每个百元（起码）到两百元（最多）。卖时两家在名义上不说“卖”而说“过继”，但社会上一般都说“卖奶子”。要写张“过继帖”，普通也叫作“身契”。过继帖上面写道：

“立过继帖人某某，今因家贫无奈，告借无门，人口嗷嗷，无力养育，情愿商请房族戚友将所生第几男过继于某宗兄为男，当得身价洋若干元。自过继之后，任凭养父教读婚配，倘有打骂等情，生父不得干涉。两方甘愿，并无勒迫，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此过继帖一纸为据。

媒人某押
 某押
 某押
 房族某押
 某押
 某押
 戚友某押
 某押
 某押
 父某押
 母某押
 兄某押
 弟某押
 某某代笔
 某年某月某日立”

这种卖身契只有卖主写给买主，买主不写文件给卖主。所谓媒人即是中人，多的有四五个，都要“水扣钱”，抽卖价的百分之五。房族戚友临场有多到十几个的，都要“画押钱”，归买主出。亲房及强梁的（多半是绅士）画押钱要多，有十多元到二十元的，普通房族戚友画押钱每人一元以内。奶子的年龄有三四岁的，有七八岁的，有十三四岁的。买卖奶子，由媒人背了送到买主家。这时候奶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甚至两夫妻打起架来，妻骂夫没有用，寻不到饭吃要卖奶子，旁人也多有替他们流泪的。刘昌育卖奶子，他的侄儿刘亮凡就是一个看不过意流了泪的。现在讲到调查会的第二个农友李大顺，看他供给的材料又是怎样？他是双桥区的黄沙村

人，他那个村是个有人家四百户左右的大村，内中卖奶子而被他亲眼看见的有五家，每家卖出一个奶子。有一家是卖往广东平远县的八尺地方，李大顺在路上撞到这个背着小奶子的父亲往平远方向一路哭了去，这人撞到熟人脸上不好意思到十分。他为什么要把奶子卖往广东八尺呢？因为卖的价钱更高，一个奶子卖得二百多到三百元。不论卖到什么地方，四五岁的幼年奶子卖的价钱更高，因为容易“养得疼”（带得亲）。年龄大了，像八九岁的、十多岁的，反倒卖不起价钱，因为不容易带得亲，并且容易跑掉。至于到调查会的第三个农友梅治平，他是双桥区蓝田村的农民，他村里也有卖奶子的事。他的叔父梅宏波穷得不得了，三个奶子一个过番（往南洋）去了，一个在家，一个卖往平远。附近暗径村，贫农梅传华七个奶子，卖出五个。那天调查会到的就是刘、李、梅三位，他们自己村子里出卖儿子的事，就有上述那么多起。三人中一个是北半县人（刘），两个是南半县人，那末全县的情形也不难推知了。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刘亮凡说，他曾见过和听过卖儿子的事，在他家乡的附近共有上百的数目。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

听见人家卖了儿子了，债主就急急地到他家里去讨账。“卖了奶子还不还埃（我）吗！”债主很恶声地叫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5. 打会

打会的目的是互相扶助，不是剥削。如为了娶媳妇，做生意，

死了人要埋葬，还账等等，就邀集亲戚朋友打个会。但月子会、隔年会、四季会，因为标利很重，结果变成剥削农民。

打会的人（会头）不是全无资产的人，多半是中农阶级及小商人中间打会的多。富农不消打会，极贫的贫农想邀个会也邀不到，只有半自耕农，佃农中之有牛力、农具者，自耕农，市镇上较活动没有破产危险的小商人，他们邀会才有人来。

会有长年会、半年会、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五种。

长年会是六个人，六年完满。除头会外，每人出洋十元，共五十元，交与头会。头会“没本盖利”，三年加三（每年盖利十五元，共四十五元），两年加二半（每年盖利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计六年头会要盖利八十元，本则“没收”去了。二会以后没本盖利制度与头会同，惟利息逐年减轻。如二会是二年加三（每年十五元，共三十元），二年加二半（每年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盖利息六十五元。三会以后盖利更少。“头会卖脸皮，二会捡便宜”，说的是头会虽得经济利益，但须低头求人才打成会，二会既不求人又得利益。

半年会采取标息制度，每半年标一次，人数八个起码，九个、十个、十一个以至二十多个都有。半年会不是没本盖利，而是每半年一了。（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缺。）

C. 税捐剥削

1. 钱粮

(1) 地丁 全县一千四百二十四两，每两还正税大洋三元，附税二角四分。它原本不是钱而是米，每石谷田完地丁米八勺（每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每升地丁米折成忙银六分四厘二，再照每两忙银折成大洋三元二角四分，约计每石谷田完大洋二分。相传从

前安远典史杨霄远跑到北京皇帝老子那里，头上顶个盘子，盘子里面覆着许多酒杯子，表示安远、寻乌两县山多田少，手里拿着一篇奏文，上面写着“万顷山冈一线田”等等话头，请求减轻田赋，弄得那个皇帝大发脾气，说你那么个小官敢到我的面前上奏，我可不依，喝声推出斩首。然后拿了奏文一看，看到“万顷山冈一线田”的地方，却说“话还说得有理”，就批准他的奏文。因此安、寻两县田赋较之他处为轻。至今两县地主富农当每年完粮时候，还要拿些香烛到杨霄远庙里祭他一番。两个县城都有杨公庙。

(2) 官租 篁乡全区，三标区一部分，城区也有一点，名曰“官田”。政府收官租不收地丁，共计九百四十多两，较之地丁贵得八九倍，大概每石谷田要完小洋二毛。为什么有这种官田呢？明朝篁乡出了个“霸王”，名叫叶楷，盘据篁乡多年，与明朝皇帝作对，皇帝用计把他剿平，把所有篁乡全区叶楷管辖地方的田地充公，名曰官田，禁止买卖，只能用佃户与佃户之间转移田地的名义，叫做“顶退”。三标官田的来历与篁乡相同，那里曾为叶楷部属占据过。城区的一点小的官田，则因那里的人曾经犯了皇帝老子的法，因此没收了他的田来。

(3) 合计 地丁、官租二项，合计银二千三百六十余两，每两折三元二角四分大洋，也不过七千六百四十余元。由于沙冲水破，逃亡孤绝，贫苦拖欠几种原因，每年有两成收不到手，实际只能收六千一百十二元左右。

(4) 苦甚 上述田赋数量，每年不过六千一百余元，而县署用款如行政经费、司法经费、监所经费、人犯囚粮、慈善经费各项，每年须用一万余元，以之抵充，不足远甚。故到寻乌做官的人，莫不觉得苦甚，便一意勾结豪绅，借种种事故压榨贫民。至于烟、

酒、屠宰等税，直接归省政府，不与县署相干，县署能指挥的只有田赋一项。

(5) 陋规 县署钱粮经征柜上有几种陋规：第一是银水，每块钱至少吃去半毛至多一毛。譬如市价每小洋十二毛折大洋一元，粮柜上却要收十二毛半，全年六千一百余元，每年可吃银水三百多元，这是粮柜上的第一个大剥削。经征主任没有薪水，专靠银水及其他陋规养他。第二是过割礼，又名割粮礼，民间买卖田地要交割粮礼，粮柜上每户要收过割礼二毛，全年约有六百户割粮，可得一百二十元。第三是填写礼，田地买卖不但要交割粮礼，而且要税契，就是要拿土契到粮柜上斟张官契（财政厅发下来的），将土契文字填写到官契之上，每张收填写礼二毛，全年所得总数与过割礼同。第四是券票礼，即粮票钱，每张小洋三分，全年约二千张，共六十元。以上四种陋规，除银水外，都是公共的。每个知事新到任，粮柜主任要孝敬二十元至三十元与他，名曰“点规”，即是希望新任知事再点他做粮柜主任的意思。此外，还有过节礼（端午）、过年礼，不但要送知事，而且要送财政科长，知事送物，科长送钱（十元到二十元）。这些耗费都是出之于陋规。

(6) 管钱粮的 寻乌县有三个管钱粮的，刘士辉、刘梅芳、黄少堂。民国以来就是他们管钱粮，他们挟着几本粮册做宝贝，勾结历任县知事把这个职务当做世袭。由三人中互推一人为主任，其余两人为户书。红军到城，三个都挟着粮册跑掉了。

2. 烟酒印花税

寻乌的烟酒印花税，每月小洋各六十元，共百二十元，一个商人承包，在北门内设个税局。除县城外，每月往澄江、吉潭、三标、石排下、留车、车头、牛斗光、珠村圩、荒塘肚、公平圩、篁

乡圩、中和圩、岑峰圩、茅坪圩、龙岗圩、上坪圩等十六个圩场收税一次。每个小酒摊子卖酒，每个小杂货店卖黄烟，都要抽税。老实的，多敲他一点，调皮的，照章程收。每月一百二十元包税，实收可得二百元，赚八十元。税局要用局丁二名、火夫一名。包商多半是赣州人。

3. 屠宰税

也是包，每月八十元税额，实收百五十多元，赚七十余元。也设一个局，局丁一名，火夫一名。局丁不但招扶局长，还要帮他出外收税。百五十多元，城中即占四十八元八毛（三个肉案）。包商也是赣州人。只能收到圩场有定案的屠户，章程虽然说的乡下人家杀一个猪也要完税，实际收不到。

4. 护商捐

是一种地方捐，普通叫做“百货捐”。国民党经费、靖卫团经费都从此出，公安局没钱用也要拨一份给它。县百货捐总局归地方财政局管辖，县城北门外、吉潭圩、盘古隘，各设分局。油、盐、米、豆、鸡、鸭、牛、猪、羊、狗、水货、杂货、布匹，凡属路途过往货物，无论什么都要抽税，每件半毛起码，五毛为止。米果、水果、柴火、竹木器等附近乡下挑到圩场零碎发卖而非远途过往的东西，不收税。反过来说，一切远途过往的东西都要收税。南半县留车、牛斗光等处群众斗争发展，便无法设局收税。三个分局每月数额二千元以上，吉潭过去有一个月收过二千多元，北门外过去有一个月收过八百多元，盘古隘过去无局，谢嘉猷最近才设立。名字叫做“护商捐”，实则商民恨得要死。

5. 牛捐

县城一处，每年一千七百多元，无局，由三四个股东承包，一

人出面办理。四年来都是新寻派何子贞的老子何学才出面包办。一千七百多元捐额，实际则收二千三四百元，也是一笔地方捐，归财政局管理支配。

6. 赌博捐

名字叫做“公益捐”，包括赌摊与花会，亦属地方经费，由财政局派征收员（何子韶做过两年）管理征收。县城一处每月收一千一百元，盛时每月收过一千八百余元。全县各圩同样要抽。前年每月全县收过三千多元，那时有刘士毅^[1]派了一排人来县经办，名曰“防务捐”，每月提去二千元。赣南各县都是如此。后赣南旅省同乡会向省政府告了刘士毅，他不得不撤销，但地方豪绅继续征收如故。这是地方豪绅与刘士毅斗争的一幕小史，许多县都有这种斗争。

7. 财政局总收入

财政局的收入是牛捐（年一千七百多元）、护商捐（年二万四千元）、考棚租（二千元左右）、宾兴租（以谷折钱计三千元左右）、孔庙租（三百元左右）等，共计年收三万元左右。其用途是，国民党县党部、靖卫队、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清乡局、公安局、新寻学校（何子贞、何挺拔办的）、普化学校（在澄江，谢嘉献、蓝玉卿办的）的开销，总而言之是豪绅及其走狗嫖赌、食着、鸦片烟的用费所从出。

8. 派款借款

省政府的赣省公债派过三千元，二五库券派过二千元，中央公债派过一千元左右，金融善后借款派过四千元，军阀过往，如林

[1] 刘士毅（1886—1982），江西南昌人，曾任国民党军江西独立第七师师长、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

虎、刘志陆、李易标、黃任寰^[1]、许崇智、赖世璜过了多回，前后派过四万多元。以上这些派借款项，由县署分摊到各区、各村、各圩，凡有一石谷田以上的，小商一百元资本以上的，均要派到。凡操到政权的豪绅地主大商，从县到乡各级机关的办事人，均不出钱，对他们的亲戚朋友也为之设法酌减。于是款子都派在那些老实的弱小的地主、富农、商人身上。还要加派手续费、夫马费、茶水费，如上头要派一千元，财政局就要派一千二百元，接下去区乡两级又各要加派，借此渔利。上面借了款去如公债等，间有还下来的，军队借款亦间有还来的，县城及各区保卫团豪绅们一把吞了下去，从不发还与借户。汪子渊当保卫团总时，吞没军队还来借款一千余元，惹起篁乡一带借户和他打官司，始终没有打得出一个铜板。

九 寻乌的文化

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

不识字	百分之六十
识字	百分之四十
识字二百	百分之二十
能记账	百分之十五
能看三国	百分之五

[1] 李易标，曾任北洋军阀广惠护军使、粤军第四军军长等职。黃任寰，曾任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能写信	百分之三点五
能做文章	百分之一
初小学生	百分之五（五千人）
高小学生	百分之八（八千人）
中学生	五百人
大学生	三十人
出洋学生	六人
秀才	四百人
举人	一人

(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

高小学生多于初小，是因为进高小的多由读蒙馆后直接进去的。全县初小每区不出十个，七区共七十个，每个以五十人计共三千五百人。此外半新不旧的初小，有其名无其实或者连招牌也没有挂的有八十个，学生约一千五百人。两项共五千人上下。

高小每区至少一个。双桥区经常有两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四个。南八区有二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三个。城区有二个（城内之城东学校及田背之曹仓学校）。篁乡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三个。县城有三个（除城东）。全县经常有高小十三个，最盛时期（三二五暴动前中国大革命前后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有十八个。普通每校有一百学生。前清光绪末年办起到最近，最老的有二十多年历史，共有学生一万左右，一万人中已经死掉了二千左右。高小学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与富农子弟各占小部分。

本县有四个中学，但都短命。项山大地主“屎缸伯公”办的知耻中学（项山小杭）办了一年，双桥地主们联合办的尚志中学（在

坛坊）办了半年，澄江公立的普化中学（在澄江圩）办了两年，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在县城）办了两个月，总共出了一百多个没有毕业的学生。中学生的大多数是在梅县、平远、赣州三处中学读书的（每处各一百名左右）。全部都是地主子弟，其中亦是小地主占大多数。

大学生中大多数出于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只占着五个。刘维炉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了一学期，刘维锷在北大读了二年，邝才诚在北京师大读了一年多，三个都是共产党员。二刘三二五暴动时被杀，邝任红军五十团参谋长，在澄江被谢嘉猷捉着割死。邝世芳在北京朝阳大学读四年，病死，思想是革命的。凌得路在北京文化大学读一年，到俄国留学，以不能供给饭费，在芬兰使馆教大使家塾，思想是革命的。五人都是由祠堂供给学费才进大学的。大地主出身的二十五个大学生（及专门学校学生）全部反动，主要如何子贞（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寻乌靖卫队长）、赖世源（北京师大预科二年，在篁乡参加反革命）、刘鸿翔（北京文化大学读两年，在南八区领导反革命），三人均在寻乌，其余多在外头，属于蒋介石派。共大学生三十人，十分之八是读法科。

出洋学生六人中，潘作琴（英国医科毕业，在汕头行医）、丘凌云（到英国走过一回，其实不算留学，天津锅炉公司工程师）、丘伟伍（日本帝大毕业，新寻派中坚，随何子贞跑了）、古子平（从日本买了一张文凭回来，大嫖大赌，篁乡人，做过教育会长，此次在篁乡炮楼中被红军攻走）四人均大中地主出身。曾有澜（最先出外留学的，光绪年间去日本，法科毕业，在奉天、北京、湖北做法官，中山中学派曾捧他为假首领，三二五暴动失败房子被烧，现加入改组派）、邝摩汉（日本留学，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北京文化大学教务

主任，与寻乌大地主谢杰在南京办汽车公司）二人出身不属大中地主。曾是小地主，官费留学日本。邝是贫农，高小毕业，进南昌宪兵学校，有个什么人赏识他，供给他钱去日本。

秀才生存者全县还有四百个，其中篁乡区塘背古姓一村六百人中占去十一个，是秀才最集中的地方。古柏的高祖七十岁，死时起个“圣旨”牌坊，中间写着“亲见七代”，两边写着“眼见五廪贡”“膝绕十二衿”，说的就是那时候他的孙子同时有十二个秀才。塘背古姓的旧文化在全县是最盛的，他们在政治上也历来占着支配的地位。南八区车头乡二千人中有秀才九人，也算是很多的。南八区龙图乡一千四百人中有秀才二个，则算是少的。近数年来，秀才们大多数无所事事，在乡村中当“老太”（本姓农民呼尊长叫“老太”，地方上人称他则曰“先生”）。这班人多半是收租的小地主，一小部分教书（旧书，也有新书），又一小部分行医以为生。秀才都是地主阶级的产物，但也有极少数是从贫农阶级出身，受地主的栽培而读书进学的。寻乌唯一的现存举人古鹿萍，他的父亲是个雇农，苦得没有饭吃。他小时提个小篮子卖小口（糖子、荸荠、咸萝卜等等），后来读书，先生见他聪明，不收他的学费，以此读出头来。他做过两任县知事、两任省议员。他在乡间是个极顽滑的，什么人都同他好，他亦表面上赞成新派，同时又禁止他的女儿剪头发，限制她的婚姻自由。南半县土地斗争起来，他采取反对态度，这次红军进攻古姓炮楼，他又主张投降。

南半县土地斗争胜利，每个乡苏维埃至少办了一个列宁小学，普通是每乡两个，特别地方（龙图、牛斗光）办了四个，每校学生四五十人。学校及学生数比旧时国民学校增多一倍。小孩子们说：“若不是土地革命我们没有书读。”高小因无经费也没有教员

(革命知识分子忙于参加斗争去了)，还没有办起来。

第五章 寻乌的土地斗争

本章目录

- 一 分配土地的方法
- 二 山林分配问题
- 三 池塘分配问题
- 四 房屋分配问题
- 五 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 六 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 七 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 八 留公田问题
- 九 分配快慢
- 十 一个“平”字
- 十一 抵抗平田的人
- 十二 原耕总合分配
- 十三 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
- 十四 非农民是否分田
- 十五 废债问题
- 十六 土地税
- 十七 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一 分配土地的方法

有几种分配土地的方法。主要的是照人口平分。全县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方没有分配土地。就已经分配了的说，照男女老少平分法去分配的占百分之八十。当土地斗争初起时没有成法可援，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县政府）提出了四个办法，要区乡苏维埃召集群众代表开会讨论，任凭选择一种。那四个办法是：一、照人口平分；二、照劳动力状况分配，劳动力多的多分，劳动力少的少分，即四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为一劳动单位分全田，四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分半田；三、照生活财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艺的少分，无他职业的多分；四、照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施行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个办法。后头斗争发展，寻乌党就采取第一种办法作为主要办法，推行各区，得到了多数贫农群众的拥护。现在照这个办法来分配的土地，占全分配区域百分之八十。这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通通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去分配。

有些地方是四岁以下的不分；四岁以上直到老年，不会劳动的分五成或七成，其余分十成。行这种办法的有留车、枫山、上磜、大同四个乡，约有一万人口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照人口平分之后，不会劳动的因为无力耕种退回田之一部分（退的数目多少不等，由本人自定）于苏维埃，由苏维埃补给有劳动力的人耕种。结果成为有劳动力的多分，无劳动力的少分，与县政府提出的第二种办法差不多。不同的是由农民自动地在分田之后退回一部分田地，而不是一开始就按劳动力标准分配。这

样做的有龙图一个乡。还有黄沙乡也是退田，不过不是农民自动退田，而是政府于平分之后见着一些人得了田无力耕种，就命令他们退回一部分。要农民退田，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不过若硬要退肥田，而不准他们退瘦田，他们就不喜欢。龙图、黄沙两乡共有二千五百人。

此外，还有大田乡的自由耕种，愿耕多少就耕多少。这是因为大田乡经过白色大屠杀，杀死壮丁近百、老小数十，有几家全家被杀，又有二三十人当赤卫队，或往外县做革命工作去了，全乡原有八百人，现只六百人，有许多田无人耕种，同时全乡的牛一条不剩地都被反动派牵去了，所以只得任人取耕，全不限制，牛则从别乡土豪家牵来使用。

二 山林分配问题

全县对于山林，除牛斗光一个乡外，均没有分配，仍由原耕作人经营，名义上全归苏维埃公有，耕种人向苏维埃纳地税。为什么牛斗光的山林分了呢？因为那乡人多田少，农民要求分山迫切。此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仍然迫切要求分山，如附城南门外、北门外一带的农民，因为山权在各大姓公堂手里，小姓农民没山种，他们就迫切要求分山。

三 池塘分配问题

所有权归苏维埃，使用权归农民，由池塘的邻近人家轮流管

理，每年更换一家。全县都是这个办法。

四 房屋分配问题

没有分，但准许屋少的或被反动派烧了屋的，搬进屋多的人家去住。双桥、南八两区被敌人烧屋很多，那些烧了屋的人都搬进附近地主富农家里去住，搬进中农贫农家里去住的也有。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屋主不欢喜新来的人在他家里生儿子。寻乌习惯，若别人在自己家里生了儿子，就认为他那一家的“精灵”会被那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了。从前双桥区的芳田乡有个进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人们就说是由夺了他外祖家的风水。这件事全县闻名。三二五暴动失败，留车暴动总指挥钟锡璆的老婆避难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会生育，就赶快要她走。后头跑到龙川县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山上搭了个寮子才把儿子生下来。现在一般被工农占住的人家，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别人在他家里生儿子，但心里是不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由现在这种“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

五 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为了这个，他们不但反对以区为单位分田，并且连乡为单位都不赞成。他

们衷心愿意的还是以村为单位分田，使他们本村的田完全为本村所得。所以寻乌现在土地分配状况虽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乡为单位分的，但多数农民对于这一办法并不热烈拥护，而只是不积极反对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积极反对呢？则因一乡之中，村与村的土地数量虽有参差，并不怎样悬殊，照乡为单位分了，他们在经济上所受的损失为数甚为微小。至于那些村与村的土地数量相差很厉害的地方，或者是村的区域很大差不多等于别处一个乡的地方，他们就坚决反对以乡为单位，如城区的城郊乡（分为四村）、新寨乡（分为二村），南八区的珠村乡（分为六村）等处地方，均以村为单位分配。但这种地区不多，只占全县百分之十五。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这区移到那区农民自己不赞成，就是这乡移到那乡也不赞成。“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还有迷信风水，以为祖宗坟墓所在，抛去不利。农民相信风水是于他们的生产有利的。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还有因为地理的原因，如车头地方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那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小龙去（同一个区，相隔十多里），也同样是经济理由。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

六 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城内农民分田最少，每人一石八斗，为全县分田最少的地区。原因是过去耕田的少，过去不耕田而现在要求分田的游民和娼妓很多，因此把田分得少了。娼妓有爱人的跟爱人跑了。没有爱人的无

论如何要求分田，她们说：“没有生意了，不分田会饿死。”人们说她们不会耕，她们说：“我来学呀！”实在她们业已在耕田了。游民同娼妓大多数都是分了田的。那些分了田的游民都是比较有耕种能力的，如有儿子，有少数本钱的；娼妓则是有丈夫或儿子的，她们每家有三五口人，迫切要求分田，若不分给，她们就闹。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也就分了田给她们。但也有一部分不分的，就是纯粹的流氓或娼妓而完全没有耕种能力的。以城郊说，游民分了田的占百分之六十，毫无耕种能力不分田的占百分之四十。

七 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城郊最少，每人每档（一年收两季，每季为一档）一石八斗。城区四厢又多一点，每人每档三石多。双桥区最多，每人每档七石以上。龙图、河角圩每人每档七石。但大多数地方都是每人每档分五石。每人每天要食米一斤，一年三百六十斤，一百八十斤合一石，共米二石，即谷四石。分田石数都是水谷（即毛谷），每档分五石的，一年两档共十石。十石水谷能晒八石燥谷，食去四石，尚余四石。这四石谷年节做米果呀，蒸酒呀，去了二三石，剩下一二石，不敷衣服、油盐、社会交际（婚丧年节）的日常用度。那末他怎样补足呢？便靠畜猪子、养鸡鸭、种小菜（指城市附近）、种甘蔗、栽竹木、种杂粮（番薯、芋子、包粟、豆子）以及兼做手工（做各种圆木和各种竹器，如锅盖、桶子、饭甑、脚盆、尿桶、水勺、竹椅子、斗篷、簸箕、米筛、畚箕、火笼、竹篮子等东西。以上那些竹木器，农民兼做的多，专门竹木工做的少，农民甚至有兼做台、凳、椅、桌的），兼挑脚（挑米脚、挑盐脚、挑豆脚、挑油脚、

挑杂货脚，都是帮助人家挑，挑米盐两脚的最多，余较少），兼做小买卖（贩油、盐、米、豆、猪、鸡以至米果等等），兼为资本家做工（采香菇、做纸工、采茶等）。上举各项，每人兼做一门或两门，用这种方法补足生活。全家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杂收占三分之一。

八 留公田问题

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九 分配快慢

后起的北半县分配得很快，如城区从暴动占领县城到田地分配完毕，只有二十天时间。还有南八区的车头、龙图及三水区的上坪分配得更快，只要一天调查完结，两天算清，又一天宣布，此外的时间是照每人应得的数目实行抽多补少，确定每家田地的区划。这样，至快也需要一星期，因为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南半县的大部分（除车头、龙图）却分配得慢。去年二月起，双桥一带就有了武装斗争，但到十一月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才开始发表册下去，做土地调查。调查费了一个月还没有调查清楚。原因是调查方法不对，调查表内容很复杂（人口、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年龄、土地所有权属谁、土地界址、面积数目、每年收成等等），不必调查的项目也列了进去，

调查手续又很麻烦（县革委将调查表发往各乡，调查好了再送县革委审查），以致延长时日不能分田。今年一月才变更方法，调查表只列简单几项（家长姓名、一家人口总数、能耕种的若干、不能耕种的若干、专做工商业的若干、耕田若干、应分田若干）。调查手续，由乡政府召集“分田大会”，每家出一代表，讨论分田办法之后，当场调查（会场上摆设许多桌子，每个小村的代表们围绕一张桌子，众人口报，一人手录），送交乡政府核清，将人口总数除田的总数，得出每人应分数目，在通衢公布。从调查到公布，只需四天（调查一天，算清两天，公布一天）。剩下就是实际分配，即从第五天起每个乡政府同时派出指导员十多人，分往各村，踏看田地肥瘦，并验第一天调查场中是否实报无误。踏验明白，执行分配，抽多补少，确定界域。这种踏验、抽补工作较为麻烦，斗争亦多在其中，所以须费一星期内外的工夫。用这种方法从调查到分配完毕，至迟不过两星期即可办完。北半县后起地方，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十 一个“平”字

各乡分田会议中，讨论的问题是，乡为单位还是村为单位呢？人口标准分配还是劳动力标准分配呢？鱼塘、园、坝怎样分配（山林、房屋二者，寻乌没有提出讨论）呢？不准虚报，虚报的怎样处罚呢？至于没收标准问题简直不消讨论，因为红旗子一打起，那就是没收土地的宣告，用不着再有什么文字形式的宣告了。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十一 抵抗平田的人

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坏田。当群众强迫他拿出的时候，他愤然说：“遭人命也不拿！”乡政府不能解决。县政府派人到枫山，才把他压下去，肥田拿了出来。南八区牛斗光也有富农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乡政府怕他们，不敢作主，县政府的人去召集群众大会，才强迫富农小地主照办。双桥区大田乡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动派烧了房子的，自以为有功于革命。当群众要分他的田的时候，他恶声说：“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告知县政府，县政府要区政府去捉他。区政府负责人梅立三是个共产党员，因与梅元坤同族，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梅元坤否认说过那句话，田仍分出来，就此了事。还有双桥区荒塘肚乡政府负责人林某及徐溪乡政府负责人林某（他也是共产党员），分田时独得好田。群众说“办事人得好田，我们补来的是坏田”，大为不满，斗争情绪因此低落。县政府把两人的好田撤回补给群众，群众才高兴了。以上几个例子，除梅元坤一家是反对没收他的田地外，其余都不是没收问题，而是肥瘦分配问题。所以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

十二 原耕总合分配

“以乡为单位”，说的是人口单位，不是土地单位。土地是不能

以区域限制的。甲乡的人在乙乡耕了田，乙乡的人也在甲乡耕了田，一乡的人在他的邻近各乡都有土地耕种关系。区与区的交界，县与县的交界，省与省的交界，农民都是互相交错地耕种土地。所以一乡的人拿了他们原在本乡及邻乡耕种着的土地，总合起来，平均分配，被认为是毫无疑义的。寻乌的土地分配也是这样。

十三 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

有三种处理法。第一种是寻乌北半县现在行的（南半县分田在莳田之先，无此问题），上档（又叫“早子”）归原耕，下档（又叫“番子”）归新户。这种办法，富农不吃亏，但一切耕田少的贫农及不耕田的地主与流氓都不满意。特别是地主与流氓觉得没有办法。不能收租了，地主无法得谷。赌博废止，又没有钱借了，流氓失了吃饭的财源。第二种是新户帮钱给原耕，上档亦归新户得谷。这种办法又分帮多与帮少。帮钱多，原耕自然满意；帮钱少，原耕当然不满意。但贫农及流氓群众就纷纷议论，甚至有的说：“几多子家门都了了，你这几根子狗骨气力都唔攢？”意思是说几多大财东都破产了，你这一点点多余东西也舍不得吗？寻乌法律上没有承认这种方法，农民却有自由行之者。像城区有那食不够的贫农帮一点钱给富农，要求富农让了上档的分出部分给他收割，颇有些人家是这样做。第三种是不论上下档谁分了谁就去收获，广东平远县有行之者。

十四 非农民是否分田

流氓在县城方面，略有耕种能力的准许分田，毫无耕种能力的

不分；在县城以外各区，因流氓人数少，一概分田。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大市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不足的酌量补足一部分。红军士兵和革命职业者，不但分田，而且苏维埃动员农民替他们耕种。地主在乡居住的准许分田。僧尼、道士、传教士要改变职业，即不做僧尼、道士、传教士了，方许分田，否则不分。算命及地理先生无规定，因为很少，大概都是分田的。南半县完全没有僧尼、道士、传教士、算命及地理先生等人了，他们一概改了职业。黄沙乡政府主席的父亲死了，请和尚做佛事，农民反对。寻乌本县很少“看地的”，看地的多属于兴国人。和尚很少，全县不过百把人。耶稣、天主两教，县城一个耶稣堂二百多人，一个天主堂一百多人，篁乡一个耶稣堂一百多人，牛斗光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吉潭一个耶稣堂一百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计耶稣堂五个七百人左右，天主堂一个百多人，共八百多人。耶稣堂属美国，过去县城有一个美国牧师，其余四处均中国人传教。天主堂属德国，有一个中国神甫。教徒成分，寡妇（内有贫农）及老年妇人（地主婆）占百分之三十，刁钻古怪的绅士及其家属占百分之三十，弱房小姓的农民占百分之二十（强房大姓的农民不入教），地主出身没有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大概进教的不外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很坏的，一部分是很弱的。很坏的也不是流氓，而是那乡村中奸滑阴险想当霸王的，他们进教为了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种是受人压迫贪图保护的贫弱的人，他们的目的在于避祸。

十五 废债问题

分为债与账两项。债是废除二分利以上的高利贷。该欠商人的

叫作账，民国十七年元旦以前的不还，以后的要还。因为寻乌所有的债，没有在二分以下的，所以二分以上的不还，实际上即是整个的不还。亲戚朋友之间讲人情借来不要利息的债务，群众仍归还，但这是非常之少的。欠商人的账多属富农阶级，中农稍有一点。贫农雇农是没有商人赊帐的。

十六 土地税

去年收了抗租所得税，每抗租一石，收税二斗，在双桥、南八两区实行了。今年二月县革委扩大会规定不分等第普遍收土地税百分之十，税率与抗租所得税相等。这是一种不分等第（不是累进的）的税法。五月县苏维埃大会采用赣西苏维埃颁布的累进税法。

十七 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犁田、耙田、挑粪草、挑谷米等项，虽因体力关系，多属男子担任，但帮挑粪草，帮担谷米、莳田、耘田、捡草、铲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项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帮助；砻谷、踏碓、淋园、莳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荡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项工作，则是女子作主，男子帮助。加以养育儿女是女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

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土地斗争发展，许多地方女子勇敢地参加斗争，这回四军二纵队打篁乡反动炮楼，篁乡的女子成群地挑柴去烧炮楼，又从反动地主家里抢了谷子出来。斗争胜利的地方她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各处乡政府设立之初，所接离婚案子日必数起，多是女子提出来的。男子虽也有提出来的，却是很少。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一个。男子在这个问题上却采取完全反对的态度，其中一小部分男子就消极起来了。“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这就是他们无力禁阻离婚表示叹息的话。这一部分多是属于贫农。一大部分男子是非常强硬的。芳田赤卫队队长曾家勋原有一个老婆，后来又勾到人家一个女子。原有老婆要求离婚，他不肯，对她说：“我家是有进没出的，你要离婚就一驳壳打死你！”龙图的富农刘学盛，反对他的老婆离婚，对革委的主席说：“她要离婚，我就捂了渠。捂掉了渠，我死都愿！”（“捂”，当地读无，消灭的意思；“渠”，当地读已，他的意思。）这一部分男子多半属于富农。政权机关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有过四次变更。第一次是去年十一月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明显地反对一夫多妻，承认原有老婆后有爱人而老婆不反对者无罪；主张有条件的离婚，而其条件并不甚苛，承认一方有疾病的，女子受压迫的，夫妻反目半年不同居的，男子出外一年无消息的，均准离婚；地主阶级毫无条件可离婚。同时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奸。这个申明传播后，南半县各地发生很多的男女间纷扰，最显著的是龙图与河角圩两乡（属南八区）的青年男女群众，几乎发生械斗。原因是两乡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时常调戏对乡成群的青年妇女。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

了一些（她们成群上山去砍柴火，比平素归家时间要晏）。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他们两乡是同姓别房。到今年一月，因为发生捉奸的事，反对捉奸的群众就去干涉，结果几乎弄成械斗。上述事情之外，有老婆又新找一爱人的差不多每个乡村都有，老婆们就群起反对。政府在这种情形之下，来了一条相反的法律。今年二月县革委会扩大会，对“贞操问题”决议：“已结婚之男女，不准与另一男女发生性交，私奸者严办。”同时对所谓“爱人”问题亦定了一条法律：“反对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度，原有夫或妇未经离婚，不得另找爱人，过去有些错误的应即马上离去，只同一个结为夫妇。”对离婚问题没有变更。这个决议发表后，纠纷停止了，一致对付当时严重的时局，打破了敌人的“进剿”。五月二日占领县城，同时红军第四军占领了反动的北半县，发动会昌、安远、平远的群众。在这种形势之下，五月六日全县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取消了二月会议的贞操决议，虽然没有明白地规定禁止捉奸，但再不说什么“私奸者严办”了。此次对“爱人”问题采取了二月会议的意见，对离婚问题与前两次会议无异。但大会闭幕不到一个月，第三区苏维埃大会却大大变更了对“爱人”问题、离婚问题的决议，他们的口号是“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当然的结果，不但禁止捉奸，而且什么爱人也可以带了。这个案子通过的地区是寻乌全县斗争最久（一九二八年到今），又是资本主义最先侵入的地区，时候则又在四军到来，会、安、寻、平四县斗争大大发展的时候。当这个案子提出的时候，提案人的演说是：“四军的人说了，有条件的离婚包含了封建思想。”这篇演说过后，案子就马上通过了。城区是新起来的，建设政权不上一月，男女问题已经闹得不亦乐乎。有一乡拒绝县政府派

去的宣传员，他们说：“同志！你唔要来讲了，再讲埃村子里的女人会跑光了！”其实宣传员宣传的是“推翻封建势力”“打土豪分田地”，离婚结婚问题也是照着法律讲的，但一经发动，就如水之就下不可制止。城郊一乡跑了十几个妇人，她们的老公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乡苏维埃在老公们的迫切要求之下出了一张告示，上面说道：“一般青年男女，误解自由，黑夜逃跑，纷纷找爱。原配未弃，新爱复来。似此养成，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偷偷摸摸，不伦不类……。”这篇告示，明显地描画了成年老公们的呼声。不过这种“不伦不类”的潮流——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

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护婚姻自由的口号。贫农阶级已结婚的成年男子，一般说来是反对离婚自由的，但他们反对的态度不是那种反革命性的顽强态度，他们只觉得老婆跑了不得下地。他们的叹声是：“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他们跑到乡政府请求设个法子，他们也不敢打他们的老婆了，即使是十分呕气的事。富农小地主阶级的成年男子们就完全不同，那种“捂了渠”“一驳壳打死你”，都是他们反革命性的横蛮无理的表示。至于成年农民男子们为什么要反对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没有问题）呢？非常明显，他们是为了劳动力。

那末，农民男子是反对女子解放到底的吗？不是的，特别是贫农雇农阶级他们很快就会给予女子以完全的解放，在他们整个阶级解放完成了之后。他们之所以惧怕跑掉老婆，乃是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充分看见推翻封建剥削以后的成果的时候所发生出来的一种思想。只要土地斗争一深入，他们对于婚姻问题的态度就要大大改变了。

尋鄧調者
一九三〇年

1930年5月，红四军在江西寻乌停留一个多月。图为毛泽东撰写的调查报告《寻乌调查》封面。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 7 号兴力工业中心 5 楼 09 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 16 开

页 面：558 面

版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次印刷

2013 年 11 月 1 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 套

全集字数：2015 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 卷 港币 \$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